

国宝森玉

——上海博物馆举办座谈会 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

A National Treasure: the forum held on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Mr. Xu Senyu's
birth in the Shanghai Museum

撰文 / 本刊报道

2011年10月18日，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徐森玉先生的幼子徐文堪先生、外孙女王圣思女士、上海市文广局党委书记、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国家图书馆王茜、上海图书馆萧斌如、上海图书馆历史文化文献中心陈先行、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所吴格、陈广宏、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等出席座谈会，应邀与会的还有郑振铎先生之子郑尔康、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知名学者柳和城、资深记

者郑重、楼乘震与上海博物馆相关部门的研究人员。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因另有公务未能到会，但特意向座谈会发函，深情回顾徐森老对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八十多年来，故宫博物院一直铭记着徐先生的厚德和丰功……徐森玉先生不愧为中国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和学术泰斗，更是新老知识分子的杰出楷模。今天，故宫博物院的全体同仁们深切缅怀我们的第一代故宫人徐森玉先生，



他的精神、业绩和品格将与我们的民族瑰宝一样代代相传！”

徐森玉先生是中国文物博物馆界的泰山北斗，曾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是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的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一生为查访、发掘祖国文物奔走天南地北，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积极抢救著名的居延汉简、《赵城藏》（金刻大茂藏经）和《碣砂藏》（碣砂大藏经）；发现大同辽代古寺、北京元代阿拉伯式浴池、三门峡摩崖石刻等重要文化瑰宝。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森玉先生参与主持了故宫文物南运的工作，并在定居上海期间，与张元济、郑振铎等文化界人士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多方寻访、购置散落于沦陷区的珍籍善本，为国家抢救、保存了大量的古籍珍本，避免其流失海外。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拳拳之心，徐森玉先生不顾年迈，又全力投入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先后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之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务委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其间，徐森老凭借其其对善本书及书画、古物的精深造诣和与收藏家的良好关系，先后主持了苏州潘祖荫滂喜斋、顾氏过云楼等重量级文物的捐赠，并收进大量稀世珍品包括王献之《鸭头丸帖》、怀素《苦笋帖》、孙位《高逸图》、赵佶《柳鸦芦雁图》、米友仁《潇湘图》、孤本《萝轩变古笈谱》等，对上海的文物收藏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座谈会上，与会者从各自经历与体会谈起，在回顾徐森玉先生一生业绩的同时，尤其对他高尚的人品和对事业的高度忠诚表达了衷心敬佩。与会者一致认为，徐森玉先生学养深厚而淡泊名利，一生为国家的图书和文物保护事业鞠躬尽瘁，成果卓著，他为人谦逊平和，在后

学晚辈面前不以前辈自矜，对提携后进更是不遗余力，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高风亮节。

此次座谈会前夕，上海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徐森玉文集》，收录徐森老《袁克文藏 董美人墓志 原拓本跋》，《校宋本 水经注 四十卷跋》等文字 20 余篇，并新辑《吴兴徐森玉先生年表》附于书后。座谈会上，亦有部分学者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材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徐森老的一生行迹进行了一些补充完善。

2011 年恰逢徐森玉先生诞辰 130 周年、逝世 40 周年，在我国文化建设事业于改革创新中稳步推进的大环境下，在上海提出了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强化城市文化功能、营造和谐文化氛围、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今天，纪念徐森玉先生，正是要从先生的事迹中汲取力量，并引以为楷模，不断前行，努力为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奉献出应尽的力量。

Contents

Major Events

A National Treasure: the forum held on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Mr. Xu Senyu's birth in the Shanghai Museum

(By the Journal)

Mr. Xu Senyu is deemed a leading authority in Chinese museums arena; he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He was a “national treasure” as praised by Chinese ex-Premiere Chow En-lai, as well as a leading ancient art connoisseur, an epigrapher and bibliographer. He was involved in founding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after 1949; he was in charge of shipping the Qing-dynasty imperial collection to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he also purchased back scattered ancient rare books from Japanese occupied cities in China, including Shanghai; after 1949, Mr. Xu threw himself into the work of Shanghai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pecifically in founding Shanghai Museum and Shanghai Library. He assumed various posts in succession, including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Director of Shanghai Museum, Director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2n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Vic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of China.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course of Shanghai are highly prized even nowadays. In October 2011, a forum was held on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Mr. Xu's birth in the Shanghai Museum, with a production of essays commemorating him.

Articles on Special Themes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spirit forever: Mr. Xu Senyu and the Sino-Swedish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By Xu Wenkan)

My grandfather Xu Senyu: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and 4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By Wang Shengsi)

The life story of Mr. Xu Senyu (By Chen Xieju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r. Xu and my father Zheng Zhenduo (By Zheng Erkang)

A cherished memory of Mr. Xu (By Wu Ge)

A scholar's devotion to his country: the close friendship generated between Zheng Zhenduo and Xu Senyu in a secret struggle (By Chen Fukang)

Ye Jingkui's friendship and associations with Xu Senyu (By Liu Hecheng)

Mr. Xu in my eyes (By Chen Xianxing)

Vision on Cultural Relics

Some recollections of Mr. Xu Senyu's sorting ancient books (By Wang Han)

A letter from Mr. Chen Mengjia to Mr. Xu Senyu (By Liu Xiangchun)

Calligraphic features of the written eulogy *Shen Wu Fu* (By Chen Songchang and Zhang Xiaolei)

功绩与精神永存

——徐森玉和西北科学考察团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spirit forever:
Mr. Xu Senyu and the Sino-Swedish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撰文 / 徐文堪

今年是家父徐森玉（鸿宝，1881—1971）先生诞辰130周年和逝世40周年。他在上世纪20—40年代，曾经担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参与考察团的各项工作。此事知者不多，现根据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资料，作一简单的介绍，以此缅怀为中国和世界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贡献的中外先贤。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国近代首次由



徐文堪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

中外学者联合组建，规模大、学科多的学术考察团体。1926年，最早“发现”楼兰古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再次来到中国，此时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考察活动从一开始就遇到麻烦，中国西部已经不再是可以自由穿行的无人之境，而赫定的对手，也是后来的合作者，乃是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尽管开始之时双方缺乏共识，中国学术界内部也存在矛盾，但在随后进行的谈判中，刘复（半农，1891—1934）等中国学者在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表现出灵活的态度，终使中瑞双方达成协议，共同组建考察团。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徐森玉偕周肇祥（1880—1954）去车站送行，周是家父老友，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京师大学堂、法政学校毕业。工诗文书画，历任湖南省省长、临时参议会参政、清史馆提调、中国画研究会会长、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在所长任内，和刘复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赫定签约。

考察团中方团长为徐炳昶（旭生，1888—1976）。徐先生留学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所所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

古学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曾产生很大影响。他也是家父多年好友。

参与和领导考察团工作的袁复礼（1893—1987）留学美国，是中国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他在考察途中发现大批爬行动物化石，获瑞典皇家科学院“北极星奖章”。袁先生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起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从事地学教育60多年，培育了几代地质人才，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中，有29位出自其门下！他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与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1874—1960）一起进行“仰韶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2011年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仰韶村竖立了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安志敏四位先生的铜像。袁先生同样是家父多年挚友，记得我读中学时，在家中看到过他亲笔题赠家父的英文著作。

在考察团中从事考古工作的黄文弼（1893—1966）与家父有数十年交谊。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起，他为中国新疆和西北各地的考古事业作出了毕生努力，著有《高昌陶集》（1934年）、《高昌砖集》（1951年增订）、《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

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1958年）、《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年）、《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1983年）、《西北史地论丛》（1981年）、《黄文



袁复礼照片及纪念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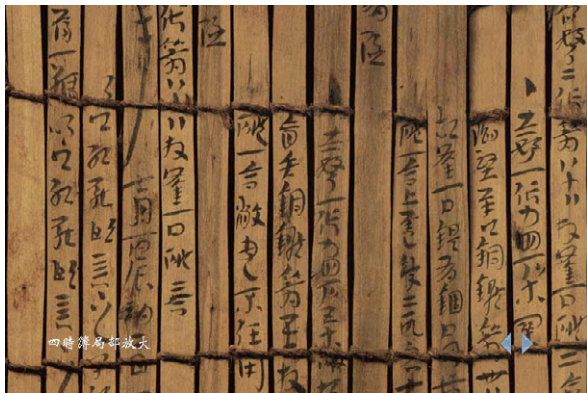


贝格曼

弼历史考古论集》（1989年）、《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90年）等。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他都曾亲笔题赠家父。

考察团于1928年2月到达乌鲁木齐。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有：袁复礼和瑞典学者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内蒙古各地采集细石器，在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等地采集新石器时代遗物。1930年贝格曼从4月份开始陆续于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万余枚，此即“居延汉简”。贝格曼和黄文弼都在新疆进行了重要的考古调查和部分试掘工作。除考古学外，中瑞双方有地质、气象、天文、生物、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领域专家参加考察。外方队员除瑞典人外，还有来自德国、丹麦、俄国和爱沙尼亚等国学人。实地考察持续至1935年，后分头撰写考察报告。从1937年起，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瑞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各省科学考察的报告》为总标题，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专书已达56种。

当年参加考察的中国中青年学者和学生多为一时之选，日后都有杰出成就。考察地点遍于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虽然环境艰苦，但皆不辱使命，收获甚丰。如地质学家丁道衡（1899—1955）于1927年7月3日发现白云鄂博铁矿，后来的包钢就是在其发现的基础上建立的；鉴于丁先生的巨大贡献，包钢特为其塑造铜像作为永久纪念。又如陈宗器（1898—1960），是中方当时在西北地区考察、工作时间最长的学者之一，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乃是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他与赫定友谊深厚，有一百多封来往信件，现存瑞典国家档案馆。刘衍淮（1907—1982）是著名气象学家，1949年后去台湾，继续从事气象教学和研究工作，后任台湾师大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就的文章。另一位气象学家徐近之（1908—1982），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在历史气候学和灾害防治方面贡献突出。与考察团有紧密联



居延汉简

系的科学界、文化界知名人士，除家父外，有蔡元培、胡适、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马衡、梅贻琦、沈兼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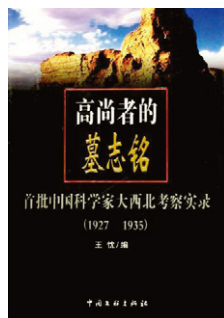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家父本已离开北平，因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仍陷于敌占区，于是在11月潜回北平，与北大助教、西北科学考察团干事沈仲章将汉简设法运出，后经天津、青岛，辗转入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沈先生生于1905年，上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后为刘半农弟子。其人多才多艺，不仅通晓数种外语，而且在语言学（1934年6月曾在刘复率领下与白涤洲、周殿福等同往包头进行方言调查）、录音技术、摄影、医药等方面都有深厚造诣，特别是在发掘和整理民族音乐遗产方面贡献良多。沈先生是家父后辈，却也是终身好友。他倒有一桩轶事广为人知：著名翻译家傅雷（1908—1966）在1966年9月2日深夜的绝笔中记有“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据沈仲章先生回忆，当时除将木简冒险运至家父住处外，还把一些考察团的主要物件一起运出，如居延笔的模型（复制品）、贝格曼发掘居延汉简的地形坑位草图、邮局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发行的纪念邮票和许多原始记录、账目等等。其中盛放居延笔复制品的木盒上的题字便是家父的手书。

上述与居延汉简相关的原始文件未随汉简运往美国，至今仍收藏在香港大学，现名“居

延汉简整理文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邢义田先生曾于2007年11月25日至29日到港大作了一次专门调查，归后撰有长文《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居延汉简整理文件调查记》，载于史语所出版的刊物《古今论衡》第20期（2009年12月）。文中收录了考察团理事会及木简整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家父作为常务理事始终与会。如1935年2月25日于团城召开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会议由袁复礼任主席，记录为沈仲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主席报告赫定、那林（Erik Norin）正式担保于一定年限内归回古生物及考古采集品公函内容，徐森玉、陈受颐两理事提请本会正式通过赫定、那林担保函。无异议通过。并议决：该函所附详单俟检验完毕后，由本团在平全体常务理事及本案关系方面代表负责签名。这份清单原件也保存完好，清单最后有1935年3月27日陈受颐、胡适、董作宾、王作宾和家父的中文签名与用印。另有赫定、那林、袁同礼和傅斯年的西文签名。袁同礼（1895—1965）为袁复礼之弟，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也是家父的老友和同事。

邢义田先生在文章最后指出：这次有机会亲见港大所藏居延汉简初步整理留下的工作记录，益发深信这万余木简能有今天的命运，实在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当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诸位先生的无私奉献感人至深，正如《人民日报》在1987年为纪念考察团成立60周年发表的长文的标题所说，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



王忱等整理编辑《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80周年纪念展

外公徐森玉先生印象

——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 逝世40周年

My grandfather Xu Senyu: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and 4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撰文 / 王圣思

今年是外公徐森玉老先生（1881-1971，名鸿宝）诞辰130周年，逝世40周年。上海博物馆为这位第一任馆长举行纪念活动。外公的同辈人和他一样都已驾鹤西去，他学生辈的学者也大多离开了人世，与他有过接触并了解他的人所剩无几，而且都已高龄。除了亲友、文物收藏家和文物鉴定、考古、研究古籍等领域的学者，知道他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了。由我这个第三代人来写他，更是感到力不从心。只能挖掘我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加上我母亲、外公亲友健在时的回忆、文堪小舅舅的文章及他编选外公的著作《汉石经文存》，还有上海博物馆为这次纪念会所出版的《徐森玉文集》（内附年表）等作为参考，描画出我心目中的外公印象。



徐森玉

小时候跟着父母去外公家，从我们的眼里看去，外公好像和我们一样，也像个小孩子：他喜欢嚷嚷，嗓门很大——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耳聋，总以为别人听不到，因此提高嗓音说

话；他说话有很多惊叹号：“这样东西好得很哪！”“这个年轻人不得了啊！”就像我们初初看到出乎意料的美景美物时发出的惊喜和赞叹一样；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他总是早早地

去上班，时间一久，司机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未免吃不消，他的学生兼秘书、父母当时称为“小汪”的汪庆正先生悄悄地告诉“徐家大姐”，希望她能劝劝外公，妈妈刚一提起，外公就像我们受冤枉时也会如此，大声地争辩着，妈妈就用更大的声音“晓之以理”——让他能听得见，外公立刻闷不着声，这也和我们认错时的表现一样……

那时外公住在锦江饭店旁边的茂名公寓二楼，和我们家相似的是他家也是书天书地，甚至比我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第三代，我们的共同感受是外公顾不上我们这些外孙辈，他的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为中华民族收集保存文物的事情上了，每次我们一进门，他几乎无视我们的存在，立刻与父母聊天，马上切入正题——说的都是我们听不大懂的那些话，只知道他提到近来又有什么新发现，那些绕口名称的文物都是珍贵的宝贝啊。在外公家，只有好婆——文堪舅舅的母亲最热情地招呼我们：“乖宝宝来啦！”“乖宝宝吃糖呀！”“乖宝宝喝点水吧？”而对外公的反应则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我们从父母那里知道外公的学问好，会鉴定文物和古书版本，外人都尊称他为“森老”、“徐森老”。所以尽管他“不搭理”我们，但在我们小小的心里明白他是干大事的，对他肃然起敬。我们从妈妈的讲述中，知道外公是位慈爱开明的好父亲。妈妈的生父徐鸿宾（字鹿君，以字

行，我们称他三外公）是外公的弟弟，妈妈在两岁的时候过继给外公做女儿，外公视为掌上明珠。旧时家庭往往为传宗接代过继男孩子，已有长子的外公就是与众不同。妈妈的生母（我们称三外婆）要给她穿紧袜子，规范天足；要穿耳朵洞，以便日后戴耳环……妈妈大哭，并向“爹”和“三叔”告状，他们立刻加以干涉，尤其外公对弟媳从未有过地大发脾气：“你真糊涂，今后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要做事，把脚伤了，让她以后怎么出去做事！”妈妈因此没有再受皮肉之痛。平时外公只要有空就带着妈妈访友，被看作他的“小尾巴”。

外公在家常赞叹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好得不得了”，与他也有来往。但交往更多的是寅恪之兄陈衡恪（师曾）先生，一次得知师曾先生生病，外公带着妈妈前去探望，告诉女儿这位伯伯家学渊源，考古学问好，对篆刻也很在行。果然，师曾先生一见到当时还年幼的妈妈，就送她一只铜墨盒、两把铜尺，上面就有他刻的山水花草。妈妈很喜欢这个墨盒。外公让她每天练大楷，她就按外公的指导，把一小块丝棉浸在墨盒的墨汁里，每天使用。这只墨盒一直留存到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我还记得方正的铜墨盒依然铮亮，盒盖上刻有婆娑起舞的兰花，俊逸得很。我们又用它练大楷，也是在妈妈的指导下“撕一片丝棉浸在墨盒中”，寒暑假更是每天打开它，哥哥摹柳公权字帖，我们姐妹临颜真卿字帖，或一起练欧阳询的《九成宫》。直到“文革”抄家后再也没见到这只墨盒。

妈妈还告诉我们，外公在中年之前曾从事绘画和篆刻，这本事以后知道的人不多了，但妈妈是亲眼所见。在北京，外公和画家萧逊（谦中）先生过从甚密。妈妈曾看见萧逊先生试用外公送他的画笔，画了一幅小画，外公接过笔在这幅画上补了竹石。篆刻名家寿鏞（石工）先生是外公山西大学堂的同学，时来徐家坐坐。妈妈找出一方已磨得只剩一寸的田黄石，大概是外公经常用来练习——刻了磨掉，再刻再磨



徐森玉与大哥、三弟及儿女

的印石，央求寿 先生为她刻一枚名章。他立刻从外公书桌抽屉里寻出刻刀，为她刻了阳文的篆章，之后外公也拿起刻刀为妈妈刻了边款。可惜这枚两人合作的名章和那幅小画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家逃难南下时丢失了。外公也精于书法，以欧阳询体为主，兼写汉魏碑体和篆字。难怪伯郊大舅和妈妈都写得一手好欧体。外公步入中年还常为亲朋写对联和扇面。他间或也为人家撰写寿屏或墓志铭，那是因为他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时，政府经常欠薪，他只好订了润例，卖字贴补家用。而他和鲁迅先生摆弄碑帖也是在教育部任职时期。妈妈读小学二三年级时，外公常找她磨墨拉轴。一次，他写对联，让妈妈给他拉轴，写了一副，又写一副，妈妈不耐烦了，拉轴的手不断地移动，外公说：“你不愿意再拉，就不要拉了。”话音刚落，妈妈就撒手，结果墨迹都沾在对联纸上，即便如此，外公不要说打，连责备的话都没有一句，只是一跺脚，自己出去又买了对联纸回来，不再招呼她帮忙，而是用铜尺压住纸，一路写去。妈妈站在房门口看着外公不理她，自己忙活着，心中颇感内疚。到她四年级的时候，学校举办书法展览，要她写一副对联送去，外公细心帮她挑选写什么，耐心为她磨墨拉字轴，在一旁指导她，让妈妈深感浓浓的父爱。

妈妈还记得在北京家中客厅的廊沿旁有十余方石碑，不知是否就是外公与马衡先生从洛阳购得的汉魏石经之残石。有两三年的初夏，请工人来家拓字，叮当之声十分悦耳。妈妈也经常在一旁观看，工人就做了两个小布锤送她，引得她也学着用小布锤拓字。后来这十余方石刻都让归他人了。及至年长，妈妈在琉璃厂的书店看到古书上有标签，写着“徐先生定价××元”，据说买主看见这样的标签，就毫不迟疑地买去。这说明买主对外公的信任。当然，

后来也发现有假冒的“徐先生定价”。

二

外公特别看重女孩子的教育。他不赞成“大哥”（我们称大外公）教妈妈读词，认为以前女子读词写词是限于活动空间的狭小而不得不为之，现代女子应该开朗乐观地面对生活，不要因为从小读词使心情变得忧郁了。妈妈一直感谢外公对她学业的安排和指导。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她一直就读的是最好的正规新式学校——师大女附小、师大女附中、南开大学。高二时她瞒着家里独自去考南开大学预科，录取后家里其他大人都不放心她单独外出读书，只有外公鼓励她——能考上南开不容易，全力支持她离开北平到天津读书。几年后妈妈从南开毕业想去美国留学，学成后回来教书，看重学问的外公又很赞许这一想法，但外公的经济能力是无法供应她去美国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卖了珍藏的一些宋版古书，让她和伯郊大舅（文珂）一起去日本留学。外公认为女孩子做学问，还是读史为好，建议妈妈研究在日本资料丰富的明末清初史。在过了语言关之后，妈妈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历史研究院读书，指导老师是日本史学界颇有威望的羽田亨先生，也是外公的日本朋友。他佩服外公的渊博学识，妈妈得到他的悉心指导。

妈妈在大学读书和留学期间，外公曾特地去山西赵城广胜寺鉴别所藏《金藏》（俗称赵城藏）。鉴定无误之后，又在周边老百姓家加以收集，得5700余卷。后与广胜寺住持和尚订立借约，以赠送该寺所缺的《磧砂藏》影印本一部及给予借资三百元为条件，选借可印之经，运至北平，并在北平图书馆展出，供世人观摩。然后，外公和叶恭绰先生等又忙着选择其中的一部分，由北京三时学会编成《宋藏遗珍》在1935年出版。^{（1）}

（1）参见柳向春著《吴兴徐森玉先生年表》，《徐森玉文集》（上海博物馆编）第191 - 19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

七七事变爆发，妈妈和大舅中断了在日本的研究生学业，妈妈后考入上海海关任职。1939年她与已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爸爸辛笛（本名王馨迪）通信，爸爸约她去欧洲，一起到法国巴黎留学。在亲人中妈妈最相信外公，这件大事她必须与外公商量，而外公此时正远在安顺、昆明等地奔走，为故宫文物南迁、为北平图书馆安置善本古书等事而忙碌，并摔断了股骨，在医院躺了几个月之后，已在恢复之中。于是就有了她和外公的几次通信，这些外公的来信有幸保存了下来，让我们更了解外公的那颗慈父之心。

在现存的十通信函中，有五通谈及与赴欧留学相关事宜。其中1939年7月19日函尤为具体，得知妈妈想去欧洲与爸爸一同求学之事，外公思考了一夜，列出七条理由支持女儿的决定。

一见外公对妈妈性格的了解：“沪事非但与汝所学异途，且以汝之不屈服之精神论之，决不能长久服务下去。”

二见对女儿终身大事的看重：“汝披沙拣金有年，得一王馨迪自非寻常之盲从者可比（余闻此事亦深庆幸）。”

三见他对未来女婿的关心：“若令王馨迪提前归国，于学业上损失太大，渠既将为我女婿，应事事从渠之方面着想。”

四见他对经济考虑的周全：“现在镑价太高，汝赴欧之费用是一大问题，唯有请汝三叔将预备汝之婚礼费移作此用，余意即稍举债成就此举，亦觉称心，惜余太穷，不能加以援助也。”

五见他对一切世俗之见的摒弃：“将来汝两人学成归国，双双拜见汝三叔，其荣幸当过于排场之婚礼十倍也。”

六见外公思虑细到对着装之建议：“中国女子衣服著至欧洲甚为雅观，与男子不同，汝若至欧，不必另制服装。”

七见外公就已能力想为女儿出力：“牛津大学已聘陈寅恪为教授，聘中国人为教授此是第

一次，不识陈往就否，余即作函询之，如陈赴英或可指导汝若干事也。”这些看法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叹不已。

战争期间，邮路不够顺畅，沪黔信件途中需多日往来，外公因未接到回信在8月12日又驰函劝慰女儿：“文绮知悉：前寄各信谅已收到。现国币惨跌，汝赴英或有阻碍（因久不接信遂生悬想如此），亦当随遇而安，徐图办法，万不可焦急，至要至要。惜余远在数千里外无法为汝划策也。”

外公考虑到赴欧费用筹措不易，也想为女儿分担一些，8月19日又去函：“近想各函均已收到矣。法币惨跌，金货大涨，赴欧日难一日，好者汝志已决，或可打破重障碍也。余藏汉魏石经三百余，可值万元，惜远在北平，鞭长莫及，如此物今能易钱，当全数给汝（余已写信托人）。”妈妈得知这一决定，立刻发电报，急切制止外公为她留学将心爱之物出售。

外公接信时欧洲局势已大变：“文绮知悉：欧战爆发已一星期，从前一切计划皆须变更。得汝来电阻售石经，此事系托燕京容君与彼方商价。欧战起后此项买卖谅已停止。已顺汝意电告容君矣。此后汝之方针如何？仍以读书为是。王馨迪君当提前归国。余股部已大愈，能跛行四五华里。”（见9月7日函）

确如外公所说，爸爸因欧战硝烟弥漫而提前回国，且经沪回天津奔母丧。妈妈当然也无法去欧洲读书了。此时妈妈已调至海关总署工作。外公9月26日函中对妈妈仍有提醒：“文绮知悉：余赴筑一周归来后，读九月二日来信（另一张是廿八日写的），知汝已调总署工作，治学读书是一件事，办事又是一件事，不要混而为一，自不觉矛盾了。王馨迪过沪当已晤面，现计抵津矣。余当年收汉魏石经不过一时高兴，本身外之物，汝看得太认真了。欧战起后，此种交易当然罢议，望放心。”

为赴欧筹措经费，父女俩互相为对方着想的惦念到此才画上句号。

三

爸爸一直对外公所言他是妈妈“披沙拣金”而得一说甚为得意。殊不知，外公爱女更深，也许是爱屋及乌。1939年12月12日家信外公如此写道：“文绮览：寄沪信尚未封，又接汝书附馨迪上汝三叔书，文理尚优，字迹颇似其尊人慕庄先生，一览便知为谨饬之士，欣慰无似。正拆汝信时，隔邻沈其道兄（嘉兴人，北大毕业，最善笔札）来谈，即以汝信及馨迪书与阅，沈云：‘王君函无时俗习气，但较之令爱尚逊一筹。’（汝大伯来示亦有此评）或系当面恭维耶。”看来外公也应认识我爷爷王慕庄（名其康），最后一句有着为父的谦虚，但不排除与他人的评价有同感。

1940年4月24日外公接到妈妈寄他的订婚照，又有评价：“文绮览：前接来信并与馨迪订婚时所照照片二张，对之欣慰之至。汝前寄来合影二小张。馨迪形容严整，余故以敦厚评之，兼则文采焕发，气度轩昂，可见心境与面貌甚有关系也。余身体甚好，日内拟赴滇转港，料理居延汉简事。汝劝余来沪，余亦有此意，未识有机会否。”

当时外公除了在贵州安顺守护故宫文物外，信中提到的居延汉简也是他心头的大事。早在卢沟桥事变后，外公曾悄悄潜回北京，指导并协助西北科学考察团干事沈仲章先生将原藏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万余枚居延汉简设法运出，经天津、青岛，辗转入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外公先期到达香港联系，在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先生1938年1月12日的日记中就有记载，讲述在青岛沈仲章一时没赶上开船，托了他人把居延汉简带至香港，许地山先生、陈君葆馆长和外公闻之都不放心，打听查找之后得知船已到，东西都在。外公约陈先生立刻到小祈园碰头，准备中饭后就将汉简运至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保存。陈先生的日记十分形象地写出了外公的个性：“在小祈园门口下



王辛笛和徐文绮订婚照

车，森玉已经在那间茶室里面等得十分不耐烦了。我才进门他便叫‘伙计，开饭，开饭，快点，快点拿来。’他性子急的了不得，我倒觉得这一点很可爱，因为穿长衫的民族第一种毛病便迂缓不切事实，所以每致债事。凤坡的可爱亦在此点。在我坐定后之两三分钟内，森玉又催那伙计不下七八次了。素菜端来，我急忙的吃，但是结果还是森玉比我先吃完。我想他性急有点像焕文。付款后我们离开小祈园看看時計只不过十二点一刻，这心里才舒服。”^{（2）}

现在回想起来，性急是外公，甚至是徐家人的一大特点，记忆中外公急着早早去上班、去做事，也是其性格使然也。

当然，最终外公还是为影印居延汉简等事在香港忙碌，未能到沪参加女儿的婚礼，于

（2）陈君葆著《陈君葆日记》（谢荣主编）第337页，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

1940年6月9日写信表示了作为父亲的祝愿：“文绮览：接来函，得悉一二。汝婚期距今尚有两个月，本想来沪参加典礼，因有他种关系，业已作罢。彼时或尚在昆明，惟有遥祝汝二人鼋勉同心，百年偕老而已。来香港视我一节，万万不可，缘欧战后，此间大非昔比也。曾购蜀锦被面二条，作为赠品，因滇越路检查太严，未带来，他日再用包裹寄沪。”可见出他尽心尽力在为妥善安置中华文物而“老境如奔轮”（见8月19日函），不顾年老病伤，甚至连女儿的婚事也顾及不上。

1940年底，外公被教育部派到上海，与郑振铎先生等“文献保存同志会”接洽，帮助鉴别收购流散在市面上或藏家准备出售的各种古书善本。这在郑振铎的日记书信中都有记载。一部分最珍贵的宋元古书80多种由外公负责运送，经香港再运往重庆。郑振铎写道：这事“费尽森玉先生的心和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国立中央图书馆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³⁾另有一时运不走的，也由郑振铎和外公找可靠的人家存藏，我们家也是度藏地之一。郑先生在《求书目录·序》中就提到，后来一位医生家遇到危险，把藏在他家的书全都搬到我们家。中南新村我们家的三楼一间房间就放着数十箱善本书，孩子是不许进去的，门上挂着锁。留存在上海的那些书也是日本人千方百计想搜寻的，爸爸妈妈和其他几家一样“代为度藏许多的图书，占据了那么多可宝贵的房间，而且还担当着那么大的风险”。他们悄悄地守护着这些古书，直到抗战胜利后，又由郑先生和外公负责运出，妥善送交北平图书馆。为此，郑先生特别感谢代为藏书的人家：“在这些友人们里，我应该个个的感谢他们，永远地不能忘记他们，特别是张乾若先生和夫人，王伯祥先生，张耀翔先生和夫人，王馨迪先生和夫人！”⁽⁴⁾父母则

觉得他们追随外公和郑振铎先生略尽了绵薄报国之意。

施蛰存先生健在时曾对我讲起过，抗战期间，外公从重庆飞到福建，在长汀厦门大学，和他住过一阵。当时重庆飞上海的路线到江西中断，只好先飞到福建，然后走公路，经浙江杭州才能到上海，有不少朋友，施先生都是送他们走这条路线，他自己也是这样回上海的。外公和施先生交往的这段经历我以前不知道，还是第一次听说。由此也可见外公为文物之事风尘仆仆地奔波。施先生认为外公学问那么好，应该写下不少东西。却不知外公除了在早年攻读化学时候曾编著过《无机化学》（与人合作）和《有机定性》外，于文物鉴定、版本目录学等方面并没有留下专著。他淡泊名利，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鉴别、搜集、保护文物古籍古迹的实际活动中，对指导、提携青年人不遗余力，却没有精力再去著书立说了。

四

文堪舅舅曾多方查找外公所编《无机化学》和《定性分析》二书，均未找到。前不久，友人从网络上下载了一段文字给我，系晚清《学部官报》1907年第26期第40页上有关官方审定书目的批复：

举人徐鸿宝等编辑无机化学请示禁翻印稟批

稟悉查该书论理清晰体裁亦善堪资参考所请给予版权一节应俟农工商部

民政部订律通行后再行核办此缴

可见外公当年确实编有此书，当时学部对教科书的审查是比较严格的，批复文字中对该书也有简洁明了的12字评价。那时已有版权观念，也才有打报告请示禁止翻印一事。至于外公治学的方法在他生前我未能亲聆教诲，但从梅兰

(3) 郑振铎著《求书目录》，《郑振铎日记全编》（陈福康整理）第19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 郑振铎著《求书目录》，《郑振铎日记全编》（陈福康整理）第100页。

芳大师的秘书许姬传先生所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⁵⁾中得知一二，许先生记录了他与外公的交往：

徐森老学识渊博，善于鉴定金石、版本。但他的个性恬淡，既不炫耀自己的知识，又没有名利思想，他没有留下什么煌煌著作，我和他往还中，获益匪浅。

一九五一年，我正写《舞台生活四十年》，有一天，他来我家聊天。谈起写作，他说：“看了你在《文汇报》的连载，很有意思，你要下工夫把这部书写好。”

“我没有写过长篇的书，不知应注意哪些方面，请您提意见。”我知道他往来的饱学之士很多，希望他告诉我些窍门。

“写书最重要的一条是集中资料，在选择资料、运用资料方面要有自己的见解，要学会辨别精粗真伪的能力。凡做一件事，其成败往往取决于方法，你的乡前辈王静庵（国维）先生的著作所以能光景常新，颠扑不破，就是他的方法好，你见过他吗？”

“在苏州见过一面，他来拜谒先祖狷叟公，那时我才九岁，他们谈的学术问题，我听不懂。”

徐先生笑着说：“王静庵写书的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徐先生用亲身经历，阐述了王先生的写作方法：

“有一天，我去他家，静庵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书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收来的善本。我们聊天时，他总把话头引到这部书上来，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另有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是用此法谈话，有时提出问题和我们研究，如有相反的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取得的结论，他都记在笔记里。”徐先生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隔了一个时期，再到他家，问起《宋

元戏曲史》的情况，静庵说：‘已看过校样，静等看最后清样。’这时，他的书房里，桌上、架上、凳子上有关那本书的资料，全都收起，另换下一本书的资料，谈话的题目也变了。”

徐先生最后说：“王静庵写书的方法是最科学的。刚才我说的三个字，‘博’是说他掌握的资料丰富；‘专’是集中精力，把它写好；‘细’则包括一稿、二稿……乃至校对装帧，都要缜密周详。你是聪明人，自己去琢磨吧。”

那天的谈话，我记在本子里，已毁于劫中，但现在回忆，还能说得很具体，可见当时印象的深刻。

在妈妈的回忆中也记得有此三字，外公见妈妈喜读王国维（静庵）先生的《人间词话》，也曾告知类似的治学方法，以此鼓励妈妈：凡做一件事，成败决定于方法。王静庵的治学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博就是要博览群书，掌握丰富的资料；“专”是集中精力，



徐森玉与徐文绮及友人

(5) 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专心致志，如若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则方圆皆不成也，“细”是指对做学问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所根据，缜密周详，马虎不得。

1955 年外公曾为上海博物馆一年中所收购的名画选择部分印成画册而作序，文中谈到历来鉴别古画不宜执一以绳的三点根据：一是胶执于某一画家某一时期的特点，若只注意此，就无法辨别他一生各个时期的成绩；二是拘泥于画家的署款、印鉴和画的质料，这些方面对鉴别是有帮助的，但过于刻板，也会有误。三是特别看重历来的著录，著录有助于鉴别，但过于看重，也会有出入。文中另提出两点，首先要熟习画家所处时代的风尚，不单要个别地熟习每一个画家，并且要从许多同时代的画家作品中，看出他们的共同风格，因而得到古今画法逐渐发展的一个清晰的轮廓，这样就容易把握用来鉴别个别的古画。但了解风尚又决不可机械，要从中知道演变之迹。其次要熟习每一画家的面貌和精神，同时对他家庭环境、师友渊源、平生事迹、经过地区，甚至异派的评论，都应加以考知的。画家创作从不成熟到成熟一般是有一条贯彻始终的线索，掌握这条线索，就可以认识画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别，既有技巧作风上的一致性，也辨出各个时期的各种特点。⁽⁶⁾

我感觉这些鉴别经验实际上与治学的道理也有相通之处，当然，治学面对的是已知的确定的对象，而鉴别的是不确定的对象，要辨别真伪，难度更大。这些文字今天读来仍有启发。

五

文化大革命初起，外公与巴金先生、贺绿汀先生等首当其冲，被列为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中，受到冲击。从国际饭店的十四层楼悬挂

下的长幅标语写着：“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贼徐森玉！”墨写的名字上打着红色的×。我们惊恐地回家问父母，不是外公为国家鉴定、收集了那么多珍贵文物古籍吗？不是说他估价准确，既不让国家收购吃亏，也不亏待卖家吗？不是周恩来总理说外公是“国宝”吗？怎么一下子变成“国贼”了？！怎么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后来才知道，牵扯到 1948 年底国民政府决定要将文物迁往台湾一事，那时家在上海的外公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主要坐镇南京。与在日寇眼皮底下抢运文物古籍南迁不一样，外公是不同意如此做的，从他给台静农先生的信里可见一斑：“衮衮诸公妄以台湾为极乐国，欲将建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十日，厕陪末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采纳。”⁽⁷⁾但没有想到的是，最后要求负责督运的指令又落在了外公身上。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只能拒绝自己去台湾，却无力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他只好叮嘱跟随押运的庄尚严先生，保护好运到台湾的文物。应该说，庄尚严先生是遵守了外公的嘱托和他自己的许诺的。两年前我去台湾故宫参观，“翡翠玉白菜”、“肉型石”等文物都被精心地保存着，供民众参观。

而外公在“文革”中不要说保护这片土地上的文物古迹不受人造的损毁，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了。造反派在外公家没有抄出值钱的东西，就到我们家来，门敲得乒乒响，吓得我们胆战心惊，结果也是一无所获。他们还逼着妈妈参加外公的批斗会，看着亲人被批斗，那是很残忍的，妈妈心疼之余，却看到外公和陪斗对象尹石公老先生旁若无革命群众，竟当场大声争论起一首古诗的解释，整个会场为之惊讶。人活到这个份上，也就活出了境界，

(6)《画苑掇英 序》收入徐森玉著《汉石经斋文存》(徐文堪编)第 181 页至 190 页，海豚出版社 2010 年版。

(7)徐森玉《致台静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收入《汉石经斋文存》(徐文堪编)第 229 页至 230 页。



1997年，徐森玉次子徐文堪拜会季羨林

可以置荣辱生死于不顾。在文化广场上又一次集中批斗一批文化老人，其中就有外公和严独鹤老先生等。上海图书馆手稿馆的萧斌如老师当年是目击者，看着几个人把颈上挂着大黑字牌子的外公从台上拖下来，踉踉跄跄地一路被押走，台下有人忍不住喃喃自语道：“罪过，罪过……”。

1971年5月妈妈在干校接到外公的病危通知，她立刻赶到市区淮海医院。只见头发全白的老父躺在病床上，他的耳朵已完全聋了，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好婆和小舅舅照顾不过来，妈妈在一旁小心侍候，父女俩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5月19日被称为“国宝”的外公，一辈子为祖国积聚文物的外公，在遭受人格污蔑的大革文化命的非常时期，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含冤凄惨地走完他90年的生命历程。也许，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最疼爱的女儿终于赶回来为他送终；也许他更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爸爸得知噩耗，回沪奔丧，看着老丈的遗容，想到他奔波的一生和最后的遭遇，不禁悲从中来，连写三首七绝：

一九七一年夏五月十九日徐森玉丈高龄衰病，

含冤逝世⁽⁸⁾

衰翁抱病获丛残，批斗登台应诺难。

劳瘁都缘文物累，深情留与后人看。

夕阳门巷影参差，绵惓叮咛漏尽迟。
已属高年闻道去，九原何日了心期？

许国何须惜此身，此身虽在亦堪惊。

百年终是匆匆客，一例龙华道上人。

爸爸感叹外公“劳瘁都缘文物累”、“许国何须惜此身”，正是知己之言。父母告诉我们，原先得到国务院来的消息，告知遗体暂时不作火化，听候国务院处理。他们心头感到一热，将遗体送到医院冰库保存。但一周后没有等到国务院的正式通知，相反，上海市革会通知家属：国务院不出面了，遗体由家属自行火化，而且骨灰也不能安放在上海。家人只好在苏州郊外的七子山麓选了墓地，三年后父母将外公的骨灰安放入土，当时既无财力也无精力更无权利妥善置办此事，只能请当地人在一块矮碑上刻下“徐森玉之墓”几个字。父亲再写七绝两首：

二悼徐森玉丈

小引：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为森丈营葬于苏州七子山麓，落日衔山，人影在地，四顾苍茫，怆然久之，惟闻远处传来寒山寺暮钟而已。

何期营葬送斯文，山下人家山上云。

万事于翁都过了，斜阳无语对秋坟。

知在秋山第几重？全凭溪水想音容。

横塘不见凌波路，坐听枫桥晚寺钟。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外公逝世8年后，1979年2月19日在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为外公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名为“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骨灰盒里只有一副外公晚年常用来鉴定珍贵文物的老花眼镜，还有帽子等物。热爱祖国，忠于民族文化事业

(8) 1979年发表时为《三悼徐森玉丈》的《一悼》并有小引：徐森玉丈毕生治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之学，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不遗余力，横遭打击迫害，终以九十衰龄抑郁含冤，在上海病歿，时为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三悼徐森玉丈》收入王辛笛著《听水吟集》第14页、第29-30页、第40页，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的外公，作为一代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的名誉终于得到了恢复。我跟随家人参加了这次追悼会，外公放大的照片摆在正中，还是我童年时代的印象：胖胖的，慈眉善目的模样。爸爸又一次忍不住为外公三写悼诗七绝两首：

三悼徐森玉丈

小引：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有幸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参加森丈骨灰安放仪式感赋。

平生风义不为钱，样叶书屏作嫁钿（注）。
喜有是非公道在，瓣香甥馆祭尊前。

沉冤当日叹难埋，终幸安排到烬骸。

满眼风帆都是愿，一襟明月更开怀。

注：四十年前森丈嫁女，仅以宋版书散页四枚代奁。

在此之前爸爸曾独自一人去给外公扫墓，天色灰蒙蒙的，飘洒着细雨，他漫山遍野地寻找外公墓，荆棘杂草齐腰深，竟然没有找到那块矮碑和墓旁做伴的那棵小树。追悼会上我们都没有哭泣，已经欲哭无泪了。但读爸爸的悼诗七首，感觉在平淡沉静超然中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痛心，令人热泪盈眶。

1983年上海博物馆尊重亲人入土为安的意

愿，不再迁墓，而是重新做墓。根据当年买墓的记载，找到了山林深处外公的墓。墓碑落成那天，我代表当时未在上海的父母，和文堪舅舅、泽淮舅母一起随博物馆的领导来到七子山麓，那里已成为大片墓区，靠路口有很豪华的墓冢，也有简朴的墓碑，白花花的一片。外公的墓在山林最里面，所以爸爸会写“知在秋山第几重？”没有汽车路，只好步行近半小时，一条泥泞的羊肠小路通往那里。周围一片绿色，间杂着仍是黑黢黢乱石堆成的无名氏的坟头，和此前外公的墓一样，长着很高的杂草和带刺的灌木丛。可以想见非常时期有那么多冤死的魂灵，多少亲人泪洒七子山麓，惟有“山下人家山上云，斜阳无语对秋坟”。现在外公的墓是那里最像样的，收拾得最干净，汉白玉石的墓碑上系外公的老友李一氓先生的题字：“徐森玉先生之墓”，旁边落款处是子女的名字：徐文炯、徐文绮、徐文堪。墓前我们带去的鲜花花篮在一片绿草褐石中显得分外夺目。我们向外公墓行礼鞠躬：外公您老人家可以安息了。

2011年，在上海博物馆召开了“徐森玉先生纪念座谈会”，大家从各自的角度介绍了外公的事迹：真正为中华民族作出呕心沥血贡献的人，民众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上海博物馆赠送

了编撰和出版的《徐森玉文集》，这是迄今收入外公文章最全的集子。书后附有柳向春博士所撰的《吴兴徐森玉先生年表》，他重于考证，言必有据，花了大功夫。我们家属还期待他能在年表的基础上撰写成外公的年谱，并在以后编选出外公与亲友来往的信札，为这位淡泊名利的老人留下更多的文字资料。

感谢上海博物馆为外公所做的一切，也感谢柳向春博士所付出的辛劳。

2011年11月于上海西南角



徐森玉长子徐文炯（伯郊）与张大千

全凭溪水想音容

——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

The life story of Mr. Xu Senyu

撰文 / 陈燮君

2011年是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40周年纪念之年。徐森玉先生的女婿、诗人王辛笛曾写下诗句悼念徐森老：“何期营葬送斯文，山下人家山上云；万事于翁都过了，斜阳无语对秋坟。知在秋山第几重？全凭溪水想音容；横塘不见凌波路，坐听枫桥晚寺钟。”“全凭溪水想音容”，对这位曾经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的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今时今日的我们，除了深情地怀念，更应该学习他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对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和他的高风亮节，努力为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奉献出应尽的力量。

一、从前清举人到“文物守护神”

徐森玉先生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迁居至江苏泰州。母亲闵氏是浙江名门，家族世代以刊刻古籍为业。徐森玉先生少年时就读于家塾，后来进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徐先生考进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后曾编撰《无机化学》和《定性分析》等书，有“奇才”之称。山西大学堂毕业后，徐先生历任奉天测图局局长、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等职。



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

民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当时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艺术工作由社会教育司管理，鲁迅为该司一科科长。在这段时间，因两人都对摆弄“黑老虎”（古碑拓片）有着浓厚的兴趣，便经常结伴浏览书肆鳞次栉比的琉璃厂。

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随即由摄政内阁组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徐森玉先生作为教育部佥事参加此项工作，与马衡、庄尚严等十余人负责清点、接收清宫的文物和财产。此后又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故宫古物馆馆长，直到1950年任职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即后来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才离开故宫古物馆的相关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形势日益险恶，故宫博物院为了文物的安全，开始策划南迁。1933年起，直至1936年底，经历种种周折，故宫的文物先迁到上海，然后转运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也不再安全，故宫文物必须再次转移，在这次大迁徙中，徐森玉先生跟随庞大的车队，从武汉到长沙，再到贵州，把文物藏进安顺山区。1938年，他在昆明郊区为北平图书馆寻求保存图书珍本的地方，由于山路崎岖，不幸跌伤股骨，治疗5个多月还是落下了残疾，从此只能拄着拐杖蹒跚行走。之后随着日军侵略威胁的加大，广西、贵州也变得岌岌可危，藏在安顺的文物，不得已再次转移。此时已经年近花甲的徐先生拖着一条残腿，与同伴们一起翻越几十座大山，闯过土匪出没的地区，屡经风险，才把文物安全运抵重庆。

即使在这样的艰危时局，徐森玉先生仍冒险从敌后抢救出了居延汉简。当时他在长沙获悉，居延汉简还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大研究所，于是秘密回到北平，与青年学者沈仲章克服重重障碍，把汉简经天津运到上海，最后送到香港保存。

在上世纪30年代末，上海已是“孤岛”，人心散乱，不少藏家为生计所迫，开始抛售善本书籍，上海成为南方最大的古籍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刚刚经历了故宫文物南迁奔波的徐森玉先生不辞劳苦，于1940年应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回到上海，与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等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多方寻访、购置散落于坊间的珍籍善本，以避免其流失海外。徐森玉先生和郑振铎先生遍访刘氏嘉业堂、邓氏风雨楼、沈氏海日楼等江南著名藏家，有计划地选购了一大批珍贵古籍，然后将嘉业堂善本捆扎成257个邮包，其余的明善本捆扎成1710个邮包，外加3200余部明刊本、抄本等，陆续寄交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叶恭绰先生负责收存。这项工作耗时共计7个多月，徐先生还在离开时担当起了保护

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当年7月25日，由郑振铎先生执笔的在郑、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特地提到：“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抗战胜利后，徐森玉先生回到上海定居，与郑振铎一起把孤岛时期收购的其他古籍作了一番清点，善本尚有一千几百部。

南京解放前夕，徐森玉先生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名义留守南京，代行院长事。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先生不顾年迈，又全力投入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先后担任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之后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务委员。1960年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还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综观徐森玉先生的一生，为查访、发掘祖国文物奔走于天南地北，在数十年的奔波生涯中，先后发现了辽代古寺、元代戏台、唐代地契、元代阿拉伯式浴池、汉代巨型碑刻，还有周代墓群、楚国木椁等无数中华瑰宝；山西赵城郊区的广胜寺藏有一部刻本大藏经，系金代遗存，学界称之为《赵城藏》，经徐森玉先生的大声呼吁而得以入藏北京图书馆。除此之外，先生还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其中有晋代王献之、宋代司马光、苏轼的真迹，春秋、战国和商代的青铜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秦汉以来的帝王印玺等，苦心孤诣，功勋卓著，无愧学界“文物守护神”的称号。

二、毕生肩负起历史的重托

早在1924年，在北京参加清点清宫文物工作时，徐森玉先生面对大批秘籍、珍品不知去向的境况时，便感到痛心疾首，发愿要以毕生

精力去追寻、查找和保护这些国宝。

在此后数十年的文物生涯中，徐森玉先生从未忘却当年的志愿。前文已经述及的组织故宫文物南迁、抢救居延汉简、抢救“孤岛”古籍善本等工作，无不体现着他的这一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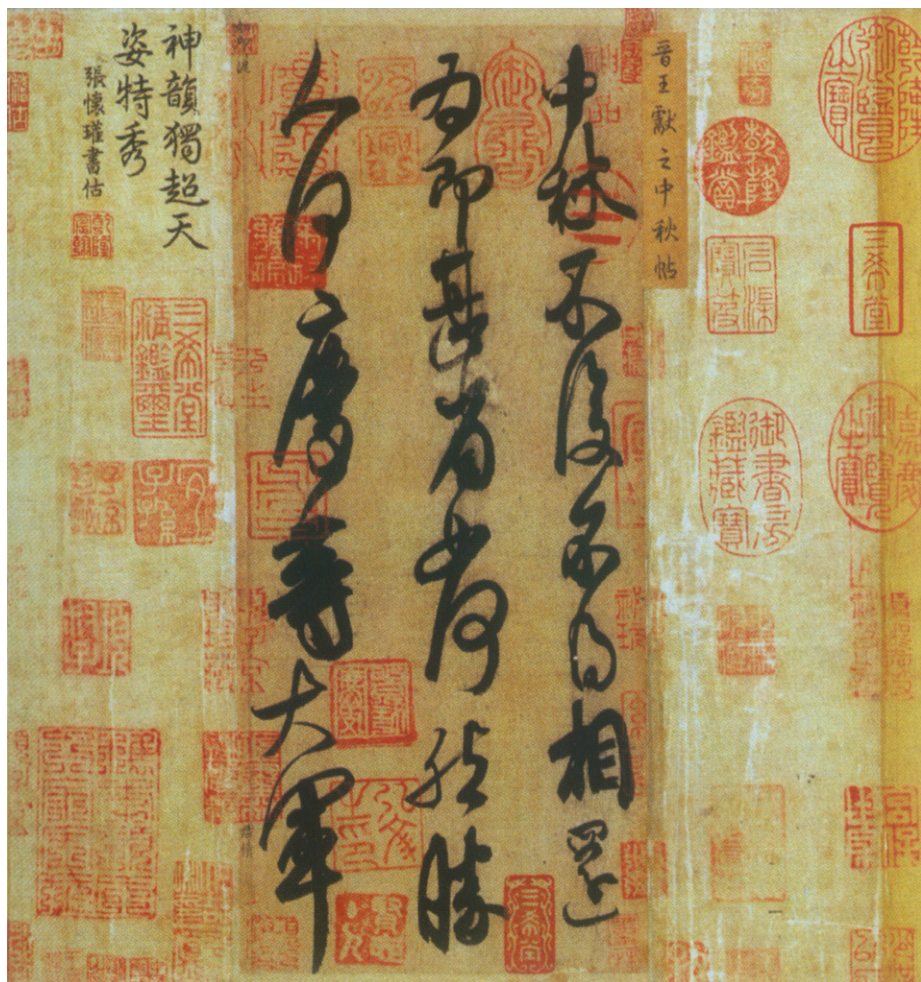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先生的工作重心由北京转到上海。他在任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时，又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上世纪50年代初，文管委下属的两大机构分别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于1950年4月开始筹建，因先期底子较薄，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分量都显不足。

1951年7月，徐森玉先生主持了苏州潘祖荫滂喜斋所藏大孟鼎和大克鼎的捐赠；11月，派人前往苏州，办理顾家过云楼捐赠书画的事宜；次年，过云楼第二次捐赠，两次捐赠多为稀世之宝。1952年，上海博物馆正式成立，上海市文管委把滂喜斋、过云楼及上海其他一些收藏家的捐赠，全部移交给了上海博物馆，大克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蜚声中外。

徐森玉先生在主持上海市文管委工作、直至60年代以后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期间，凭借对善本书及书画、古物的精深造诣和与收藏家的良好关系，为上海博物馆收进了大量稀世珍品，包括王献之《鸭头丸帖》、怀素《苦笋帖》、孙

位《高逸图》卷、赵佶《柳鸦芦雁图》卷、米友仁《潇湘图》卷、孤本《萝轩变古笈谱》等，对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全身心投入上海文博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始终密切关注那些早年流失海外、销声匿迹已久的珍贵文物的下落。北宋《淳化阁帖》就是他所关注的重点之一。

《淳化阁帖》从问世之日起，就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元代赵孟頫说：“书法之不爽，此帖之泽也。”极好地概括了《淳化阁帖》在中国书法史及帖学上的地位。然而在漫长的岁月流转中，祖刻的《淳化阁帖》十卷逐渐散佚，下落不明。据记载，清末江西临川李瑞清藏有家传的《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这三卷，后又从李家散出，先后由蒋祖诒、周湘云收藏。1943年周湘云去世，三卷《阁帖》再度销声匿迹。徐森



王献之中秋帖

玉先生曾经以为此帖仍在周家，但在与家属反复沟通之后，在购进《苦笋帖》和《潇湘图》卷后，仍然没有发现《阁帖》的踪影。此后，这三卷《阁帖》便成为徐森玉先生的一桩心事，他时常叮嘱汪庆正先生，一定要留意《淳化阁帖》的下落。

上世纪80年代初，消失多年的《淳化阁帖》出现于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立刻引起国内文博界的极大关注。可惜当时由于国家百废待兴，没有余力来收回这件国宝。后来又几经辗转，这几卷《淳化阁帖》被美国的安思远在纽约市场上拍卖购得。

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轰动一时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之后从美国传来消息：年事已高的安思远先生看到了展览报道，于是有意出让珍藏多年的《淳化阁帖》，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件文物回到中国的怀抱。

此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立刻意识到了机会难得。数十年来，他从来不曾忘记徐森老的嘱托和牵挂，也一直严密关注着《阁帖》的动向。上海博物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安思远保持联系，希望他能出让此宝，但对方始终没有松口；在这过程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拍卖行也都对《阁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今安思远主动对出让国宝回归中国表达了积极的意愿，确实是机不可失。上海博物馆随即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工作，在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女士的鼎力帮助下，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包括原来周家所藏的第六、七、八卷和安思远另行购入的第四卷共4本北宋《淳化阁帖》于2004年安全回到中国，入藏上海博物馆。这一消息在当年震动国内文博界，启功先生将之称为解放以来回归文物中的一件大事。

汪庆正副馆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动情地回忆道：“我的老师徐森玉说过，今后有几件东西一定要弄回（国）来，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

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都是举世无双的国宝（已于1986年3月回归上博）。另有《淳化阁帖》出去了，不知道在哪里，以后一定要弄回来。……这四卷《淳化阁帖》是中国帖学的祖宗，如果不买回来，那么中国帖学之祖就不在中国。”

从徐森玉先生开始关注《淳化阁帖》以来，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等待，“帖学之祖”终于得以回归故土。徐森老一生对国宝的追寻、珍重与爱护，化作了上博人的事业信念，而这份由前辈手中接下的学术嘱托，也必将在今后的岁月中代代相传，成为华夏文明薪火不断的力量源泉。

三、对国家文博事业无限忠诚

徐森老对上海博物馆的重要影响并不仅限于对珍贵文物的关注与追寻，他对国家文博事业的忠诚与奉献，对收藏家的理解与尊重，对青年人才的提携与爱护，无一不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永远为后人所称道和敬仰。

十年前，徐森老的外孙王圣贻在悼念文章《情牵大鼎》中这样写道：“外公是那样地爱中华瑰宝。每次外出归来，总是如数家珍般地讲着各地的古迹：那隐没在盘山秀色中被岁月剥蚀的唐代寺庙、三门峡‘画廊’中的巨石峭壁上残留的摩崖石刻、山西赵城简朴的元代戏台、有着异域风格的大同城内辽代古寺……就外公那赞不绝口的情感投注中，我看到时间的纽带由古久之往昔伸向未来，感受到了生命源头的那份灿烂辉煌。”回忆起祖孙间的天伦之乐时，又说：“其实，外公很少像这样流露他对我们第三代的爱，他的心完全让文物牵住、占据了。”

这种完全让文物牵住、占据的心，来自于徐森老对国家文博事业的无限忠诚。1939年，为安置故宫南迁文物奔波于贵州、云南一带时，徐森玉曾致函叶景葵，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宝前在西南各地奔走，均为仅存之文物谋置善地。交通阻滞，盗匪出没无常，将来为功为罪，

不能自卜。唯北平图书馆存沪最精之本，卢沟变前，悉数寄归平馆。内阁大库旧藏明末清初地图，全部陷在南京，此则最令人痛心者也。”在那样艰危的情况下，他仍然心心念念牵挂着失陷在北京与南京的古籍珍本，赤诚之心，令人感佩。

徐森玉先生一生从事文物工作，学识渊博，与许多收藏家都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这对他进行文物征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徐先生在工作中从不掠人之美，夺人所好，甚至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为收藏家争取利益。40年代在上海收购刘承 嘉业堂藏书时，因法币不断贬值，双方进行了讨价还价，徐森玉先生的态度是：“为爱书计，我们不能不吃些亏。”又本着对藏家宽厚的立场，表示善本佳抄“以少收为宜”。

解放后，徐森玉先生主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每月都要召开文物收购小组会议，60年代初文管委与上海博物馆合署办公后，会议还是每月召开。经徐先生之手收购的书画、碑帖、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珍贵文物不计其数，其中书画、青铜器、玉器、石刻、陶瓷器等归上海博物馆收藏，图书、碑帖则归上海图书馆收藏。50年代初，收藏家大多家境不佳，有些甚至急需将文物脱手，徐森玉特意向陈毅市长提出，请政府拨款收购，从而不亏待收藏家，同时要求文物征集人员在工作中“不要趁人之危而压价收购，收购的价格要公平合理”。正是因为徐森玉先生的这种真诚与尊重之心，上海博物馆与诸多藏家建立起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


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上海博物馆始终牢记徐森老的教诲，坚持善待每一位向上博捐赠文物的海内外文物收藏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并根据新形势的需要，逐步建立了文物捐赠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除在前厅入口处设立捐赠墙、在陈列的藏品说明牌上标明捐赠者姓名外，还通过颁发捐赠证书、开辟陈列专室、举办回顾

特展、出版学术图录、广泛宣传报道等多种方式，彰显藏家的捐赠义举。对我们而言，与藏家并不是简单的捐赠人和受赠人关系，双方之间更多的是友情，甚至是亲情。50多年来，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的收藏家有一千人次以上，捐赠的等级文物和一般藏品的总数达11万件以上，其中很多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重要馆藏，可以说，没有藏家的慷慨无私，就没有今天上海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无疑正是源自徐森老当年坚持的善待与尊重收藏家的原则。

作为知名的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徐森老的学术造诣备受方家推崇，郑振铎在1950年致唐 的信中说：“森老为今之‘国宝’，……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

然而这样一位被称为国宝的专家却极其淡泊名利，且乐于提携后进。傅振伦撰有《徐森玉的嘉言懿行》一文，在回忆当年安顺华严洞期间的的生活时这样写道：“我们向之聆教版本目录、金石之学，但从以前辈专家自居而自炫自矜，不好著书立说，唯后生求教，则有问必答。”慕周在《敬悼徐森玉先生》一文中则说：“（森玉先生）为国家保护古物、搜罗图书则出力甚大，而未曾稍微夸耀居过功。”

徐森老学识渊博，品行高尚，勇于任事，不计名利。其一生行迹，在香港中文大学牟润孙教授写于1970年的《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一文中有着极精到的叙述，文章最后这样结语：“知雄守雌，为而不有，方之古人，盖诚有得于柱下史之传者也，先生之德其犹龙乎？”

徐森玉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有40年，却仿佛仍在关注、指导我们的工作。他的重要的文博理念仍为我们严格遵循、长期坚守。我们深深懂得，只有对文博事业无私奉献、无限忠诚、矢志不渝、努力工作，才是对徐森玉先生最有意义的纪念。

徐森玉先生和我的父亲郑振铎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r. Xu and my father Zheng Zhenduo

撰文 / 郑尔康

小引：一把大黑伞

“文革”期间，上海“造反派”的一张小报上，有一幅漫画，上面一个身穿黑衣，戴深度眼镜的人，撑着一把大黑伞，下面藏着一个也戴眼镜的胖老头，画边的文字上写着打伞者郑振铎，伞下人徐森玉。徐森玉是当时正被批斗中的“反动学术权威”，而撑着大黑伞保护的郑振铎则是早在1958年就已去世的“走资派”。看了此画，我当时即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没多久，有一帮上海的“红卫兵”到北京来抄我们的家，幸好老天有眼，当时我家已经搬走了，他们扑了个空（事后邻居告诉了我们，说这帮“红卫兵”都是操上海口音的）。

由此可见，徐郑两人的关系之非同一般，而仅就我所知，在徐森老和我父亲的数十年交往中，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故事，现仅举例如下。

挚友·前辈·世交

徐森玉先生是我父亲的挚友，也是前辈。论年龄，徐森玉先生比父亲大17岁（和我老祖母差不多）和鲁迅同龄，都是父亲亦师亦友的朋友，并且在古籍版本的鉴定方面和文博领域的资历都堪称父亲的前辈。因此，父亲在和徐森玉先生无论是在接触中或是写信时总是尊称他为“森老”或是“徐森老”，并多次在有些场合把他称之为“国宝”（周恩来总理后来也曾这样称呼徐森玉先生）。

同时，父亲和徐森玉先生的长子徐伯郊，女婿王辛笛也都是好友（限于篇幅有关细节就不赘述了）。

现在，我和他的次子徐文堪、外孙女王圣思也有了交往，郑徐两家的友谊在延续……



郑尔康在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

“文献保存同志会”高参

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曾有一个在重庆国民政府支持下为抢救民族文献而成立的秘密地下组织。主要成员有郑振铎（暨南大学文学院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等。同时，为了保证所收购古籍的质量，国民政府还特别委派了当时已在重庆的徐森玉先生秘密回上海，

参与“同志会”所收购古籍的鉴定，并负责将大量珍贵善本古籍通过关系秘密运往香港，然后再转运至重庆或通过驻美大使胡适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其中八十余种国宝级古籍运往重庆后，中央图书馆特别举办了一次展览，轰动了整个山城。由于“徐森老”的参与，父亲对“同志会”的抢救工作更是信心十足，他当时曾说“森玉先生为版本专家，有许多事可乘便向他请教，诚幸事也”。又说“森玉先生品格极高，且为此事而来，似无事不可对他谈也”。

“孤岛”的几年间，在徐森玉先生的参与下，“同志会”同人们共同努力所购得的珍贵古籍，足可装备一个中型图书馆，为抢救民族文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振铎是共产党”

“振铎是共产党”，这是抗战胜利初的一天，徐森老亲口告诉唐 的。徐、唐两人都是我父亲的密友，由于他们都常去东庙弄（今愚园路67弄）44号当时父亲的寓所而相识。1946年的一天，他俩在路上相遇，交谈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振铎”、“西谛（父亲的笔名）”和他的事业。忽然，徐森玉压低了嗓音，严肃地跟唐 说“振铎是共产党”，唐 很惊讶，因为父亲当时正在从事着民主运动，不久前他主编的《民主》周刊刚被反动当局查封，他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为对父亲进一步迫害所编造的借口。但徐森玉却很认真地说：“这是黄任之（炎培）亲口告诉我的。”原来，不久前，黄炎培和章伯钧、傅斯年等几位社会贤达应中共中央之邀访问了延安，在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当黄炎培关切地问到江南的文物将如何保护时，毛泽东在一旁插话道：“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于是黄炎培便认定了“郑振铎是共产党”，而徐森玉也的确是，凡有关文

物方面的事，事无巨细，都要到东庙弄44号去找我父亲商量。

“文物的事问郑振铎”，这决不是毛泽东的一句随意插话，因为事实说明，作为领袖，他已经在为未来即将诞生的人民中国的文博事业埋下戏剧性的伏笔。果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即被任命为国家首任文物局长，统管全国文博事业，这应该不是巧合。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父亲任文物局长不久，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示愿将上海家中多年来收藏的汉魏隋唐近七百件文物悉数捐献给国家，受到周总理的支持。但由于公务繁忙，父亲自己不能去沪亲自整理那批文物，于是便委托在沪的徐森老代他处理。徐森老受到老友之托后，便每天去东庙弄44号父亲的书斋，为所有文物清理造册。年近古稀的老人必须小心翼翼地登高，爬上爬下搬动这些珍贵的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国宝”级的。但毕竟徐森老年事已高，几天下来便有些体力不支，于是又请来也是父亲的友人刘哲民先生帮他一起整理，终于在文化部派来接收这批文物的人到达之前，圆满地完成了友人之托。

文物北上了，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父亲“书生报国”的心愿实现了，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正是徐森老高尚的为人之道。

当你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这些珍贵文物时，除了它的捐献者郑振铎，可知其中还有着位古稀老人徐森玉（当然还有刘哲民）的心血呢！

一套紫檀桌椅

文物局成立之初，办公地址在北海公园南门的团城上。那时我正上初中，假期喜欢去北海划船或爬山，中午则去团城上文物局食堂午餐。有一次我走进文物处办公室，⁽¹⁾ 只见一套

(1) 文物局下设文物处、博物馆处、图书馆处及办公室等处室，后又增设社会文化处。

雕工十分精美的紫檀木座椅，父亲告诉我，“这是专门为徐森玉爷爷”而设的。

原来文物局在组建时，父亲便认为文物处长的职位非徐森老莫属，于是，他多次乘南下公务之便，仿效当年刘玄德的“三顾”，亲自造访徐府，请徐森老出山；但徐森老都以年事已高，不适宜去北方工作生活，婉言相拒。父亲对此甚感遗憾，但转而一想，说不定华东方面对徐森老会另有打算，便只好作罢。果然，不久他便得知徐森玉先生已被华东文化部任命为文物处长，而副处长则为唐先生，他十分欣慰！在他给唐的一封信中，要他当好“徐森老”的学生，向他学习，让他多为国家工作，充分发挥他在文物鉴定方面的特长……。但尽管一切已既成事实，团城上，那套紫檀木桌椅，始终“虚位以待”，似乎是父亲在期盼着什么奇迹的出现。对“郑公”的求贤若渴，和尊重人才，文物局上下，无不为之感动。

“国宝”的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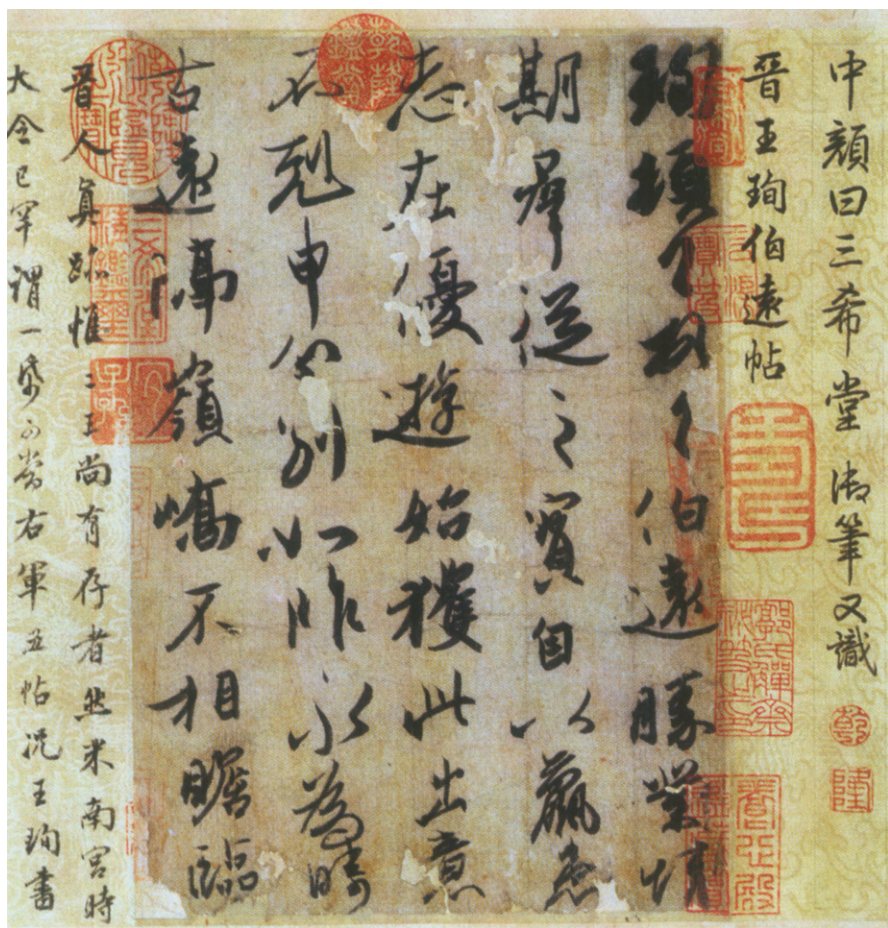
徐森玉先生虽然未能如父亲所愿北上任职，但有关文物方面的事，父亲还是常要请他北上，以便当面讨教。而每次他到北京，父亲总会亲自去车站迎接，为徐森老妥善安排好舒适的住处，然后总要设家宴（老祖母的福州菜，在京沪文化界是很有些名气的）款待一番。但有一次，徐森老和谢稚柳先生一起到北京，不巧那天父亲另有公务，便委派一位办公室的负责人，代他去接待。当晚，我陪父亲去文物局的招待所，看望徐、谢二先生。那是一间只有两张硬板床和一个旧三屉桌的斗室，上厕所都要去院中公厕“蹲坑”，父亲见了大为恼火，当即叫来总务科长和那位办公室负责人，严肃地批评了他们，说：“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国宝’的吗？！”随后，父亲亲自把徐、谢二老送到当时北京最高级的六国饭店，安排住下后，父亲才安心地回家。次日又派车接徐、谢二老来我家，由祖母主厨，

设午宴款待……

以上只是一些小故事，虽然不能表述出主人公们最浓墨重彩的一世辉煌，却也能折射出徐森老和我父亲的人品和交友之道及修养。

今天，徐森老已经久离我们而远去，我想，如果有天堂的话，那么他一定早已和先他而去的父亲，还有张葱玉等许多老友在那里团聚了。那么，那里是否还会有老祖母主厨的福州菜吗？

为纪念徐森玉先生
诞辰 130 周年而作



王珣伯远帖

怀念森老

A cherished memory of Mr. Xu

撰文 / 吴格

徐森玉先生不幸辞世于 1971 年，小子生晚，上世纪 80 年代初始服务于图书馆，自无缘亲接森老道范，但读辛笛先生为森老营葬诗“许国何须惜此身，此身虽在亦堪惊”之句，仍不免沉痛低回良久。

笔者初识森老姓名，得自《中国丛书综录》封面题署。《综录》乃图书馆员案头必备工具书，检索古籍，久称利器。此目由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主编，著录国内数十家图书馆所藏汇刻本古籍，出版于上世纪 60 年代之初，因其收罗完备、体例缜密，至今沾溉后学，无可取代。顾老为图书馆同行共同尊崇之前辈，其德行事功，夙为图书馆古籍工作者之楷模，其身教言传，尤为笔者心悦诚服之指南金针。顾老主持编纂、凝聚老辈图书馆人集体经验与智慧之《综录》，由森老为之题耑，当年即引发笔者遐想，因顾老本人即名重一时之书法家。书名恭请森老挥毫，不仅可知森老行辈在先，更知其学养人品，均为顾老所服膺，而森老法书端凝内敛，气息儒雅，睹物思人，其风范令人缅想不置。

笔者从事图书馆工作既久，略知近世图书文物聚散历史，对森老之敬仰遂与日俱增。森老对于祖国文化事业之贡献，在笔者印象中，具有以下两特色：一是自上世纪初以迄 60 年代，在存

世图书文物之收集整理、抢救保护领域，森老乃属贯穿始终之核心人物，功在国家，不容磨灭；二则森老谦光蔼然，出处波澜不惊，书生报国，本色迄未改易。

早在宣统年间，森老已出任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京师图书馆名誉经理员，自此开始与图书文物结缘。入民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及金石部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等职。民国初期，故都文献经收罗汇聚，陆续归为公藏，其间如京师图书馆之草创，北平图书馆之发展，故宫文物善本之清点接收等活动，森老均亲历躬行。至三四十年代，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之文物善本组织南迁及西运，战事中江浙沦陷区私家



吴格在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

藏书之抢救洽购，战后京津宁沪敌伪机关图书文献之接收分配等，均与今日海峡两岸所藏图书文物珍品之命运攸切相关，而又在在可见森老主持擘画、奔走操劳之身影。森老参与之近世文物图书活动，涉及方面甚广，如其曾任清史馆编纂，曾亲赴洛阳搜集汉魏石经遗石，曾参与居延汉简发掘与研究，曾协助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正统道藏》、《宋会要辑稿》、《碣砂大藏经》等，举凡与图书文物保存、传播相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系者，森老无一不躬亲其事，克尽职守，以至冒险跋涉，遗留残疾。至建国后森老为国家自香港购归国宝，领导设立上海文管会，创立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博物馆，并以其声望人脉，海纳百川，广收博取，汇聚东南图书文物之卓越贡献，尤为今人所详知。今日上海，不仅以国际金融商业大都会知名，又因其富藏图书文物而为世所重，森老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令人永久缅怀。

森老对图书文献之抢救，又有一项重要贡献。森老任职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期间，曾参与东方文化委员会下属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之藏书建设。上世纪20年代末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成立之初，即以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目标，为此制定《东方文化事业图书筹备处办事细则》，并聘森老为图书筹备处事务主任，负责征集提要撰写所需之基本图书。经森老主持筹措，不十年间，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迅速发展，汇聚典籍数十万册，其中清人著述尤富，足补他馆缺藏，由此成为与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鼎足而三之古籍收藏重镇。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1945年经原中研院接收，1949年后又递藏中国科学院，今已成为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饮水思源，森老当年开创之功，未宜忽略。

笔者对于森老之敬仰，又因曾与已故学人叶笑雪先生交往而加深。笑雪先生系浙江江山人，年轻时曾偕童书业先生，随藏书家长兴王修问学，读书王氏诒庄楼。抗战期间，先生远

赴敌后，曾肄业西南联大。建国初期，先生任职上海市文管会，曾为森老部属。嗣转任华东科学院李亚农之秘书，据言李氏关于中国古代史之著作，多经先生协助成稿。1957年，先生无端获罪，被迫解除公职，发送劳教。后以病重命危，遣返家乡，蛰居江山农村20年。“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先生如文物出土，重返沪上，未几自社科院退休。因受王元化先生赏识，先生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嗣获李俊民先生礼遇，受聘古籍出版社特约编审。先生性沈毅，具风骨。劫难中夫妇仳离，独居穷乡，贫病交加，飧食不继，仍潜心研读，迄未废学。其学问博洽，遍及四部，尤长于文献整理。上世纪50年代初，即有《谢灵运诗选》问世。又合校两《唐书》，经乱稿亡。整理《唐开元占经》抄本百廿卷，纬书星占，均能通解，朱笔点勘，一丝不苟。王元化先生屡称其身负绝学，无人能及。先生年事虽高而治学犹勤，严于律己而拙于谋生，虽已平反，仍身如飘萍，艰于一椽之寄，茫茫人海，踽踽独行。80年代后期，复旦友人陈建华兄赴美留学，先生受嘱代管宿舍，遂携女小菊，翩然来止。笔者有幸为邻，遂得拜识高人，朝夕趋晤，多聆教言。先生离群索居，自奉简约，食菽饮水，唯以书卷做伴。亦即其时，笔者获知先生正为森老创编年谱。陋室孤灯，一老孜孜伏案情景，至今犹在目前。先生随森老任事文管会，尚属青年时代，此后世事倥偬，相去忽忽40年，森老逝世亦已廿载。先生历劫生还，虽居无定所，耄年衰弱，因念森老当日相知，素重森老学行，遂力疾著书，表彰前贤，不遗余力。未几先生亦下世，忧患屡更之余，未获尽展所学，言之兴叹。所撰年谱初稿，幸仍存于森老哲嗣处。时际昌明，对于森老生平及著述，搜讨研究，后起有人，年谱重修，正自有待。笔者追念旧游，不禁益慕笑雪先生之风义，又因笑雪先生之风义，更加怀念森老之遗徽。

2011年仲冬吴格谨识于复旦园。



书生报国：一段隐秘的地下斗争史

——郑振铎与徐森玉，真正的无名英雄道义之交

A scholar's devotion to his country: the close friendship generated between Zheng Zhenduo and Xu Senyu in a secret struggle

撰文 / 陈福康

一、郑振铎与徐森玉家两代都有深交

徐森玉，今人未必皆知他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他与鲁迅同龄，又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2011年8月，是他130岁诞辰。徐森玉比著名学者郑振铎长17岁，但比郑父只小3月。徐与郑“忘年之交”，介乎师友之间。两人不仅在学术上有太多的共同爱好，而且他们的友谊是经历过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火的考验的，是可歌可泣的。可惜的是，他们动人的友情故事如今知道的人也很少。近日因赴台开会，去了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向往已久的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等人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秘密抢救珍贵图书的老档案，极欣喜地发现了一些有关郑振铎与徐森玉的新资料。现在就写一写郑振铎与徐森玉的故事，以作为对这两位老前辈的纪念，尤其是作为献给森玉老130岁诞辰的一瓣心香。

民国初年，徐森玉在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处工作，估计上世纪20年代郑振铎就与他相识，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今见1933年朱自清日记，8月，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金代刻本藏经卷子，郑就



陈福康在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

是在徐处得知消息并见到部分经卷的。当时郑振铎兴奋异常，认为“可惊动一世之耳目，或当有类于敦煌宝库的发见”（郑振铎：《一九三三年的古籍发见》）。1934年，郑振铎编印《清人杂剧二集》时，在《题记》中还特别感谢了徐森玉对他的帮助。可知那时他们已经很熟了。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即被任命为国家的第一任文物局局长，负责全国的文物和博物馆、图书馆工作。郑振铎曾热烈动员徐森玉前往文物局担任要职，还亲自为徐布置了办公室，特地安排了贵重的紫檀木写字台和座椅，虚席以待。可惜徐因故不能离开上海。徐被任命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后来又任上海博物馆馆长，这当然也与郑的推举有关。郑振铎几乎每年都要请徐森玉到北京去，以便当面请教。而他到上海时，更少不了去拜访。

郑振铎还反复叮嘱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

长唐弢，要他好好向森老学习。如1951年6月11日他致唐弢信中的话，也许有人觉得他说得有点过头，但这是他对徐的真心评价（后来，周总理也称徐为“国宝”）。信里说：

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

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

徐森玉长子徐伯郊，在香港的广东银行当经理，因从小受父亲熏陶，对古籍、字画亦颇有鉴赏眼力，上世纪50年代成了郑振铎在香港为国家秘密收购文物书籍的重要帮手。徐森玉的女婿、诗人王辛笛，早在30年代就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的部下和文学界友好。因此，郑振铎与徐家两代都有深交。

1958年10月16日，徐森玉出差到北京，下午郑振铎亲自去车站迎接，陪他到故宫招待所下榻，谈了很多话，还热情地请他到家里吃了晚饭。第二天郑振铎就率团出国，不幸飞机失事。可以说，徐森玉是郑振铎一生中最后一个畅谈的挚友！悲痛万分的徐森玉在北京参加了郑振铎的治丧活动，为治丧委员会委员。

郑振铎与徐森玉长达30年的友谊中，最感人的一段是在抗日战争年代。也正是这一段交往，使他们最深刻地互相了解了对方，成为真正的生死道义之交。

二、郑振铎称徐森玉为“今之圣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曾与许地山、瞿世英、林语堂、马鉴、马衡、袁同礼、汤用彤、贺麟、简又文等人一起发起“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于12月4日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20人中就有徐森玉。该

宣言后经香港新闻检查当局删节，登载于5日香港《大众日报》上。

当时，郑振铎坚持留守上海，目睹江南一带的珍贵古籍文献大量散佚、毁坏和被日伪及美国有关机构买去，心急如焚，便于1940年初与在沪的著名文化界上层人士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争取到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了近一年，重庆方面特派徐森玉冒险潜往上海，秘密参与验收和抢救工作。今见1940年12月18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写道：“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的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从此，郑振铎便与徐森玉几乎朝夕相处，并肩战斗。

例如，12月20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即提及“森玉先生来，谈及渝方将开会，索购书之约略统计；兹以二日之力，略加计算，拟就一电”。这个电文于23日由郑振铎化名“犀蹄”（从其笔名“西谛”而来）、张咏霓化名“子裳”（从“霓”字来）、何炳松化名“如茂”（从“松”字来），联名发给在重庆的央图负责人（当时尚未正式任命为馆长）蒋复璁，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第一句话就是：“森公已到，谈甚畅。”又说：“本月廿日止，已得……善本书总约三千种，内宋密州种，元本七十种，明本千余种，名人抄本八百种，未刊稿本三十余种，密藏孤本不少，其他普通应用书为数更多……共用款约四十二万。”这封电文今存台湾“国家图书馆”。12月21日中午，徐、何、张三人还应约至郑家午餐，研究问题。23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提到当时收购的图书装箱后，“当即由森玉先生及我共同签字贴封为凭”。徐森玉还与郑振铎一起去嘉业堂刘宅、中

国书店金宅等处鉴定和挑选图书。1941年1月16日，徐森玉请郑振铎、张咏霓、何炳松到他家午餐，并商议如何将书运出等事。

徐森玉充分了解和体验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特别是郑振铎的艰苦忘我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1月20日致蒋复璁信，表彰郑振铎等人为国家抢救文献，“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2月20日，何炳松致蒋复璁信说：“此间事实际奔走最力者，当推西谛（郑振铎）兄。而版本价格之审定则咏老最称负责。自森公驾临后，日夕与西谛兄商讨新本，检点旧藏，逐书经眼盖章，劳苦功高，同人极为心折。承奖贤劳，唯上述三公，足以当之无愧。弟则始终仅负支付款项之责，即此且与咏老共之，确属无功足录。”这两封信，今亦藏于台湾。当时，徐森玉和何炳松都建议重庆当局应该给郑振铎一点奖励和补贴。这件事被郑振铎知道了，2月26日，他给蒋复璁写了一封长信。此信最能看出郑振铎高尚的品德，令人感动不已：

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

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

弟自前年中，目睹平贾辈在此专营故家藏书，捆载而北，尝有一日而付邮至千包以上者。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

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我辈若不急起直追，收拾残余，则将来研究国史朝章者，必有远适海外留学之一日，此实我民族之奇耻大辱也！其重要似尤在丧一城、失一地以上。尝与菊（张元济）、咏（张咏霓）、柏（何炳松）诸公谈及，亦但有相顾踌躇，挽救无方也。故电蒋（介石）、朱（家骅）、陈（立夫）、翁（文灏）诸公陈述愚见，幸赖诸公珍护民族文化，赐以援手，又得吾公主持其间，辛劳备至，乃得有此一岁来之微绩。虽古籍之多亡，幸“补牢”之尚早，江南文化之不至一扫而空者，皆诸公之功也……

我辈得供奔走，略尽微劳，时读异书，多见秘籍，为幸亦以多矣！尚敢自诩其功乎？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

……国难未已，分金均宜爱惜，我辈书生至今尚得食国禄，感国恩已深，虽此间生活程度颇高，然量入为出，差足仰养俯育，更不宜乘机取利，肥己肥家。读书养气，所为何事！见利忘义，有类禽兽。良知未泯，国法具在。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

蒋复璁见此信后，感动异常，他又来信苦劝郑振铎收下些微补贴，但郑振铎还是坚决谢绝了。徐森玉对此深为佩服。

到6月中旬，“文献保存同志会”原打算将工作告一段落。1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昨又寄出书一批；大致在下星期内可告一结束；我辈如释重负，可放心得多矣！”又说：“我大约本月底即将动身。森公归心如箭，亦将同行。”当时的珍本大多邮寄到香港，由许地山等人收下暂存，然后再设法运往重庆。郑振铎打算亲

自去香港办理转运事宜，徐森玉也要转道香港回内地。今在台湾保存着6月24日郑振铎起草的发蒋复璁的密电：“公是货（按，宋人刘敞有《公是集》；公是货‘暗指刘晦之的书’）已运港，急待点交，拟推诿于便中南行，专办此事……森公亦决意内行者，与尊处专员面洽尤佳。余事俟诿返后续运。究竟如何，乞速电复。”后来，徐森玉于7月24日乘船离沪赴港，郑振铎则因抢救珍本图书和装箱邮寄的急迫工作实在走不开。他后来在《求书日录》中回忆说：

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度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得这批书之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听说颇为耸动一时。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凡三千二百余部，为我们二年来心力所瘁者，也都已陆续的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亡友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行装箱设法运到美国，暂行度藏。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

徐森玉这次在上海一共参与了7个多月，离开时还承担了保护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7月25日，郑振铎执笔的与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提到：“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称徐森玉为“今之圣人”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9月11日，郑振铎执笔的与张、何三人化名致蒋复璁信又提到：

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运尊处……现寄递各书，均系由森公独力负责。写中英文书目及付航邮各事，均是森公亲自料理。投寄时，森公竟立候数小时之久！

可佩，可感！余书装箱起运，亦系森公独立自主主持。犀（按，即郑振铎）本约定与森公同时南行，因此间琐事极多，未能料理就绪，暨大又开课在即，竟不能与行，未得稍分其劳，心中至为惭愧不安。装箱事，闻已工作二十余日，尚未完事，可见其麻烦琐细，非森公之吃苦耐劳者，决难从事也。

三、黄炎霄商应向两先生致最恳挚谢意

徐森玉一走，郑振铎立即又面临抢救收购南浔张芹伯的一大批极其珍贵的适园（又称园）藏书。今见8月26日郑振铎致徐森玉信说：“此事如成，我辈之工作便无多大重要者矣……为民族文化计，我辈决不辞劳瘁，不畏艰苦。亦书生报国之一道也……回想先生在此，事事得以请益。甘苦与共，回味犹在。今复何可得乎？先生能再来一行乎？深盼能有此一日！”但这批书价钱昂贵，必须说服政府拨给巨款，而重庆官方“识货”的人也不多，徐森玉回到内地，正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月7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说：“昨得森公自渝来一‘江’（按，即3日）电，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此事，实非同小可！今在台湾看到当时教育部有“为奉主席代电令，仰该馆（按，即央图）迅即鉴定收购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具报”之文件，可知收购适园藏书之事还一直通到了蒋介石那里！

经费问题虽然终于解决，但郑振铎在前方与张氏的议价谈判却反反复复，一波三折，极其困难。直到10月22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中还说：“闻芹书有某方向之接洽说，时刻有变化发生……如芹货竟为某方所夺，关系非浅！”“某方”当然是指敌伪！而翌日，郑振铎与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终于报告大事成功，并附《希古堂与张芹伯订立购买园全部藏书合同》。今在台见到这份郑振铎手写的信和合同，“希古堂”无疑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一个化名。信中说：“此合同可于今

日下午或至迟明日下午签订。签订后，乃可放下一件心事矣！数月辛勤，告一结束，殊可自慰也……俟合同签妥后，当即进行潘货（按，指宝礼堂宋元版藏书）……又闻瞿氏兄弟有分爨说，藏书（按，指铁琴铜剑楼藏书）亦将剖分为三。剖分后，恐必不能保。此必须设法罗致之者！祈尊处留意及之为荷！”可见他们的这种没有硝烟的战斗有多么紧张！解决适园藏书后，11月13日深夜，郑振铎以非常漂亮的彩印笺纸，用毛笔给徐森玉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长信，今存台北“国图”而从未披露过：

……芹货业已成交，款已付半数，此实二十年来一大事也……昨日傍晚，夕阳方沉，芹处送二朱红箱来。箱内物，皆瑰宝也。以黄校黄跋为最多。灯下披阅，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皆得其一二，便足自傲傲人者。今乃一旦毕集于斯，恣意检读，书运诚大佳也！然非先生之力不及此。敬当代今后百世之黄炎胄裔向先生致最恳挚之谢意也！检点、搬动，一手任之。若饮醇酒，陶然自醉。于时人声寂寂，家人皆倦眠。窗外月色至佳，莹晶一片，益增静谧之感。然同赏者何在乎？得意会心，相视而笑者复有何人乎？先生西行，斐云（按，指不久前曾来沪的北图赵万里）北去，孤独之叹，与日俱增，而此时尤甚！人皆知黄校黄跋之可贵，然知其可贵之处究竟何在者，有几人乎？曾约数公阅书，但均似不甚热心。深感败兴也……然书款殊为拮据，支付尤为麻烦。独力应付，挖肉补疮，先生当能想见其困难之情形也！呜呼！一书之获，岂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争得之者！愤懑之极，每思放手。然一念及先生“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言，则又勉强支持下去矣。且摩挲陈编，益念责任重大，则又不得不独肩其难也……先生处境清幽，猿鸟迎人，较之我辈困居红尘中，诚有仙凡之别矣。何时得至华岩洞中，倾吐积愆

乎？近似写《近百年来藏书聚散考》一文，印成，当飞函请教正也。琐琐，未尽所欲言之万一……

可知，郑振铎是把徐森玉视作抢救古籍最心心相印的知音。他受尽委屈，但只要一想到徐森玉说的极其朴实的“一切看在书之面上”一语，就又坚持了下去。他认为，今后百世之黄炎胄裔，应该向徐森玉致以最恳挚之谢意。同样，后人也应该向郑振铎致以最恳挚之谢意啊！

然而，只过了不到一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彻底沦陷，郑振铎等人的秘密收购工作被迫停止。从1940年春至此，他们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为国收书，“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未好的成绩！”（郑振铎《求书目录》）郑振铎当时做这件大事，连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严加保密。叶圣陶后来感动地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叶圣陶《西谛书话 序》）

12月17日那天，郑振铎在一位前辈那里商量了改名易姓等事，从此他离家秘密隐居在外，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而就在同一天，在重庆的徐森玉给蒋复璁写信说：

现平方全馆（按，指北平图书馆）业被伪组织接受，势将及沪存之书，欲避此难，惟有照西谛兄分藏办法，将此三百数十箱分移多处民房中密藏……弟拟变易姓名，穿过各沦陷区，秘赴沪一行，专办此事，延此将绝之慧命。年逾六十，崦嵫之岁月，已不足惜。韩冬郎诗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弟尝讽诵此句，深自引愧。设此役完成，则此疑亦决矣！

前面说过，徐森玉从民国初年始，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图也有不少书秘密运存在

上海。徐森玉为此忧心如焚，不怕牺牲，要求潜回上海去保护这些图书，充分表现了他的崇高爱国精神！

此时化名蛰居在上海的郑振铎十分想念徐森玉等人，他多次冒险化名给徐森玉、蒋复璁写信。今见1942年1月12日他化名“犀”致蒋复璁的隐语信：

此间八日后，秩序安宁如常……全家大小，均甚安吉，堪释远念。港地亲友，因消息隔绝，毫无音讯，最为挂念不安……积存各物，不知已否先期离港？便中尚恳示知一二为荷。弟在此，已失业家居，终日以写字读书为消遣，尚不甚苦闷。近拟笺注季沧苇及汪闼源二家藏书目录，亦消磨岁月之一法也。

这是郑振铎在日寇占领上海全市后写的第一封与重庆方面秘密联系的信。所说的“积存各物”，当然就是暗指运往香港的那批书。这封密信，今知是通过教育部某人转去的。我这次在台湾，看到当年教育部次长顾毓琇1月27日致蒋复璁信：“顷得某方带来一函，云系郑振铎兄手笔，特为转寄。”所说当即此信。26日，郑振铎又化名给蒋复璁寄隐语信：

前上一函，谅已收到。此间一切安宁，家中大小，自茝翁（按，暗指张元济，借藏书家张茝圃名而来）以下均极健吉，堪释远念。家中用度，因生活高涨，甚为浩大，但尚可勉强维持现状耳。现所念念不释者，惟港地亲友之情况耳。公是一家（按，“公是一家”暗指刘晦之的书，也泛指所有运港之善本书），是否平安无恙，尤为牵肠……一家离散至此，存亡莫卜，终夜彷徨，卧不安枕……致圣翁（按，指徐森玉）一函，乞代转致。

这是郑振铎在未得蒋、徐的回信时再次冒险密函联系。

令我欣喜的是，上述1月26日郑振铎托蒋复璁转致“圣翁”的那封隐语信，这次我在台

湾也看到了！信中说：

前上二函，已收到否？闻有东来意，殊为焦急。盖以关山修阻，又值严冬天气，高龄跋涉，殊不相宜也。此间亲友安吉如恒，尊寓大小，亦极为平安。敝处自茝翁以下亦均托庇健安，堪以告慰。守君一家（按，守君指北图负责人袁守和，这里指该馆存沪图书）亦尚好，惟以守不在家，妇孺辈未免乏人照料耳。闻北寓已由启君（按，指又名启明的周作人）代为料理，其长公子则已远行，情形亦尚好（按，暗指善本书已运美国）。先生与守为四十年老友（按，暗指徐森玉与北图有三十年深厚关系），自不免挂念，古道热肠，令人感泣！今世但有锦上添花，不闻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谊，守君家人闻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恳保重身体，勿急急来此为要！春暖不远，四五月间来，当不若冬日之风雪载途也。我近以读书写字为消遣之计，亦殊心安，乞释念。

原来，郑振铎在上海也听说了徐森玉想冒险来沪的打算，因而急忙去信劝阻。他对“圣翁”的关心和爱护，对“圣翁”爱国热肠的赞美，谁看了都会“五中感激”！

四、两位先贤应该载诸国乘以彰功绩

据我考知，徐森玉经人劝阻，后在1942年3月上旬赴上海。今见3月20日郑振铎化名“悌”致蒋复璁的隐语信中说：

家中大小，自翁以下，均安吉如常，堪以释念，一切自知保重。营业（按，指继续抢救图书）因资本无多，买卖又复清淡，已暂行停顿矣……店中资金，大部存港。港肆久无消息，近闻业已封闭（按，暗指存港之书已被日军掠占），数载心血，废于一旦，深夜彷徨，不能入寐。家运之蹇，一至于此，不禁愤懑难平！沪店存货，为我家长存之物，益不能不珍护之矣！圣

翁已平安抵达，晤谈至欢！……圣翁精神尚甚健，身体亦如常，现正奔走彼之店务，拟加清理（按，指查找北图存沪之书），然困难重重，存货又已被封存，前途亦不可乐观也。

这以后，直至1945年6月徐森玉从上海回到重庆，三年间他是不是一直住在上海，因为资料缺乏，老辈凋零，我尚未能确知。只是从郑振铎残存日记中知道，1943年4月，徐森玉曾经从沦陷区上海去过一次沦陷区北平（此行究竟有无公家的使命，也不得而知）。4月26日郑振铎日记载：“致一电与徐宅。知森已回，为之大慰，即匆匆通数语，约明晨相见。”翌日记：“十时许，访徐，谈北事甚久。闵尔昌语，尤可感动。”闵尔昌曾任袁世凯幕僚，是一个老派学者，撰有《碑传集补》等。他说了什么话，居然这样感动了郑振铎？郑振铎日记语焉不详，我本以为这个谜是永远解不开了；谁料后来我在郑振铎抗战胜利后写的《吴佩孚的生与死》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当时身陷敌占区北平的闵尔昌对徐森玉说：“但希望中国、美国的飞机能来才好！”徐说：“来炸了，不是你也危险么？”闵答：“这样的被炸死了，倒是甘心的！”4月28日，郑振铎日记又载：“十时许，至来薰阁，晤森。彼述一近事，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此一“近事”恐怕后人永远知道了，但我们可以知道，郑振铎和徐森玉当时都是以爱国气节相期许和互助互勉的！

今在台湾又看到7月18日郑振铎化名“犀”致蒋复璁的隐语信，提到“物价之高涨无止境”，“弟向不诉苦谈穷，然今春以后，却亦不能不叫苦矣。尚望吾兄处随时加以资助为感。现时积欠李平记已有数千之多，得此信时，请即付第一模范市场二十号中国农工银行齐云青君六千元。请其转入李平记帐内，以便还清旧欠”。据我判断，此信写于1943年。“李平记”，我认为当是郑振铎虚设的店铺名，为的是争取重庆方面对困居在沪的他和蒋复璁汇款资助，同时也

想继续为国家抢救一些珍本图书。8月7日他的又一封密函云：“前上一函，谅已达到。所请拨付农工银行齐云青君存入李平记帐内之六千元，恳请照付为感！”还提到：“如为了囤积计，则书籍殆为最冷落、最廉价之物……似应乘此时多收若干，盖人弃我取，实计之至上者。”暗示当时仍是购买古书的好时机。尤其是提到了著名的潘氏滂喜斋藏书：“对此‘滂喜’物，我辈应如何珍视之乎？！与圣翁商谈久之，束手无策，相对长叹。今日之大藏家，南瞿外，便应数到‘滂喜’、‘宝礼’二潘矣。‘滂喜’如散失，诚不可补救之一大劫也……我辈日夜思维，无计可施，不得不恳兄向紫阳、颍川二股东处极力设法，筹得此款，以便购入。”此处“紫阳”暗指朱家骅，从南宋朱熹别号紫阳而来；“颍川”为陈姓之郡望，此处暗指陈立夫。可知当时郑振铎、蒋复璁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仍然千方百计想为国家为民族保护文化遗产！信中还说他已先向开明书店借款垫付，如果重庆的钱不寄来，他就只能自己白白浪费一笔可观的押金。同时，徐森玉也给重庆写了信。

重庆蒋复璁给郑振铎也回了密函，今我在台湾看到底稿。8月31日，蒋复璁化名“唐玉”（“唐”从蒋复璁号“慰堂”来，“玉”从“璁”字来）致郭鸣钟（“郭”从郑振铎笔名“郭源新”来，“鸣钟”从“振铎”来）信：

七月十八日手示奉悉，李平记已由此间齐君来函索款五千元，已照付。日内拟托张君划款五百元，乞兄向兴业揆翁取。以弟亦在窘乡，然总尽力设法。圣姑（按，暗指徐森玉）前函武兄（按，指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索家用款，当由武兄向颍川取到一千元汇去。近子才（按，暗指袁守和，从清人袁枚字“子才”而来）又向颍川取到八千元寄与平店……

今又见9月28日蒋复璁化名“卫汤甫”（从蒋复璁号“慰堂”来）致瞿慎余（徐森玉之谐音）密信：“接八月六日手书，敬悉种切，已将尊意

及犀兄函转达……货（按 暗指珍本古籍）固好，但今非昔比，筹集股款甚为困难……”又见蒋复璁致朱家骅信云：顷得郑振铎、徐森玉来信谓苏州潘氏书出售，书价很高，请朱家骅定夺，并转上郑、徐来信。这次抢救滂喜斋、宝礼堂“二潘”藏书之事，因为局势实在危急，政府实在困难，最后没有成功。那么，郑振铎也就白白损失了一大笔押金。但据我所知，“二潘”藏书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国家所有。特别是宝礼堂藏书，还是藏家捐献，郑振铎亲自经手的；滂喜斋藏书，大概是徐森玉经手的。此中另有动人故事。

还想一提的是，抗战胜利以后，郑、徐二先生还为一部绝对了不起的稀世珍宝、孤本巨著入藏国库而作的贡献。此书现也珍藏在台湾“国图”，此事则从未为人所道。

那是地地道道的宋著宋编、宋槧宋印，巨达九十五卷，多至六十册的《南宋群贤小集》。宋陈起编，宋嘉定至景定间临安府陈解元宅书籍铺递刊本。有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手书题记，鉴定为“外间俱从此本传写者，为全书，刻手精好，古香袭人，是书棚本之佳者，绛云（按，钱谦益）晚年悬价求之不得”者。汲古阁仅影写其中一册，明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之子毛扆即自为跋语，“珍为压库之书，六七百年失传之秘册”。因此，朱氏惊叹曰：“洵知宋刻本之佳也，使毛氏父子见之，能不下拜！宋南渡后，山林湮没之士赖此得传，非书林射利之书可比！”

此书原为来青阁旧书店老板杨寿祺所藏，秘不示人。最后为了让归国家，他认真真地写了一篇长跋，今藏台湾。跋文末云：

……全书印工均甚精良者，是盖当时宋人集腋而成，非一时一地之所有也。七百余年来转移隐见者，惟此一书耳！邓君（按，邓邦述，著名藏书家）在清季购得清初钞本，即已诧为奇书；袁氏（按，袁克文，著名藏书家）仅藏《友林乙稿》一册（按，甲


稿已久佚）亦已视若拱璧，引《百宋一廛赋》“跻友林之逸品，俪声价于吉光”二语以自珍异。此则在钱氏（按，钱景开，清初著名古籍鉴定家）经眼之时，早已沧桑三易，今更二经浩劫矣！当其未发见时，决无人尚信世间有此奇书者，乃竟巍然独存于天壤之间，较之二君所藏，莫可比拟矣！

今者因张先生溥泉、蒋先生慰堂、徐先生森玉、郑先生西谛之力，将由中央图书馆购而藏之，南渡以后群贤遗著得以登于金匱石室，蔚然巨帙永为国宝，诚盛事也！寿祺自先大父云溪公以来，世业旧书，性质疏散，不识书画碑帖，更不能诗，不足以比钱氏，所见宋元善本甚多，亦无记载可考，惟是志行纯洁，八年之内，始终确认国家之永在，蛰居沪市，虽乡土吴门瞬息可达，当珍物委遗之际，倍蓰之利俯拾即是，立定脚跟，未尝折腰一往，今跋此书，可无愧怍矣！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吴县杨彭龄寿祺精选明纸，以五日之力，谨书此自制跋语于上海之来青阁。

张继是“党国元老”，蒋复璁是收购方负责人，因此，殷切鼓励、中间联系杨寿祺让书的，肯定就是徐、郑二先生。杨氏自豪地说，抗战“八年之内，始终确认国家之永在”，“立定脚跟，未尝折腰”。他能做这样一个爱国书商，当然也与长期受郑、徐二先生言教身传。潜移默化有关。

1970年，台湾牟润孙撰《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其中提到徐森玉：“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世有良史，将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也必矣。”说得真好！我们今天的文史工作者，真是应该将郑振铎、徐森玉这样的先辈“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

他们是真正的读书人！真正的大学者！真正的无名英雄啊！

叶景葵与徐森玉的友谊与交往

Ye Jingkui's friendship and associations with Xu Senyu

撰文 / 柳和城

叶景葵（1874-1949），浙江杭州人，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著名银行家。他于“孤岛”时期捐赠自己全部藏书，发起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与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1881-1971），浙江湖州人，著名文物研究专家。两人年龄相距仅8岁，仍可算同代，又都是浙江大同乡，可谓一见如故。共同的志向与爱好，把他俩连接在一起，虽则分时多于聚时，他们的交往与友谊却长达40余年之久，并多次合作，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叶与徐的友谊可追溯至1902年。那年叶景葵29岁，徐森玉21岁，两人均英姿勃发，年轻有为。叶应山西巡抚赵尔巽之邀请来到太原，任巡抚衙门文案，“以代草《条陈十策》有声于时”。其间，由陈莱青兄弟关系，结识时在太原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就学的徐森玉，“纵论时务，甚相得也”。（徐森玉《卷 贻稿序》）徐1900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在校期间，即著有《无机化学》和《定性分析》，校中称为“奇才”。叶景葵自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有感于国家贫弱，忧心如焚，从而热衷新学，读了大量中外报刊书籍，1901年至1903年期间，他辑录成《矿学杂钞》与《卷 政典类钞》两部笔记。其内容包括中外政治、世界经济、外国语言文字、国内实业、屯田垦牧、进出口贸易、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农业种植、理化常识等多方面知识。作这些笔记之

时，叶正与徐森玉交往中，不可能不受到这位大学堂高材生的影响。

据说，当时任山西大学堂监督（校长）的宝熙，十分赏识徐森玉，常邀他鉴赏古物，共同探讨、考证、鉴定，这段经历奠定了徐森玉后来成为文物鉴定家的基础。叶景葵受家庭影响，早就有志藏书，文物书画鉴赏也非外行，他俩必有共同语言，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史料。

1905年夏，叶景葵跟随赵尔巽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即招徐森玉来东北创办奉天测量学堂。徐森玉回忆云：“旋尔巽为盛京将军，大事兴革，先生实主其事。东省百废待举，而兴建造作，测绘为其始基，因必培养测绘人才。时余方毕业专斋，乃承相招，以创办测量学堂见属，磋商规划，有针芥之投……”（《卷 贻稿序》）徐后顺理成章担任奉天测图局局长，不能不说与叶的大力推荐有关。徐森玉对这一场经历，始终记忆犹新，对叶抱有知遇之情。

民国以后，徐森玉先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并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叶景葵则在沪主持浙江兴业银行，卓有建树，业余时间收集古籍文献，以清儒稿、钞、校本著称于世。两人在上海、北平见面机会不少。叶对自己收藏从不秘惜，并尽力刊布流传。有一部清代音韵学家张惠言、张成孙父子所撰稿本《谐

声谱》，向未刊布，1933年初，叶景葵委托在北平的老友章钰（式之）组织校录并影印出版。1934年夏成书，期间徐森玉出过大力。那时徐主持北平文化协会工作，章钰多次向他商借文化协会藏书中有音韵文字的书籍，用作校勘，徐则有求必应，还参与印行的联络等事。今日上海图书馆藏有多通章钰与叶景葵通信，数次提及与徐森玉商量的情况。徐森玉对此事也有记述。他在《卷 贻稿序》中说：叶先生“尝得张惠言、成孙父子所撰《谐声谱》稿本，为研究文字音韵要著，亟谋刊传，倩人校录。余亦为之 借传抄之本，以供参考。”这部书印出后在学界反响很大，许多著名学者发表评论，予以高度评价。这段书林美谈，近代古籍出版史上应该留下浓重一笔。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徐森玉参加主持故宫文物南迁，工作十分繁重，也相当危险。叶景葵在沪非常关注老朋友的安危，不时通过徐森玉之弟徐鸿宾（鹿君）打听其兄行踪。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失去联系。原来徐森玉冒险潜回北平，策划将尚陷于北大研究所的2万余枚居延汉简秘密运出北平，寄存香港大学图书馆。1938年春，他又不辞艰险，押运故宫文物转移至西南后方安全地带。途经贵州安顺，由于车祸，腿部受伤致残。当时上海“孤岛”与大后方消息隔绝，叶景葵只能通过徐氏家属了解徐森玉近况。当徐在安顺知道老友关注自己，1939年7月26日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回答老友的关切。信云：

揆初先生赐鉴：丧乱以来，转徙靡定，每瞻雅范，徒廛思存。昨得舍弟书，言晤先生时屡以下走踪迹见询。自顾庸虚，犹蒙注念，循环私臆，且感且惭。东西凉燠异致，敬维冲襟怡适，睿识澈明，为祝无量。宝前岁七月，自旧京南下，溯江而上，僦居长沙四越月。得青岛友人电，居延汉简尚陷在北大研究所中。遂遵海潜回北平，设法将简二万余运出，送存香港（现在港

影印，年底可竣）。去岁春，为鸠集故宫移出品物入蜀，夏入陕，秋入黔，冬入滇。行车不慎，竟至折股，在昆明医院疗治五越月，始能蹒跚拄杖而行。今岁季春来黔西安顺读书山小住（洪北江榜书匾额尚存）。苗寨獠川，环拱左右，芦笙铜鼓，淆集听闻。山鸟如啼，野花似血，揽兹风物，频动索离之感矣。宝前在西南各地奔走，均为仅存之文物谋置善地。交通阻滞，盗匪出没无常，将来为罪为功，不能自卜。惟北平图书馆存沪最精之本，芦沟变前悉数寄归平馆。内阁大库旧藏，明末清初地图，全部陷在南京！此则令人最痛心者也。先生淹贯群书，虑周藻密，保存前人著述，更不遗余力，素所钦服，因述鄙况，谨将与宝有关文物消息牵连及之，想亦先生所乐闻也。专此。敬请道安。

徐鸿宝拜启。七月廿六日。

原信未署年份，据“前岁七月”一句，考定系作于1939年。信里徐森玉对安顺地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描绘，令人神往，行文如同优美散文作品，反映出作者的豁达与事业心。

1940年初夏，徐森玉为居延汉简在港影印事赴港联络，当时也很秘密，知道者不多。徐在香港得兄弟来信，知道叶景葵又十分关注自己，即致函叶，告以在港处置居延汉简等事。原函未署年份，因提及“前数日晤张菊翁”。考张元济1940年5月18日赴香港，6月1日启程返沪。故考定为1940年无误。信云：

揆初先生赐鉴：去冬奉手教，当裁末牋，略达鄙忱。昨舍弟来函云，尊处迄未收到，想付沉浮，愈增驰仰。迩维起居多祜为祝。宝因居延木简在港影印，倏逾两载，结束无期，不得已来此催促。兼旬策励，已全部照竣，校改排比，十月间可印成。现香港已非安全之地，拟将原简移至昆明，与中央研究院殷墟遗物同置一处。惟滇越路甚不易通行耳。前数日晤张菊

翁，谈及先生藏书设馆度藏，公之于世，嘉惠之麻将与名山比峻，较之赠与学校或图书馆者，尤为妥慎，钦佩无似！小儿稚鲁不足任使，乃蒙破格录用，似叨非分。犹忆卅五年前，宝在晋校毕业，承招致赴辽，令试办学堂。今小儿复荷裁成，两世因缘，决非偶然。袭恩怀德，永热瓣香矣。专肃。敬请崇安。

徐鸿宝谨上。六月十四日。



青年徐森玉



中年徐森玉

此信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居延

汉简在港影印颇有曲折，徐森玉二次赴港催促，最后才告完成；二、张元济在港时与徐有晤面；三、“小儿稚鲁”由叶景葵推荐进浙江兴业银行，一定程度上解决徐森玉的后顾之忧；四、叶景葵在沪创办合众图书馆事，消息已传至香港。叶、徐二位虽身隔千里，但心是紧紧相连的。


徐森玉抗战时期保护古物贡献巨大，永垂史册。可大都出于他人记载，本人处世向来低调，很少有文字留下。上述两信，恰恰生动地保存了他自己的叙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原件均藏上海图书馆，值得介绍。

1940年12月，徐森玉秘密回到上海。12月18日，顾廷龙向叶景葵送书，就从叶那里“闻徐森玉来沪”。显然，此前叶与徐已经会过面。此后，徐森玉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合众图书馆筹备处，或者郑振铎、刘承幹等人的宴请聚会上，叶景葵常常都在座。徐森玉在沪与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等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多方寻访、购置散落于沦陷区濒于危境的珍籍善本，予以妥善保护。这一切活动，对叶景葵与他筹建中的合众毫无保留，而且亲密合作，相互协商，徐从不把叶当外人。有时

书籍借价也请叶景葵参加。叶一次从文献保存同志会刚收得的书中，借来《说文理董》一书，进行校勘研究，同志会收得部分书籍也寄存于合众。此后，徐森玉奔走于港、渝、沪之间，为保护古文物历尽艰险。凡回上海，无不来合众，有时还陪友人来参观。1942年3月27日，他与郑振铎来合众，“因闻有日本人来馆，探究究竟。”《顾廷龙日记》里与徐交往的记载很多。1943年8月，叶景葵70岁生日前，徐森玉赠与内阁大库宋元本散叶作为寿礼。叶即郑重装帧成《内阁大库宋元本集锦》一册，捐赠予合众。今日我们能在《杭州叶氏卷 藏书目录》中一睹其内容，原书今存上图。

1946年9月，合众图书馆董事会增聘徐森玉为董事，他与叶景葵的交往更多更密了。两位学人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值得我们后辈欣羨不已！

今年是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回顾这位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的杰出贡献的同时，梳理他同时代友朋间的友谊与交往，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2011年10月于上海⁽¹⁾ 

(1) 笔者从事文史研究与写作已有多，认识多位老一代著名文化人的后人，得益匪浅。近又结识徐森玉先生的儿孙辈。然而叶景葵先生后人迄今未曾找到。盼望知情者告知，以便进一步采访与请益。

纪念徐森玉先生

Mr. Xu in my eyes

撰文 / 陈先行

在徐森老诞辰 130 周年之际，上海博物馆举行这样一个规模虽小但不失隆重的纪念会，很有意义。而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领导没有出席，颇觉遗憾。虽然上图领导委我作代表，实际上我是代表不了的。套句老话，即余生也晚，不获承颜接辞，聆听森老教诲。因此，于在座的长者面前，原本是没资格发言的。不过我真有几句心里话想说。

人们尊崇森老，誉其为了不起的文物鉴定家、版本学家，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这还不足以全面认识与评价森老。我认为，森老首先是一位文博事业家，他为我国文博事

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如果硬要以 1949 年作为时代划分，那么他应当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山祖或者说是奠基人之一。由于他任职地方，所以他在大陆的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与他实际所作的贡献不甚相符。谈到文博事业，人们似乎对中央高层官场人士如郑振铎先生等更为关注，这也可从前几年国图与有关方面对召开郑振铎先生诞辰 120 周年纪念会的重视得到证明。这是我们的国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而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位前辈是无高下之分的。人们每津津乐道当年郑振铎先生在国家文物局给徐森老留着文博处长的位置，长期虚位以待。在我看来，以森老的学识与贡献，及其在海内外的影响与人格魅力，即便当文物局长也是绰绰有余，不足为奇的。对他而言，当不当处长又如何呢？此时我想到了对图书事业贡献卓著的潘景郑先生，他虽然比森老晚一辈，但当年同样以其学问超然而被郑振铎先生召为国家文物局的图书处长，但与徐森老一样，潘景老也没去，我想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所以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要因官位高低而有偏颇，尤其像森老这样的知识分子，即便一时得不到公正客观的评价，其实亦无损其名垂青史之地位。

有人对森老著述无多不太理解，这又使我想起顾廷龙先生。我在顾老身边工作了 25 年，几乎没有看到他著书立说，偶尔他对我说写了一篇长文，我一看才 4000 字，但心中却油然而生敬意。为什么？顾老在青年时代



陈先行在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

潜心研究文字学、近代史,《古匋文彙录》、《吴憲斋先生年谱》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而版本目录学更是业界公认的权威。但自从1939年,当东南文献大量流失之际,他应叶景葵、张元济之召,南下协助创办合众图书馆之后,便将全部身心包括其学识付诸图书馆事业与为读者服务之中,再也不留给个人撰著的时间与机会。他曾淡然说到,“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谓不负其平生”。这是何等高尚的境界。也因为有这样的馆长,上图的藏书建设与事业发展才会如此有特色有成就。了解到这些,那么对森老未能勤于著述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是相象的,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亦是一样的。但换个角度讲,如果他们没有精深的学问与卓而不群的识见,即便欲为文博事业、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也未必会有这么大的成就,这又是不可否认的。可惜的是,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而以往对他们的认识又失之狭隘,他们的崇高精神远未得到发扬。

作为想为图书文博事业做点事情的后学,吾辈十分敬重森老。去年承上博陶喻之君见告,有四卷流失海外的宋拓本《凤墅帖》有重回大陆的可能,闻之兴奋不已。《凤墅帖》乃南宋曾宏父所刻著名丛帖,凡前帖二十卷、续帖二十卷、画帖二卷、题咏二卷,所收宋代、尤其是南渡前后名人之信札、诗翰及草议外制底稿等,多不见载籍,史料价值很高。就书法而言,因其以当代人之真迹模勒上版,无《淳化阁帖》所收古迹或有疑似之虞;而宋代如

朱熹、辛弃疾、岳飞等名人墨迹大多亡佚,端赖此帖绵延一线之传,其珍贵盖可知矣。惜此丛帖久散,完者无闻,即便清代如何焯、钱大昕等大家,也仅经眼或度藏若干残卷而已。上世纪50年代末,在徐森老等寻访之下,幸运收得十二卷残本,后转归上海图书馆,海内外无不视为人间无二之至宝。时森老专门撰文介绍,并考订称“在这十二卷中,前帖第十五、十八卷及续帖第十、十一四卷,和现已散失的前帖第三、五、十六、十七四卷,在清代为梁蕉林所藏,后为叶志诜所得,又归归安姚氏,最后曾为端方所藏”,但已无可踪迹。而今这散失的四卷在徐森老诞辰130周年之际梦幻般地出现,如能入藏上图,不啻珠还合浦、剑合延津,且对森老也是最有意义的纪念。无奈喻之君与我人微言轻,虽百般努力,迄今未有结果。不禁相与感叹,若森老在,那该多好!记得数年前,国家图书馆欲得流散在美国的陈清华旧藏善本而乏财力,国家文物局毅然出手相助,产权归文物局,交由国图保管使用,终使这批宝物回归中土。故在此斗胆建议新近成立的上海文物局,能否仿而效之,以玉成此事,不仅功德无量,也是发扬森老精神的最好实践。■



1952年,徐森玉与潘达于等文物捐赠人合影

学者徐森玉古籍整理事略

Some recollections of Mr. Xu Senyu's sorting ancient books

撰文 / 王茜



王茜在纪念徐森玉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

徐鸿宝(1881-1971),字森玉,后以字行。他是图书馆、博物馆界前辈贤达,曾经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¹⁾,森老于1922年2月-1922年7月,1924年1月-1925年10月,1926年10月-1937

年,以教育部佥事兼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善本部、金石部主任。其间多次参与大型古籍整理,至今,国家图书馆尚存其手勘古籍。以下略举数例。

一、大型古籍整理

1. 明正统《道藏》重印。首倡此议者为著名学者傅增湘,1920年前后(庚申)时方创议重刻正统《道藏》,时时诣长春故宫,访观主陈毓坤,筹商调取藏经,分期影出之策”。该书历波折,数年寒暑,终

于1926年告成⁽²⁾,其中森老尤为辛劳,傅增湘曾感慨说:“其后宗人治芑继掌邦教,东海老人慨斥巨赀,森玉更为奔驰南北,群策群力,奋厉辛勤,迄于丙寅,而全藏经典告成,凡印行一百五十部,流布于四方,传播及于海外诸国,千秋之盛业,竟假余手而成⁽³⁾,似长春之灵,默启余衷,俾得效其微长,以附名于不朽,宁非幸哉?”

2. 调查《赵城金藏》。1930年,在西安发现极为罕见的宋元板《碛砂藏》,遂开始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筹款影印这部大藏经。由于这部《碛砂藏》是残本,需要采用其它行款相同的大藏配补。在调查各地尚存古本藏经残卷过程中,“影印宋版藏经会”偶然得知山西赵城广胜寺保存一部古本藏经。1933年春,范成法师曾去广胜寺观览这部古本藏经,“见藏经内多遗佚之著,为《碛砂藏》所未收者,函告徐森玉鸿宝。森玉研相宗极勤劬,于版本之学,尤所精究。不惮炎暑,千里再赴,穷一日之力,将古本遗佚者,选出一百余种,相约借印,……⁽⁴⁾此次调查结果,“承徐森玉居士续往检校,得五千四百余卷。惟依原编千文核之,应有七千卷之富。嗣求之近寺民家,有用以糊壁、夹针笥者,

(1)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2) 徐世昌支持张元济、梁启超、傅增湘等人重印正统《道藏》倡议,傅先生总其事,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可以参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牋》(商务印书馆,1983)1923-1926年往来书札。

(3) 引自《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金刊溪集跋文》。傅岳(1878-1951),字治芑,湖北武昌人。清末举人。曾任山西大学堂教务长,北平图书馆馆长,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东海老人,即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东海、斋,天津人。光绪十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年间曾任大总统。晚年主持编辑《晚晴诗汇》。家富藏书。笃信道教。

(4) 无畏居士《广胜寺发现北宋藏经卷纪略》,《艺林月刊》第四十七期,1933年。

出赏收赎,又得三百卷附入,久嗟散失,终难完整。”⁽⁵⁾不仅以选出者辑印为《宋藏遗珍》,且从此使广胜寺藏经成为关注重点。⁽⁶⁾

3. 影印《宋会要辑稿》。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自嘉业堂购得徐松辑《宋会要》原稿,1933年初延请陈垣、傅增湘、章钰、余嘉锡、徐鸿宝、赵万里、叶渭清等七人组成编印委员会,推定陈垣先生为委员长。至1935年,各门类条缕分析,大略完备,又得哈佛燕京社资助,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所影印,1936年秋始得成书。⁽⁷⁾

此外,森老还参与过《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等书编辑工作,详请参郑重《徐森玉》和上海博物馆《徐森玉文集》二书⁽⁸⁾。

二、国家图书馆存森老校勘之书

至今,国家图书馆尚存数部森老校勘之书,笔者寓目六部,罗列如下:

1.《晋书》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龄撰。元刊明正德十年司礼监、嘉靖、万历南京国子监递修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徐森玉校。钤“贞”、“元”、“仲雅”、“汉晋斋印”、“商丘宋荦所藏善本”、“臣筠”、“三晋提刑”、“八千卷楼所藏”、“善本书室”等印章。参见《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全书正文之末叶有徐森玉过录毛晋题识。(索书号30)

2.《群经音辨》七卷。宋贾昌朝撰。清康熙五十三年泽存堂本。钤“士礼居”、“黄印丕烈”、“莒圃”、“宋本”、“平江黄氏图书”、“叶树廉印”、“石君”印。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该书有傅增湘跋,然未见傅跋。徐森玉校并录陆貽典题识。

书中有校语曰宋本如何,当是毛扆据宋本校过之记,然书中并无跋识。⁽⁹⁾(索书号23)

3.《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内制集》十卷,《乐语》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年谱》一卷,《校记》二卷。清光绪三十四年端方宝华刊本。卷十五末附纸傅增湘跋曰:“宋刻本《东坡奏议》十五卷,书友送来阅,因与森玉、渭清三人竭日夜之力⁽¹⁰⁾,校于新刻本,改正极多,与他宋本合。惜第一册失校,他日有缘,当再补之也。前后用朱笔蓝笔不一,然题上皆加蓝色圈以别之。”(索书号348)

4.《负暄野录》二卷。宋陈槱撰。清乾隆嘉庆年间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卷末徐鸿宝过录明隆庆元年叶恭焕钞本中沈辨之、叶恭焕题识⁽¹¹⁾。钤“沅叔手校”、“沅叔手校”印。傅增湘辛巳年(1941)据汲古阁藏精写本校并跋。《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二写本,《题记》中亦有此书跋文。藏园先生过录写本上佚名者跋语,并识曰:“辛巳冬,偶见汲古精写本,对校一过殊少异字,惟卷末跋语不著何人,以刻本所无,故录附于后。藏园老人记。”(索书号210)

5.《墨子》六卷。明万历九年书林童思泉涵春楼刊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见《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曾经徐鸿宝校,卷首有过录重刻墨子序。(书号146)

6.《攻媿集》一百十二卷。宋楼钥撰。四部丛刊影印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徐鸿宝等据宋刊本校勘。钤“藏园”、“双鉴楼”、“书潜”、“沅叔”、“傅增湘”印。《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曰:

(5)《发行宋藏遗珍缘起》,《影印宋藏遗珍预约样本》,1935年。

(6)参见李际宁《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藏书家》第十五辑,齐鲁书社2009年。

(7)参阅国立北平图书馆《宋会要辑稿》首篇《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一文,1936年。

(8)郑重《徐森玉》,文物出版社2007年。上海博物馆《徐森玉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9)据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国子监刊本《宋书》(书号31)中夹藏园手书浮签曰:“《群经音辨》七卷,徐君森玉代校陆敕先临毛斧季宋本校,又借斧季钞本用笔记。”应该就是此书。

(10)凌念京,字渭清。傅增湘夫人之兄弟。

(11)沈与文,字辨之,自号姑余山人,吴县人。明嘉靖年间人,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叶恭焕,明代藏书家叶盛玄孙,继承菴竹堂藏书。

“(玫瑰先生文集，宋刊本)临清徐坊遗书，出以求售，值昂无力举之，借得后，约友人徐鸿宝、熊译垣、邓守遐同校后还之⁽¹²⁾。旋为燕京大学收去。”森老识语不多，补录佚文脱句甚多。由《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推测，校勘大约在丙寅(1926)年。(书号1995)

三、与学者交往

抗日战争之前，徐森老与鲁迅、傅增湘、周肇祥等学者有密切往来，与鲁迅之友谊，已有专文。⁽¹³⁾周肇祥先生(1880-1945)，字嵩灵，号养庵，又号无畏，浙江绍兴人。近代书画家，曾任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多次与傅增湘出游。又与徐森老同有访古雅兴，其《琉璃厂杂记》记载较详。⁽¹⁴⁾森老又是傅增湘“藏园三友”之一，⁽¹⁵⁾多次参加藏园祭书之典，根据国家图书馆藏书题跋，至少有如下几次：

1. 戊午(1918)祭书之典记载在明万历三十七年洗墨池刊本《薛涛诗》上。樊增祥题识并填词⁽¹⁶⁾，又有沈兆奎题跋，夏孙桐填词、萧方骥题诗。钤“顾曾寿”、“彦冲”、“袁又恺藏书”、“袁廷寿读过”、“芥青”、“拳石山房”、“纸西竹屋”、“泊然静如”、“巽斋所藏”、“海日楼”、“傅增湘”、“双鉴楼”、“双鉴楼藏书记”、“藏园”、“抱蜀庐”、“增湘”、“双鉴楼藏书印”、“双鉴楼珍藏印”、“江安傅氏藏园鉴定书籍之记”、“江安傅忠谟晋生珍藏”、“晋生心赏”印。卷首为樊增祥应沈曾植之请题识并诗，该诗见诸《藏园群书题记》跋文之末。

卷末，沈兆奎题跋曰：夙孙、书衡、授经、伯宛、孝先、闾声、森玉、庾楼诸君集沅叔先生斋，为戊午除夕祭书之会，徧观善本。书此以志。吴江沈兆奎。

夏孙桐填词一首，曰：春滢锦江，想云研断笺，诗幅对节府。香莲名侣，唱酬倦续桀铅，送老翠袖冷，终虚金屋。比断肠集剩，细与然脂编余。洗墨池荒，精刊传秘，古蠹犹馥，便增色琅环。绛锦艳题旧目，蛾眉遭际，到今感触看等闲，红粉告身身盈握。

沅叔先生以明刊《薛涛诗》属题，念其埽眉才调，慙于一命，可谓生不逢时，率倚蕙兰芳引，用博一笑。庚午冬至，江阴夏孙桐，年七十有四。钤“悔生”印。

萧方骥题诗曰：箏琶响细亦唐音，落叶衰蝉怨慕深。二十诗人十一镇，唱酬谁识女郎心。茗花笺千载香，道州联语自堂堂。(薛涛井在成都江楼下，何道州题联云：花笺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颇为人所称诵。)卅年故国寻春梦，回尽江头九曲肠。钱塘苏小是乡亲(用随园话)，难怪藏园鉴别真。舐沫一编三叹服，世间那有浪传人。

藏园年丈以明刊《薛涛诗》命题，排在樊、夏之后，真难属词也。乙亥东坡生日，萧方骥紫超呵冻。(书号11378)

此次聚会在另一部书上也留下鸿爪，国家图书馆藏宋乾道元年永州零陵郡庠刊本《唐柳先生外集》，卷末张允亮题款曰：“胶州柯劭忞、汾阳王式通、武进董康、仁和邓邦述、海宁张宗祥、归安徐鸿宝、吴江沈兆奎、丰润张允亮，戊午除夕同集沅叔先生太平湖寓斋，祭书获观并记。允亮书。”该书曾为莫友芝旧藏，钤“棟亭曹氏藏书”、“影山草堂”、“莫氏秘籍之印”、“莫绳孙字仲武号省教”、“莫经农字筱农”、“莫俊农字德保”、“藏园秘籍孤本”、“沅叔审定”、“忠谟继鉴”印。《藏园群书题记》有长跋，并遂录莫氏跋。(索书号5238)

二跋记同一聚会。

(12) 徐坊旧藏之宋刊本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熊罗宿，字浩基，号译元，皮锡瑞入室弟子，潜心于目录版本学研究，藏书甚富。邓 (1872-1934)，字守瑕，一字寿瑕，又作守遐，号忍堪，又号拙园，成都人。曾经日本留学。有《荃余斋诗存》传世，其中数诗记述与藏园先生交往。

(13) 邓啸林《鲁迅与徐森玉》，《图书馆杂志》1985年第4期。

(14) 周肇祥著，赵珩、海波点校《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

(15) 另二位是张允亮、沈兆奎，参见《藏园群书题记》中《方百川先生经义跋》一文。张允亮曾任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森老转徙西南，张允亮接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和中文编目部主任，笔者撰小文《藏书家张允亮学术生涯述略》(《文献》2011年第4期)，可参阅。

(16) 樊增祥题款及填词见诸《藏园群书题记》该书跋文。

2. 壬戌(1922)年祭书之典,藏园出示宋刊《五代史记》,《藏园群书题记》该书之跋记载其聚会,徐鸿宝亦与其中。详参该跋。

3. 丁卯(1928)年腊月祭书记载于明正德十三年陈纲刻本《许白云先生文集》上,⁽¹⁷⁾全书未有邓邦述、许宝衡跋文,许跋关乎藏园,移录于此,文曰:

“藏园祭书十稔未间。主人自谓今岁所得仅十余种,逊于往年,然如宋本左氏《百川学海》、司空表圣《一鸣集》、元本《华严经》、明成化本《许白云集》、正德本刘秉忠《藏春集》、日本活字本《史记》,并属稀见,而左氏丛书,诸家藏目止见残本,兹之刵获,足对多许。主人偶缘道阻,遂辍南游,精力所专,校讎益富,都其卷帙,六百有奇。以宋本校者,则《通典》、《论语笔解》、《秦淮海集》、《张南轩集》,金本则《磻溪集》,元本则《佩韦斋集》、《杨仲弘集》,余书见于自记,不复遍举。与会者:汾阳王志璠、仁和许夬庠、长白彦明允、萧山朱翼厂、吴兴徐森玉、吴江沈无梦、丰润张庾楼、通州张仲郊。期而不至者:柯蓼园、宝沈龢、杨只庵也。丁卯除夕前一日,许宝衡记。”⁽¹⁸⁾

研究者对藏园校书,一般引用余嘉锡先生“凡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槧”,或傅熹年先生“经过用善本手自校勘的约一万六千卷”为说,然其中逐年进程并不了然,此跋语“精力所专,校讎益富,都其卷帙,六百有奇”,提供至1928年初傅增湘校勘规模参考信息。

傅增湘曾经如此形容“藏园三友”,曰:“是三君者,识力精能,见闻广博,频年搜讨,贻我实多。或偶逢罕秘,为目所未经,或创获珍奇,而力不克举,相与流传钞白,校定丹黄,时补佚文,共商旧学。缘斯密契,遂订久要,风谊相期,载历年祀。”抗日战争烽火一起,友朋竟然因时局天各

一方,“何意棋枰忽改,踪迹遂睽,森玉以护持古物,转徙滇黔,无梦以出谋稻粱,栖迟海峤,惟余与庾楼留滞旧京,以金马之陆沉,作穷鱼之煦沫。祇自闭门而却扫,未尝阅肆以探寻。承惠兹编,触余旧绪。”⁽¹⁹⁾一起访古鉴珍,品评学问,志同道合,成为友谊基础。


傅增湘雅嗜山水,四十年间足迹遍及五岳及东南、华北、内蒙、西北各地名山胜地,仅雁荡山就攀登三次。其游记如《南岳游记》、《塞上行程录》、《北岳游记》、《登岱岳记》等等,曾经单行出版,其游记不仅描述风光,抒发情怀,且多有考述古迹,记录废毁始末,史料意义重大,字里行间,不时可见徐森老身影。这些游记单行本现在结集为《藏园游记》⁽²⁰⁾,粗略检阅,可见到森老有四次偕藏园先生出游。

1925年秋,游京郊百花山。同行者:傅沅叔、徐森玉、周养庵、吴静安。共游七日。

1934年初夏,游南岳衡山。同行者:傅沅叔、徐森玉、邢冕之⁽²¹⁾。自衡山返回长沙,至苏家巷访叶定侯,观叶德辉藏书。

1935年秋,游京郊昌平居庸关。同行者:傅沅叔、徐森玉、周养庵、江翼云、潘禹言、傅定谟、傅通谟。

1937年初夏,游中岳嵩山。同行者:傅沅叔、徐森玉、邢冕之、傅通谟。游记之末录金元石刻十余种。

由于袁同礼、徐森玉等著名学者在北平图书馆多方努力,奠定了该馆业务基础,积累丰富馆藏资源,也由于他们深厚学养,逐渐扩大图书馆在学术界之影响。今天,我们作为国家图书馆后学,得以利用馆藏文献进行学习、研究,继承前辈贤达学术传统,不禁时时感怀他们,向往其人品、风范、学问。

(17) 此书见诸《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

(18) 据上海博物馆《徐森玉文集》中《吴兴徐森玉先生年表》还记载1930年和1931年赴藏园参加祭书聚会事,可参。

(19) 引自《藏园群书题记》中《方百川先生经义跋》一文。

(20) 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

(21) 邢端(1883-1959),字冕之,别号蛰人,贵阳人,清代末科(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著名书法家,与藏园往来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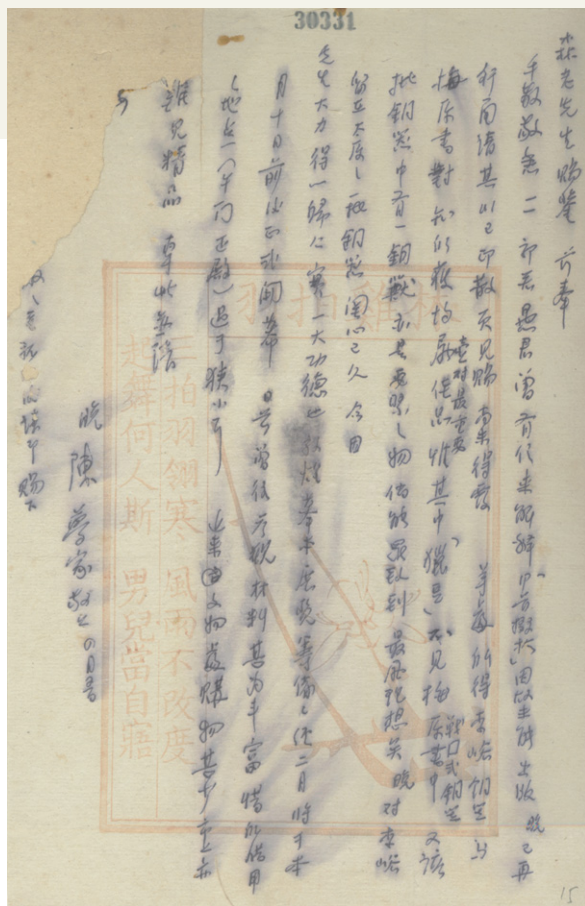
陈梦家先生 致徐森玉先生函一通简释

A letter from Mr. Chen Mengjia to Mr. Xu Senyu

撰文 / 柳向春

今年适逢上海博物馆老馆长徐森玉先生诞辰 130 周年，辞世 40 周年，谨选所见上虞陈梦家先生致先生手札一通整理发表，并以所闻所见，略事解说，权以为追念。

徐森玉 (1881—1971)，原名盅，更名鸿宝，初字寂之，后字森玉，以字行，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尝问学于白鹿洞书院，后转入山西大学堂，攻化学，成绩斐然，尝偕学友同编《无机化学》、《定性分析》，有“奇才”之目。为山西学政长白宝熙所赏，多加眷顾，后之谙习文献、精研古物，即自是始。历任奉天测绘学校及实验学校监督、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等。民国肇建，为教育部佾事，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1924 年 11 月，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后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兼善本、金石部主任，又改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1937 年七七事变前后，参加主持故宫文物南迁。抗日战争时期，蛰居沪渎，协助文献保存同志会诸贤搜购珍籍善本。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森老一生为国家征集鉴定文物无算，有“国宝”之誉。“文革”中，



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首当其冲，备受挫折，于 1971 年 5 月 19 日含冤辞世。

陈梦家 (1911-1966)，浙江上虞人。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燕京大学师从容庚教授攻古文字学。先后任教于青岛大学、燕京大学、昆明西南联大等。早年以诗作知名，尝师事徐志摩、闻一多，为新月诗派中坚。1931 年出版诗集《梦家诗集》。1944 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 年归国任清华大学教

授，兼文物陈列室主任。建国后转中科院考古所。1957年，被打为右派。1960年，因夏鼐力荐，得以重新从事学术研究，开始涉及“武威汉简”，并完成《武威汉简》、《汉简缀述》两书。“文革”伊始，即备受凌辱，于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同年9月3日，自缢身亡。著作有《殷虚卜辞综述》、《老子今释》、《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尚书通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等。

原函如下：

森老先生赐鉴：前奉手教，敬悉一一。郭若愚君曾有信来解释“甲骨掇拾”因故未能出版，晚已再行函请其以已印散页见赐，尚未得覆。尊处所得李峪铜器，与梅原书对，知所获均属佳品（壶对最重要），惟其中“猎豆”，不见梅原书中（《战国式铜器》）。又该批铜器中，有一铜兽，亦是要紧之物，倘能罗致到，最属理想矣。晚对李峪留在太原之一批铜器关心已久，今因先生大力，得以归公，实一大功德也。敦煌摹本展览筹备已经二月，将于本月十日前后正式开幕。日前曾往参观，材料甚为丰富，惜所借用之地点（午门正殿）过于狭小耳。近来文物处购物甚少，市上亦难见精品。专此，并请（撰）安

晚陈梦家敬上

四月五日

今按：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根据其中言及“敦煌摹本展览筹备已经二月，将于本月十日前后正式开幕”，可以断为1951年4月5日。这次展览，是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而开展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提议举办的。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任筹备委员会组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任副组长，展出敦煌文物研究所内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临摹本约一千一百二十余件，取得巨大成功。


又函中言及之郭若愚，字智龛，上海人。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40年师邓散木学金石书法，1942年师阮性山习画，1947年师郭沫若学古文字学及考古学，曾与金祖同、陈志良等组建上海美术考古学社，并出版有《模印砖画》。1950年供职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后调入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考古部，曾任保管部主任。1979年退休。擅书画，兼长钱币学。出版专著、论著有《殷契拾掇》、《殷墟文字缀合》、《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补编、《笔墨纸砚图录》、《陈端友刻砚艺术》、《铁云藏货》、《红楼梦风物考》、《古代吉祥钱图像赏析》、《落英缤纷：师友忆念录》、《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智龛金石书画论集》、《智龛品砚录》、《智龛品钱录》、《智龛品壶录》等。陈梦家这封信中所述者，则可与郭若愚本人所作《陈梦家先生的甲骨文研究》一文对勘，据郭文，两人开始接触，是在1950年，这年的11月23日，陈梦家给郭若愚写信道：“若愚先生：前在沪上，未获识荆，至以为怅。嗣经金祖同兄转告，大著甲骨集已印成待装，至祈早日见赐邮下。”可见两人相识，大概是郭氏主动通过金祖同转告其研究近状，引起陈梦家兴趣，来函致问。至于这封信中所说“晚已再行函请其以已印散页见赐”者，原信为1951年3月16日所写，中云：“欣闻先生于《甲》、《乙》两编已缀五六百片以上，闻之快慰！但愿早日出版，实大有功于契学也。至于‘甲骨掇拾’渴望已久，其中三四期卜辞，尤关重要。弟手下仅有明氏全份拓本及清华甲骨，所缺惟尊处一批，故恳请以已印散页先行寄下。”这封信说还未得到郭若愚的回音，但没过几天，陈梦家便收到了郭若愚寄赠的书籍，在4月15日的回信中，他说：“若愚先生：寄来《拾掇》及大札均已收到，谢谢！其中尊藏一批，最为重要，有若干片可与清华缀合。”关于陈梦家向郭若愚索观其未刊著作之事，陈梦家自己也曾有所记述，1951年7月末

陈梦家《殷契拾掇序》中说：“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为清华大学文物馆到上海购买甲骨，听说《殷契拾掇》已经付印，很盼望它能早日出版。一直到今年四五月间，我由北京写信给徐森玉先生，请他向编者借用已印未订的印本，承编者邮寄给我，甚觉材料的可贵。七月间到了上海，始识编者于衡山路华东文物处，我首即表示此书应该早日问世……”都可以看出陈氏对于学术后辈的殷殷厚意。陈梦家对于郭若愚研究的关心不止于此，详情可参上述郭文及陈梦家致徐森玉先生的多通信件中，此不赘。

函中所说的李峪铜器，即举世闻名的山西浑源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器，其大概情形，可参贾文忠《浑源春秋彝器传奇》一文，其中对于这批铜器的辗转流传经过叙述甚为详备。所谓“梅原书”，当指下文言及的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1893-1983）的《战国式铜器的研究》一书，此书1936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出版。其中的李峪青铜器图版部分，标为“在山西省太原府某所”的共有18器。上海博物馆曾收藏的李峪村青铜器共12件，其中的一件镶嵌鸟兽纹壶，后于1959年调拨给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收藏。现在上博所存李峪青铜器共计11件，其中尤以牺尊为人所知。而这些器物的详细情形，可参马今洪《牺尊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李峪青铜器》、周亚《浑源彝器话今昔》两文，兹不赘述。陈梦家这封信中所说的关于梅原《战国式铜器的研究》一书中收录器物与其后转入上海文管委者的关系，则大致为：梅原书图三（2）怪兽饰盖蟠螭纹鼎，即马文图十二，作蟠蛇纹鼎；图六（1）怪兽蟠螭纹牺形饰尊，双器之一，即马文图六鸟兽龙纹对壶；图六（2）兽首饰盖嵌珠错文鼎，即马文图二十五镶嵌龙纹鼎；图十六（2）结纽蟠螭纹，双器之一，即马文图十五、十六双龙络纹；图十九（1）有盖角系铜器，即马文图三十三环耳鼎；图十九（3）鸟首饰有盖敦，即马文图二十九镶嵌兽纹敦；图二十（1）怪兽纹

牺尊，即马文图一牺尊。另外，1959年被调拨的兽纹壶，可见于《考古》杂志1983年第8期卷末图版伍之4，即梅原书图十九（2）的双环有盖壶。也就是说，上海博物馆所藏及曾藏的12件李峪青铜器中，只有马文图二十、二十二的四虎蟠龙纹豆和镶嵌狩猎纹豆两器为梅原书所不收，这也就是陈函中所说的“惟其中‘猎豆’，不见梅原书中”。陈梦家以为最重要的“壶对”，无疑则指梅原书中图六（1）怪兽蟠螭纹牺形饰尊，双器。至于函中说的“有一铜兽，亦是要紧之物，倘能罗致到，最属理想矣”，可见此件器物未曾入公，则所言绝非现今的牺尊可知。查梅原书中图二十（2）为兽形铜制品，其形制与图二一所收京都藤井善助收藏的两件应该是一致的。想来，梦家函中所指就是这件。遗憾的是，这件铜器至今也不知其下落如何？

这十几件李峪铜器得幸免外流，保存于国内，过去都只提及原上海博物馆众人的功绩。今据陈梦家此函，知徐森玉先生在这批铜器划拨归公这点上，出力尤多，当然，这在森老一生保护文物的历程中，不过是一件小小的插曲而已。

郭若愚曾在《怀念文物工作的先驱者徐森玉先生》一文中记述他与森老的关系云：“我在研究甲骨文字的过程中，森老将他自藏的台湾原版《小屯殷墟文字乙编·下辑》给我剪接拼缀，又将他见到的甲骨原物，给我研究毡拓，使我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有一次他为中央文化部收购一枚‘宰丰骨’，从上海市文管会来电要我去鉴定。我在文管会看到原物，说东西不错。森老就凭我这句话化了一万元将此骨收买下来。1953年森老收购刘体智所藏甲骨一万片。他命我参加清点，对我完全信任。我有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指导我工作，帮助我工作，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有使不完的干劲。”显然，他对于森老当年对他的暗中的推毂和帮助还不是很清楚，否则，他的这篇回忆，想必会有更多的素材了。 

《神乌傅》书体特征分析⁽¹⁾

Calligraphic features of the written eulogy Shen Wu Fu

撰文/陈松长 张孝蕾

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6号西汉墓出土《神乌傅》竹简21枚。此墓的年代为西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简长23.5厘米、宽0.9厘米，两道编绳，若将20支简连起来，则横长约18厘米。尹湾6号汉墓所出土的其他简文均书于窄简之上，但是《神乌傅》却书写于宽简上。其中18支简书写了赋的正文，一简用于书写标题，另有一简上部文字漫漶不清，下部可见双行小字，尹湾汉墓整理小组认为“疑为此赋作者或传写者的官职（乃少吏）和姓名”。⁽²⁾还有1枚为素面简，简出土时顺序散乱，后根据内容将其重新整理，整理小组将标题和另一枚简均放于正文简之后。其中正文的前6支简（114-119），每简各留有两处占一个字空间的空白格，整理小组据此认为此6枚简应该是先编后写。除这6枚外，其余简都未见留空格，故整理小组认为其余应该是先抄写后编连。

《神乌傅》全文约664字，标题用标准隶书写，正文用章草体书写。是西汉晚期隶书、章草兼备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书法佳作。在汉代简牍中，很少见用章草（或称为隶草体）书写这么长篇幅的简文。对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草体演变的过程。

一、书体分类

这篇赋使用了两种书体，篇题（图1）虽只有3个字，但却是标准的隶书，书写非常工整。字形呈扁方形，笔力劲健，波磔分明，显得十分端庄大气。

关于为什么标题要特地用标准隶书来书写的问题，台湾学者郭伯佾认为：是因为标题字数较少且十分重要，为引起重视自然要用典正古朴的隶书来书写，正文部分字数较多，所以用草体来写比较简约便捷。⁽³⁾



图1

这篇赋的正文部分都是章草，全文虽只有600多个字，但细加分析，有两种明显不同的书体，应该是由两位书手所抄写。

一种是114号简的开篇14个字与120号简至131号简。第二种是从114号简第15字开始到119号简（包括119号简）。下面我们选取简文中出现频率较高，且覆盖比较广的字做一些对比，来分析正文部分划分成两个书手的原因：

1. 以“鸟”字为例：



114

121

131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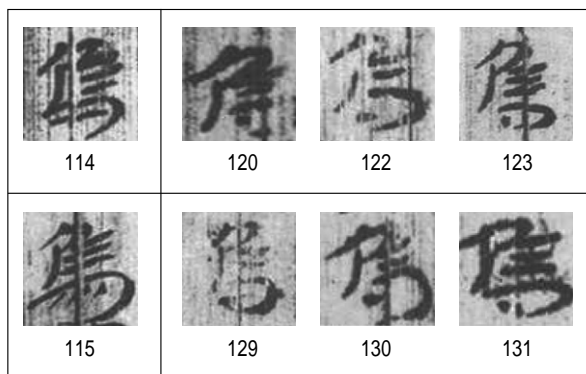
(1)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编年与研究》（批准号09YJA760007）资助。

(2)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9月。

(3) 郭伯佾：《尹湾汉简 神乌赋 的书体运用》，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简帛研究汇刊》第一辑2003年5月。












以上是《神鸟傳》中所有释出来的“鸟”字，从以上的字例可以明显看到，119号简上的“鸟”字与其他简上的同一字写法上有很大的不同。其写法更加接近“乌”字。

2. 我们再以“乌”字为例，这是在全文中出现得比较多的字：



表格左边的“乌”字在运笔上与右边的有非常明显的不同，相对来说114、115号简上的两个“乌”字笔画比较犀利，基本都是重入轻收，显得十分的干净利落。点画方头尖尾，折笔急转内扣。相反，右边的“乌”字的笔画则婉转迟涩，点画丰润饱满，横画平实充盈，折笔婉转回旋。

这种差别较大的字例还很多，例如：

子	 121	 127	 118	 119
此	 114	 131	 115	
虫	 114	 116		
意	 121	 119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左边的字体大气舒展，圆转回环，粗细对比不明显，如“子”字。右边的字则竖画比较重，粗细对比明显。如左边的“子”、“此”和“虫”字都比较圆转华丽，而右边的则比较纤细精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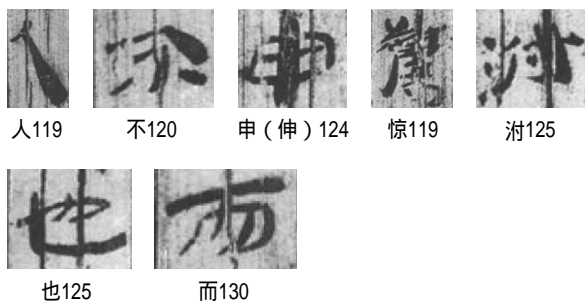
二、书体艺术特征

《神鸟傳》的正文部分书法单一但却丰富。单一是因为它通篇都是用较为成熟的章草书写，全篇书风基本一致；丰富是因为这种章草体的笔画、结构、布局等方面能兼具篆隶之长，字形奇丽多姿，复杂多变，极具艺术趣味。下面我们且分别做些讨论：

1. 笔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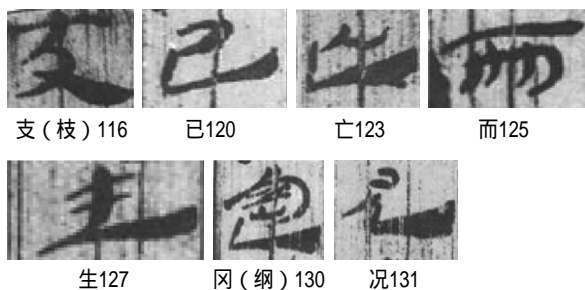
通观《神鸟傳》的文字用笔，其笔画有粗有细，富于变化，省写与连写兼容，波磔较长，圆转笔画较多。笔画形式多样，笔断意连。

(1) 粗细对比，富于变化。



上面的字例中，同一个字内，笔画的粗细变化明显，对比非常强烈。如“人”字，撇画短且细，捺画长且粗；再看“申”字，中间的竖划有意加重，重入重出，其余笔画轻细纤巧，这种粗细轻重的对比，具有非常直观的变化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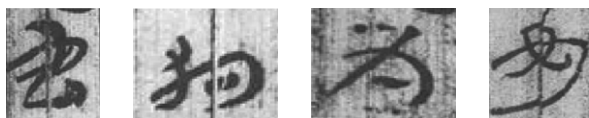
(2) 波磔较长，“燕尾”明显。



以上的字例中，“支”字的捺画，“己”“亡”“冈”“况”几个字的竖弯画，“生”和“而”字的横画，都保留有隶书韵味的“燕尾”笔画。在《神鸟传》的600多字之中，还能发现很多的隶书笔画，其中隶书的波磔与“燕尾”就非常明显。

（3）圆方兼并，或舒展或迟涩。

圆转之笔：



虫114 狗(拘)115 为116 女(汝)123

前两字为一位书手所写，后两字为另一位书手所写，但两位书手都会很擅长圆转之笔，如“虫”与“女”两字的圆转之势都非常明显，其中又以“虫”字更为突出，穷其婉转，温婉圆润。就是笔画相对比较偏方的字，中间也不乏圆转的笔画，如上面所举的“为”字和“狗”字。

方折之笔：



取123 亡128 道115

这三个字与前面一组字比起来方折之感要明显很多，如“亡”字，竖折不再圆转，折痕非常明显。

方圆兼并：



相116 鸟121 冈(纲)130

一字之内有方有圆，尽显变化之美。“相”字与“冈”字椭圆标出的部分都是一圆一方，方圆兼并。“鸟”字标出的那一笔是外圆内方，圆转而劲健。

以上三组字例，其圆转笔画给人以婉转流畅之感，方折笔画又给人以曲折顿挫之态。两者的结合使整个简书既流畅又厚重，富有变化。

（4）简省连笔，恣肆率意。

连动之笔：



鸣125 起123 绝124 横129

从上面的字例可以看到，标出的那一笔都是两笔相连而成的，比如说“绝”字左部和右部就是用一笔连接起来的。

简省之笔：



持127 身118 薄123

上面两字，“持”和“身”标出的部分有比较明显的简省现象。

以上两组，第一组笔笔相连，连动率意；第二组笔画简省，简约随意。这都是章草笔画流利的具体体现。章草之中，点画的连动是具有代表性的，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章草的这些点画连笔。

连点笔：



然117

“然”字的底下四点，在《神鸟传》中基本上是完全连写，有的甚至会写成一横画。

点横笔：



落118 洋116

“落”字的点横画已经成为草字头的变形，“洋”字的标出部分的第二点也是与横画相连。

点撇笔：



为120

“为”字的第一个点画与下一笔撇画联在了一起。

点弯笔：



死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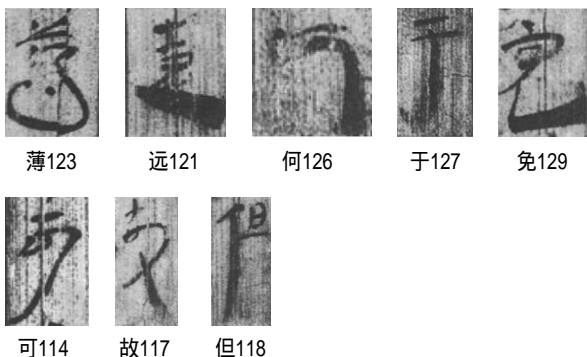
“死”字的点画连接了其右下的竖弯钩，连带之意十分明显。

另外，还有一些字虽未笔笔相连，但是笔断意连，笔画之间颇有前后呼应之意。如：



此三个字左部的最后一笔都与右部的第一笔前后呼应，如“地”字和“汗”字，图中标记的笔画都给人一种笔断意未断之意味。

(5) 长笔之美，极尽华丽。



“薄”字底下基本完全省略，以一长弯笔收尾，使字体顿时流畅奇逸了许多。如“远”字，最底下一笔额外的厚重盈实，与上部笔画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如“故”字左部写得非常小巧，右部突然环回夸张，这种视觉冲击，给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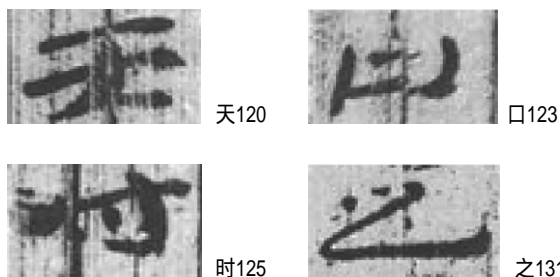
在《神乌传》中以上字例非常多，这种夸张的笔画笔意奔放，不管是书写者的率性而为还是刻意追求，都增强了简书的流利飞动之势。

2. 结体

《神乌传》的字体是章草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早期草书，所以其字形结构既有匀称圆转的篆书之意，也有古朴典正的隶体之味，还有简约飞逸的章草之美。王羲之《书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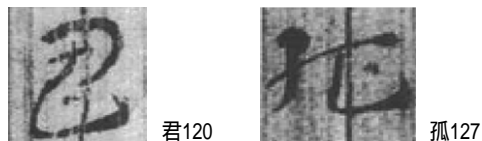
有云：“每为一字，数体俱入，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⁴⁾复杂多变正是《神乌传》简文结体非常明显的特征。

(1) 字体扁平，横向取势。



字体横向取势是隶书的代表性特点，在《神乌传》中，简文字体主要是横向取势，横画左右拉伸，竖画较短构成扁方字体。

(2) 删繁就简，约定俗成。



“君”字之“口”，“孤”字之“瓜”，笔画能省则省，能删则删，但是却遵行一定的原则，简约而生动。

(3) 有侧有倚，奇正相生。



“为”字的重心在点撇画，“申”字的重心在中间的竖划，“支”字的重心在底下的捺画。这样，三个字的重心就随着笔画的不同而变化。

草体所追求的是奇险，但是在追寻夸张的同时，我们总能找到其重心所在，故其字形显得平正而奇险。

(4) 伸缩借让，错落有致。

(4) [晋]王羲之《书论》。



雇125

他124

作118

绝124

“雇”字，“绝”字左长右短，“他”字，“作”字左短右长。书者通过笔画的伸缩，部首偏旁的变化，来达到同一字内部的变化。从而使原本方正单一的方块字，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5) 疏密变化，计白当黑。

紧密型：



鄙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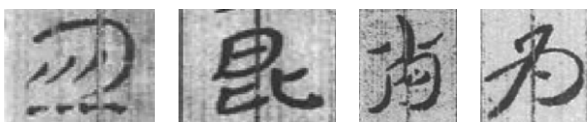
盗121

气114

丽115

笔画与部首都排列紧密，如“盗”字，上下部首之间，笔画之间都排列非常紧实。紧实得有点密不透风。

疏朗型：



117

112

123

120

笔画较纤细，构字部件之间联系比较疏松。如“昆”字，笔画较细，中间空隙较多，字体显得比较舒展。虚实相宜，虚多则显爽朗清新。

疏密结合：



丽130 (上密下疏)

罗130 (上疏下密)

權124 (左疏右密)

清代书法家邓石如曾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⁵⁾

一字之中，疏密对比，颇具视觉冲击力。

3. 章法

“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⁶⁾章草是与之前的隶书、篆书这类中规中矩的书体有很大不同的，它虽也有一定的规范，但是在规范之上它可追寻的变动空间比它之前的书体要大得多。这种变动在点画、结构和章法上体现出它的大不同。《神鸟傅》的布局跌宕起伏，“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⁷⁾，但在这极尽自然又富于变化的作品中我们见到的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气脉贯通，呼应承接，爽朗悦目，尽显章法之美。

(1) 有偏有倚，但字守中线 (图2之119局部)。

草体的特点是“字字异形，行行殊致”⁽⁸⁾，文字各自有自己的重心，似乎有的字偏左，有的字偏右，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首尾文字是在一条直线上。

(2) 字字独立，但承接呼应。

A. 上下呼应

笔画应承：从截取简中的几个字可明显看出，上一字的最末一笔与下一字的起笔都是上下引带的关系。如“乌鼠(最)”，“乌”字最后一笔弯画与“鼠”字的第一画图2的上下映带，使表面上字字独立的字有了相互承接呼应的意趣。



图2



乌鼠(最)114

击耳123

详车薄123

躬折伤128

(5)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

(6)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

(7) [唐]张怀瓘《张怀瓘书论·书断》，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

(8) [清]宋曹《书法约言》。

上下照应：《神鸟传》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两字是笔画相连在一起的，但每个字各有侧重。仔细看会发现字与字之间有着非常巧妙的呼应关系（图3之130局部），上一字往下“俯视”下一字，下一字亦“抬头”回应上一字。

B. 左右避让（图4中127和126局部），列与列之间并不讲究对称，但都能遥相呼应。每个字参差不齐，但却能够互相迎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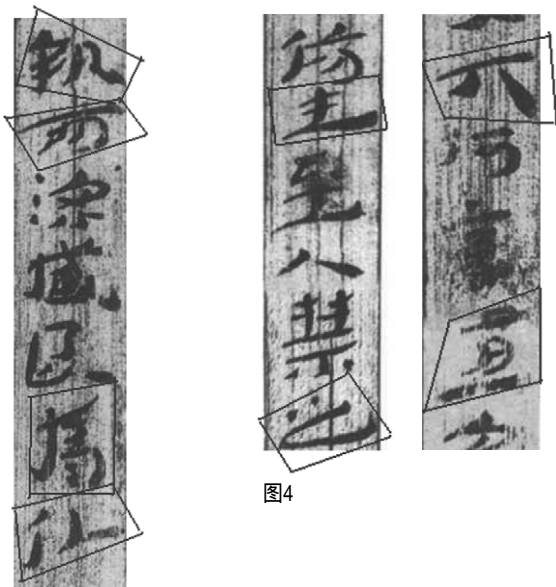


图3

图4

（3）虚实相生，动静相宜。

“知其黑，守其白”^{〔9〕}。讲究黑白的虚实结合，可以使得有些单支简上的章法显得富于变化。在图5的114局部中，上部分的文字排得较为密集，中间部分次之，下部分最为疏朗。虚实相对，虚实相融。张绅所言：“疏不至远，密不至近，如织锦之法，花地相间要得宜。”^{〔10〕}应该就是如此吧。

4. 风格特征

《神鸟传》的风格特征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自然之成。自然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也可谓书风的最高境界。《神鸟传》除了这种自然生动的风格之外，还显得复杂多变，飘逸洒脱。

不同的书手各自有着自己的运笔特点，总会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征。以下我们举同一书手所写的例子来分析其这种风格特征：“唯此三月，春气始阳，众鸟皆昌……”（图6之114局部）这一段简文比《神鸟传》其他简文笔画更为婉转灵动，书手对赋中春气怡然的景色描写已由文意延伸到他的运笔之上。“天地刚（纲）纪，各有分理。今子自己，尚可为士……”（图7之120局部）。这一段是雄鸟对盗鸟据理力争时的描写，书风明显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神鸟传》的书风更是糅合多种书风，其中匀称圆转的篆书意味使书风古朴典雅，扁方伸展的隶书意味使书风舒展开阔，流利动态的草书意味使书风更加流畅灵动。正是这几种风格的融合使得这篇《神鸟传》既雄健古雅又简约流畅，成为一篇不可多得的汉代简书章草的上乘之作。



图6

图7

图5

〔9〕 [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1月。

〔10〕 [明]张绅《法书通释》。

上海明代墓葬出土锡器

Pewter wares excavated from Ming tombs in Shanghai

撰文 / 何继英

上海已经清理发掘的数百座明朝墓葬中，有数十座墓穴内发现成套锡器，遗憾的是出土时多已锈蚀，呈碎块或粉末状，有的仅存痕迹，有的尚可辨出器形，仅有近十座墓中出土的锡器保存相对较好。

1.1958 年考古清理的宝山明成化十三年（1477）处士黄孟 夫妇墓，在黄孟 木棺盖上放置一套锡明器，29 件，为暖锅 5 件，壶 2 件，盘 15 件，烛台 1 对，火盆、高足杯、灯盏、香炉、苍壁各 1 件（图 1）。

2.1960 年发现的徐汇区明万历年间光禄寺掌醢署监事潘允徵家族墓中，在潘允徵穴室棺槨间放置锡暖锅 10 件，锡鱼篓罐 1 件；在潘允徵父亲明敕进承德郎浙江温州府通判潘惠墓棺槨间放置锡明器 14 件，计暖锅 9 件（图 2），壶、盆、灯盏、锡笔架、砚台各 1 件。

3.1964 年发现的浦东高桥镇海滨乡陈家石桥村一座明代夫妇合葬墓，男墓棺槨间出土一套锡明器，计有暖锅 5 件，壶 2 件，烛台 1 对，灯盏、奩、盆、盅、罐、盘各 1 件等。

4.1965 年发现的奉贤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敕封文林郎广西道监察御史宋蕙墓棺盖上放置一套锡器，计暖锅 13 件，壶 4 件，盘 15 件，供盒 8 件，器座 8 件，茶托 1 对，茶盅 2 件，烛台 1 对，花瓣口盘、火盆、三足炉、灯盏、玉壶春瓶、盅各 1 件等（图 3、4）。

5.1972 年发现的宝山冶炼厂明成化年间李姓墓出土锡明器一套，有暖锅 4 件，壶 2 件，烛台 1 对，耳瓶 1 对，高足杯 1 对，灯盏、盘、插铜筷和匕首的筋瓶、香炉、钵各 1 件等（图 5）。

6.1996 年发现的松江工业区科贝特一座明代墓棺盖上放置锡明器 20 多件，计有暖锅 5 件，壶 2 件，



图1



图2



图3



图4

盘 9 件, 盅 2 件, 盅盘组合器 1 套, 筷 1 双, 香炉、漏斗形器各 1 件等 (图 6)。

7. 1996 年发现的松江工业区新州印刷包装公司一座明代夫妇合葬墓, 男墓主棺盖上放置一套锡器, 已锈腐, 可看出器形的有暖锅 4 件, 盘 2 件, 烛台 1 件, 樽 1 件, 盅盘组合器 1 套等。

8. 2000 年发现的松江明代武略将军杨四山家族墓, 在已被破坏的 2 号墓中发现锡器 3 件, 为壶 2 件, 高足杯 1 件 (图 7)。

9. 松江博物馆藏“文革”时期松江明墓发现的锡器一套 26 件, 计暖锅 4 件, 盘 15 件, 烛台 1 对, 盅、钵、樽、火盆、交椅各 1 件, 器形规整, 质地厚实, 这套锡器是已发现的上海明墓锡器中保存最好的 (图 8)。

上海明墓中随葬的锡器, 尺寸都较小, 多为冥器。锡冥器在墓葬中的放置有一定规律, 大部分放在墓主棺盖上, 如黄孟墓、松江科贝特墓、松江新州印刷包装公司墓等。打开墓室后, 看见棺盖上放置一套锡冥器; 部分放棺椁间, 如浦东高桥墓, 潘惠、潘允徵父子墓的锡器放在木棺和木椁之间的空隙内。不仅如此, 成套锡冥器的排列也有一定顺序。以出土时保存较好的黄孟墓为例, 一套 29 件锡冥器, 排列七排: 第一排居中放 2 件器物, 左为长腹壶, 右为高足杯; 第二排放置 5 件暖锅, 锅中有盆; 第三排为 5 件大盘; 第四排 5 件中盘; 第五排 5 件小盘; 第六排从左到右为灯盏、烛台、香炉、烛台、圆腹壶; 第七排左边为火盆, 右边为苍壁 (见图 1)。松江科贝特明墓的一套锡器, 在棺盖上并排放木案两张, 案上放置锡明器 20 多件, 一张案上放香炉、暖锅、壶、盅等, 一张案上放盘、盅盘组合器等 (见图 6)。

在锡冥器的成套组合中, 器类主要有暖锅、壶、高足杯、盅、盘、瓶、烛台、灯盏、香炉、火盆等。

暖锅: 由锅身和盖两部分组成, 锅内多有平底隔盘, 应该是盛菜放在锅里以保存温度。锅身形制基本为圆腹, 平底, 三足, 只有松江



图5



图6



图7



图8

博物馆藏一座明墓的暖锅锅身附双提梁耳（图9-1）。锅的形式依盖分为两种，一种盖较矮，如黄孟墓、宝山李姓墓、松江博物馆藏器、及宋蕙墓的13件暖锅中的5件，盖的高度小于锅身的高度，约为锅身的二分之一（图9-2、9-3、9-4）；一种为高盖暖锅，潘允徵墓、潘惠墓、松江科贝特墓及宋蕙墓13件中的另8件，盖的高度同锅身的高度几乎相当（图9-5、9-6、9-7）。

暖锅在成套锡器中，一般有多件，如黄孟墓、松江科贝特墓各出暖锅5件，潘惠墓9件，潘允徵墓10件，奉贤宋蕙夫妇墓13件。同一墓的暖锅形制、尺寸基本相同，唯宋蕙夫妇墓13件暖锅分为高盖锅8件，矮盖锅5件。



图9-1



图9-2



图9-3



图9-4



图9-5



图9-6



图9-7

壶：以形制分为圆腹、长腹、筒腹、橄榄腹几类。

圆腹壶，直颈，溜肩，圆腹，管状流，提梁，平底。黄孟 墓、宝山李姓墓的圆腹壶提梁为一根圆柱弯成半圆形，蘑菇状盖（图 10-1、10-2）；松江科贝特墓、宋蕙夫妇墓、浦东高桥墓的圆腹壶，扁平提梁弯出对称折角，圆形饼盖（图 10-3、10-4、10-5）。

长腹壶，形制为小口，细长颈，椭圆垂腹，腹最大径在下腹部，腹两侧分设一鏊一流。杨四山家族墓、黄孟 墓、李姓墓长腹壶形制大同小异，以保存完好的李姓墓长腹壶为例，小喇叭口，细长颈，溜肩，小圈足，腹一侧为管状细长流，流嘴与颈部以一锡条连接，起到加固流嘴作用，另一侧为扁平耳性把手，覆盘形盖，蘑菇形钮，高 18.5 厘米（图 11-1、11-2）；奉贤宋蕙墓长腹壶，盘口，长颈近直，扁圆腹，



平底，细长管流直上竖，耳形把手，肩部一道旋纹。高 9 厘米（图 11-3）。长腹壶形制的差异，有可能反映出时代的早晚。

长腹壶《三才图会》器用十二卷注子说“事始曰：唐元和初酌酒用樽勺，虽十数人，一樽一勺挹酒，了无遗漏。无几改用注子，虽起自元和时，而辄失其所造之人。”的记载，这种长腹壶明代称“注子”。结合黄孟 墓棺盖锡器排列第一排仅在居中放两件器物——长腹壶、高足杯，不言而喻长腹壶为斟酒器，高足杯为饮酒器，二者组合成一套酒具。

筒腹壶，形体较简单，直口，束颈，筒腹，扁平把手，细长流，平底。浦东高桥墓筒腹壶无流（图 12-1、12-2、12-3）。

另宋蕙墓出土一件橄榄腹壶，小口，橄榄形腹，小平底，短流，柱形把手突出（图 13）。

壶在成套锡器组合中多为一把圆腹壶、一把长腹壶，或一把圆腹壶，一把筒腹壶共出。如时代较早的黄孟 墓、成化年间李姓墓、杨四山家族墓锡器中，各有一把圆腹壶、一把长腹壶，而浦东高桥明墓、松江科贝特明墓成套锡器中，则各有一把圆腹壶、一把筒腹壶。

高足杯 敞口，深腹，高喇叭形圈足。杨四山、

黄孟 墓、成化年间李姓墓，共出土 4 件高足杯，这几座墓为明代初期至成化年间的墓，在上海明嘉靖万历以后的墓中基本不见高足杯（图 14-1、14-2、14-3）。

盅：敞口，深腹，平底。松江科贝特墓、松江墓、浦东高桥墓、宋蕙墓中都有出土（图 15-1、15-2）。

盅盘组合器：仅在松江科贝特墓中出土 2 套，一套盅直接浇铸在盘中央；一套出土时盅置于

盘中间（图 16-1、16-2）。

盘：分花瓣口和圆口两种。

花瓣口盘较少，在浦东高桥墓、宋蕙墓中各出土 1 件。分别为六出葵花口和八出葵花口。宽平折沿，浅腹，平底（图 17-1、17-2）。

圆口盘在成套锡器组合中数量最多，且分大中小多种尺寸。黄孟 墓、松江墓中各有圆盘 15 件，并分成大、中、小盘各 5 件。盘是盛菜用具，盘数的多少应是反映了当时菜肴的丰



盛程度(图18-1、18-2)。

火盆:宽沿,浅腹,平底。成套锡器中有1件火盆。黄孟墓、潘允徵墓、成化年间李姓墓、松江墓等都有出土。火盆为烤火取暖的用具,形同盛菜盘,唯尺寸较盛菜盘大且厚重(图19-1、19-2)。

灯盏:喇叭形高圈足上承托一盘,盘中部立圆柱,柱上再承托一小盘,盘中有捻子(图20-1、20-2、20-3)。

烛台:成对出土。喇叭形高圈足上承托一盘,盘中部立圆柱,圆柱中部插长烛扦,个别烛扦上插有蜡烛。黄孟墓、宝山李姓墓、松江明墓、高桥墓、潘惠墓、宋蕙墓等各出1对烛台,形制大同小异。黄孟墓烛台盘中的立柱做成瓶形,形制较别致,李姓墓烛台出土时,其长插扦上还插有蜡烛,蜡烛能保存到今天,实属少见。宋蕙墓、浦东高桥墓的烛台盘中无立柱,直接为一根细长插扦(图21-1、21-2、21-3)。

香炉:形制为大口、深腹,三足。黄孟墓香炉敞口,束颈,弧腹,平底,三扁平足内弯。李姓墓香炉口微敞,筒腹,平底,三马蹄足(图22-1、22-2)。

瓶:分对瓶、玉壶春瓶、及插筷、勺的香匙筋瓶。

对瓶仅宝山李姓墓出土1对,整体造型呈“吉”字形。直口,圆唇,长颈,颈中部有一圆饼状檐,丰肩,束腹斜扩成喇叭形底(图23)。

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椁盖正中设长方形木供桌,桌正中一香炉,两侧各一瓶,再两侧各一烛台;福州明嘉靖年间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张海墓中,锡祭台上正中焊置一香炉,两侧各一锡瓶,再两侧各一烛台,清楚可见锡器组合中的香炉、烛台、对瓶为祭

器中的五供。宝山成化年间李姓墓出土锡烛台1对、锡对瓶1对、三足炉1件,为五供。

玉壶春瓶仅宋蕙墓出土1件。喇叭口,细长颈,溜肩垂鼓腹,矮圈足(图24)。

香匙筋瓶仅宝山李姓墓出土1件。直口,长筒颈,扁圆腹,喇叭形圈足座。瓶口插满筷子、勺子等餐具(图25)。

交椅:仅在松江明墓出土1把。圈背为一条流畅自如的弧形曲线,长条形背板,椅腿为四根锡棍交结而成,两前腿之间有踏板,两后腿间有一根锡棍连接,完全是仿木交椅而作,同松江科贝特墓出土的1件木交椅及存世的明花梨木交椅形制相同(图26)。

另外锡器中还有鱼篓罐、漏斗形器、砚台、笔架、樽、盆、钵、方盒、罐、器座等(图27、28、29、30、31、32、33)。

锡明器除上海明代墓葬中多有发现外,在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徐达家族墓中的徐钦墓、何妙莲墓各出土锡器1套。徐钦墓锡器有碗3,壶2,茶托2,烛台1对,玉壶春瓶1,盒1件;何妙莲墓锡器有碗4,瓶3,盘2,三足炉2,灯盏2,壶1,炉1⁽¹⁾。福州市郊发现的明嘉靖年间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张海墓中,锡祭台上有香炉、瓶、烛台、壶、酒壶、盘、鼎、杯等⁽²⁾;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桌面上陈设锡执、杯、盘、香炉、瓶、烛台等⁽³⁾。锡器作为明器随葬,宋代已见。考古发现在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中随葬一套锡明器,绝大部分是含锡成分的合金制品,种类较多,仿制当时的日常应用器物,有炉、壶、罐、瓶、盒、桶、碗、杯、锅、碟、豆、尊形器等等⁽⁴⁾。

锡明器,根据宋制对于士庶人丧礼,随葬明器均有规定,凡五品、六品常参官用“明器三十事,”七品常参官用“明器二十事,”“庶人

(1) 南京市博物馆:《明中山王徐达家族墓》,《文物》1993年第2期。

(2) 林钊:《福建省四年来发现的文物简介》,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3) 苏州市博物馆:《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清理纪略》,《文物》1975年第3期。

(4) 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考古》1986年第3期。



图18-1



图18-2



图19-1



图19-2



图20-1



图20-2

图20-3



图21-1



图21-2



图21-3



图22-1



图22-2



图23



图24



图25



图26



图27-1



图27-2



图28



图29



图30



图31



图32



图33

用明器十二事”。和《大明会典》卷九十九丧礼四：“冥器：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八品、九品二十事。”又从《明史》礼十四凶礼三记载：“初，洪武二年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钲二，鼓四，红旗、拂子各二，红罗盖、鞍、笼各一，弓二，箭三，灶、釜、火炉各一，俱以木为之。水罐、甲、头盔、台盏、杓、壶、瓶、酒瓮、唾壶、水盆、香炉各一，烛台二，香盒、香匙各一，香筋二，香匙筋瓶、茶盅、茶盏各一，筋二，匙二，匙筋瓶一，碗二，碟十二，囊二，俱以锡造，金裹之。……交椅、脚踏、马机各一，……食桌、床、屏风、拄杖、箱、交床、香桌各一，凳二，俱以木为之。”说明锡明器随葬为宋、明代葬俗之一，随葬锡器的多寡，同墓主人身份有一定关系，体现了当时的丧葬等级制度。纵观上海明墓中

有成套锡器随葬的墓，年代先后为明初杨四山家族墓，成化年间黄孟墓、宝山李姓墓，万历年间潘允徵、潘惠、宋蕙墓等，前后长达300年左右，几乎跨越整个明朝。墓主黄孟为处士，家庭经济殷实；杨四山为武略将军，五品官员；宝山李姓墓从墓内出土有木四梁束发冠，四梁冠，按明代职官制度，官阶在五品以上才可以佩戴，另其墓墓圻规模、木棺及随葬木仪仗俑，木家具明器，成套锡明器及瓷器等，反映墓主人官阶至少在五品以上；潘允徵为光禄寺掌醢署监事，官阶从八品，父亲潘惠为浙江温州府通判，潘惠同左都御史潘恩是亲兄弟，潘氏家族为明代上海四大望族之一。宋蕙为嘉靖敕封文林郎广西道监察御史，松江科贝特明墓、浦东高桥明墓虽不知墓主为何人，但从出土比较丰富的随葬品反映出墓主人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

Excavations

Pewter wares excavated from Ming tombs in Shanghai (By He Jiying)

There are several hundred Ming-Dynasty tombs excavated in Shanghai, and sets of pewter wares were dug out of some.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se excavated wares were in poor condition when found, either in the form of pieces or powder, and their original vessel shapes can barely be figured out in most cases. However, pewter wares from up to ten tombs were found in relatively good condition, which are presented by this article.

Cultural Heritage Forum

Clarifying an issue in modern Chinese-museums history: the founding date of Xujiahui Museum in Shanghai

(By Lu Jianchang)

Since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in the last century, it has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a French Jesuit named Pierre Marie Heude set up 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t Xujiahui (later known as Musée Heude) in 1868,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a.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refutes this view with a number of relevant materials and evidences gathered during recent years. In fact, Musée Heude was neither founded in 1868 nor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lebrities' archives in a museum's archives work (By Chen Yunk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On how to collect and make digitized, multimedia data for a museum (By Zhu Zhongyi)

Book Review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ome books (By Ding Ji)

Loc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A chronicle of Xie Zhiliu's life (part VII) (By Zheng Zhong)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Famou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Shanghai in early 1911 (By Ma Jianping)

Updates

Upgrading the registration and storage in Liuli China Museum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nghai Museum

(By Xing'er)

近代中国博物馆史上 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上海徐家汇博物院创建年代质疑⁽¹⁾

Clarifying an issue in modern
Chinese-museums history: the
founding date of Xujiahui Museum
in Shanghai

撰文 / 吕建昌

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到现在，学界凡论及近代中国博物馆史，几乎都认为外国人在华最早开办的一座博物馆是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创办于 1868 年的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如 20 世纪 30 年代末上海通社编的《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徐家汇博物院是韩伯禄司铎（P. Heude）于 1868 年创立的。”“当韩伯禄司铎未来中国之前，徐家汇天主堂里略已收藏生物标本，但是未尝有博物院的设置。韩司铎于 1868 年 1 月 9 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上海，就在徐家汇创立博物院。”⁽²⁾前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编的《中国博物馆史》中亦云：“我国近代意义之博物馆的设立，始自同治七年（1868）法籍天主教神父赫特（Pierre. Heude）在上海徐家汇创设之震旦博物馆，亦称徐家汇博物馆。”⁽³⁾



20世纪30年代的震旦博物院

（1）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

（2）胡道静《震旦博物院史略》，载上海通社编《民国丛书·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四编（卷 81）第 379-380 页，上海书店 1992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1868 年法国耶稣会士 P. 厄德（汉名韩德，又名韩伯禄）在上海创办徐家汇自然博物院，藏品主要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动植物标本，1930 年以后划归同属耶稣会的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4〕}国家文物局主持的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之一、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震旦博物院是 1868 年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韩伯禄（又名韩德）创建的……”^{〔5〕}然而，笔者近年发现的一些相关资料，足以证明上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既不是创办于 1868 年，也算不上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

—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倚仗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再次进入中国。1847 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了天主教耶稣会总部，成为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大本营。然而，由于洋教士的强行霸道与傲慢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歧视与偏见，引起国民对洋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反感，一些地区传教士的不端行为，甚至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愤怒，纷纷起来抵制教会的传教活动。耶稣会在江南地区的传教活动极不顺利，尤其是 1868 年的扬州教案与 1869 年安庆教案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了耶稣会上帝福音传播。为了推动江南教区的传教事业，教会决定采取新的传教策略，即沿袭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科学传教”的方法，在教区内建立科学研究机构，期望通过开展科学文化活动引得华人的好感与信赖，从而有助于推进传教事业。



1883 年的上海徐家汇博物院（中央偏右边的白色两层楼房）

据法国传教士史式微（J. de.ca. Serviere）《江南传教史》记载，1872 年 8 月，在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和谷振声会长主持的徐家汇会议上，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委员会计划开展四項工作：“（一）在高龙鞏神父领导下成立气象台和出版科学杂志，在徐家汇建造一座‘与耶稣会相称’的天文台，将气象记录和观察所得编成杂志，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二）在韩伯禄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他陆续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将其主要记录、论文编辑成册，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三）在费赖之神父领导下研究中国的史地工作，其中包括江南新教区的历史概况、老传教士们的传记……（四）用中文出版一本讲科学的与护教的杂志。”^{〔6〕}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江南科学委员会的四項计划都先后得以实现。“1873 年 2 月，开始建造天文台，7 月神父们已经能搬进去住了。”^{〔7〕}同年，《天文月刊》也出版了。费赖之神父在 1869 年完成的《江南教会纪实》基础上，完成

〔3〕包遵彭《中国博物馆史》第 15 页，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4 年。

〔4〕《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第 749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

〔5〕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第 9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6〕〔法〕史式微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卷二第 206-207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

〔7〕〔法〕史式微《江南传教史》卷二第 206 页。



现存原震旦博物院建筑背面



昆虫博物馆

了《江南新教会通史》。以后，高龙磐、史式徽分著的同名《江南传教史》也先后问世。1878年3月，面向教外的宣传科学和弘扬天主教的中文杂志《益闻录》成功创刊并发行，1887年中文报刊《圣心报》亦创刊发行。至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创建，韩伯禄神父一边继续搜集长江流域的动植物标本，一边进行资料整理和科学研究，并利用徐家汇天主教总院的空余房舍，逐步展出他来华后搜集的动植物标本。1883年5月，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专用院舍建成，标志博物院的创建工作正式完成。博物院位于徐家汇天主教总院南侧的天文台旁，韩伯禄在两个楼

面的陈列大厅中布置了动植物标本，并向公众开放展示。

关于博物院创办者韩伯禄个人的一些情况以及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关系，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中有一段记载至关重要：“1868年，从事研究自然科学的韩伯禄神父来到江南，他的使命是研究中国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他开办博物院，并编写有价值的文章。他被派到教区的前哨，他在安庆、宁国等地坚持搞科研和传教工作。……只是在多年奔走之后，他才同意在徐家汇闭户埋首，编写他的学术论文和编排他找到的动植物标本。”⁽⁸⁾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1. 韩伯禄是自然科学研究者，1868年来华研究中国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2. 作为神职人员，他被派到安徽教区，负责安庆、宁国地区的传教事务；3. 他在从事传教活动的同时，也在当地搜集动植物标本，做科学研究；4. 他来江南几年以后，才在徐家汇整理和研究他搜集到的动植物标本，编写论文。

在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高龙磐（Augustinus. Chlombel）撰写的《江南传教史》中，也有一段关于韩伯禄与博物院的文字，可与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的记载相印证：“邻近天文台的是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创建博物院是郎主教确定的在建天文台之后的第二项工作。1870年起，一位神父已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我们还不能预见他的工作有多么重要。这位神父名字叫韩德（P. Pierre Heude），他作为金式玉神父（B. Seckinger）的传教伙伴而来到江南。此前金式玉神父几乎一直是单枪匹马在安徽传教。……当韩德神父坐船穿梭于江河湖泊之时，发现了许多令他产生研究兴趣的东西，他采集的第一件标本是软体水生贝壳。”⁽⁹⁾

这一段资料也提供了几条重要信息：1. 韩

(8)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卷二第206页。

(9) [法]高龙磐《江南传教史》（法文版）卷五第446页，上海土山湾印刷印行1900年。

伯禄是自 1870 年开始从事与博物院创建有关的工作，但当时人们对他搜集和研究自然标本与建博物院的事并未联系起来（因为创建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是 1872 年才提出）；2. 韩伯禄来到江南的首要工作是作为金式玉神父的传教伙伴；3. 韩伯禄在传教的同时，也搜集自然标本。

高龙 的《江南传教史》写于 19 世纪末，1900 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刷出版，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于 1914 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他们俩都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编撰《江南传教史》的时间都距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建立的年代不远，而且高龙 神父又是江南科学委员会计划四项工作其中之一的负责人，很可能参加了 1872 年 8 月的徐家汇会议。他们所记有关韩伯禄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之事，应该是可靠的。综合史式徽《江南传教史》和高龙 的《江南传教史》的有关记载，可以明确认定：创建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是 1872 年 8 月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徐家汇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在此之前，教会并无如此计划，更遑论 1868 年韩伯禄创立徐家汇自然博物院。

二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1868 年韩伯禄来江南以后就开始了动植物标本的搜集工作，到 1872 年，韩伯禄已搜集了一定数量的动植物标本。另外，在韩伯禄来江南之前，徐家汇天主教总部已藏有传教士达维（A. Divid）1860 年来华后搜集的一些生物标本。由此可知，徐家汇会议上之所以作出创办博物院的决定，是因为教会已有了一定的藏品基础。但原来的藏品基础与后来的博物院创办工作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不应相互混淆。现在流行的韩伯禄 1868 年创立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说法，实际上

是将两个前后有一定的联系，却又有着明显差异的概念合二为一了。那么为何会出现混淆，源头何在？在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柏永年司铎（F. Courtios. S.J.）发表的一段文字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1902 年韩伯禄病逝，1903 年柏永年司铎来华，接任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住持。1928 年，他在《自然界》杂志中以“徐家汇博物馆”为题著文，介绍了徐家汇博物馆的创办以及韩伯禄的主要成绩、博物馆的收藏等情况。他在文中说，“此博物馆系创于韩伯禄神父到上海以后，即西历一八六八年正月九日”。^{（10）}文中关于徐家汇博物馆的创办，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上限，即 1868 年 1 月 9 日韩伯禄神父到上海以后，但没有明确指出是以后的哪一年。这就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就是 1868 年开始创办。这可能是目前所见的最早中文出处，也是后来各种文献中关于徐家汇博物馆 1868 年由韩伯禄创办的依据。如 1936 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编的《中国博物馆一览》就这样介绍震旦博物院“清同治七年，（西历 1868 年）由韩伯禄司铎 Pere. Heude 创办，初名‘自然历史博物院’，光绪九年（西历 1883 年）开始建筑院舍于徐家汇耶稣会总院之南”。^{（11）}

1929 年柏永年病逝。1931 年，徐家汇自然博物院被并入同属天主教会徐家汇总部的震旦大学，并隶属于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大学博物院。1933 年冬，新落成的震旦博物院正式开放。同年，昆虫学家郑璧尔（P. Piel）出任震旦博物院院长。他在任内做了一件与博物院史有关的重要事情，即在 1939 年 5 月 20 日举办了纪念博物院创立七十周年大会（原定于 1938 年举行，因战事影响，所以在次年补办庆典活动），与会者三百多人，其中包括法国驻华大使、驻沪总领事以及商务参赞等法国政府官员。^{（12）}5 月 21

（10）[法]高龙 著《江南传教史》（法文版）卷五第 446 页，上海土山湾印刷印行 1900 年。

（11）严建强《计算机网络时代博物馆展示的传播与体验》，《中国博物馆》2004 年第 1 期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一览》第 75-76 页，中国博物馆协会事务所印行（北平）1936 年。

日起,博物院免费开放两周。纪念大会认定博物院是韩伯禄 1868 年创立的,其依据也就是柏永年的说法。国内许多报刊纷纷对纪念活动作了报道,经过媒体的宣传,“韩伯禄 1868 年创办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观点广泛传播,于是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根据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韩伯禄 1868 年初来到江南,并未在当年就进行博物院的创立工作。1869 年到 1870 年间,他作为安徽教区传教负责人金式玉神父的传教伙伴,负责安庆和宁国地区的传教事务。1869 年 11 月初,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安庆教案”事件。在冲突中,神职人员遭到当地民众的追打,教堂被毁,韩伯



自然博物馆

禄侥幸从教堂后门溜出,逃到长江边上他平时采集标本的专用小船中,从安庆回到上海。⁽¹³⁾此后,韩伯禄神父虽然名义上还是负责安庆地区传教的神职人员,但已经不再去安庆传教,一直在徐家汇天主教耶稣总会初学院和神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¹⁴⁾“编写他的学术论文和编排他找到的动植物标本”,其间还不时外出采集动植物标本,其踪迹遍达长江中下游。⁽¹⁵⁾

为何柏永年会把韩伯禄来华后开始的动植物标本采集研究看作是创办博物院的活动?这里涉及博物馆史追溯的一个基本标准的问题,即到底应当以博物馆建成开放作为该博物馆的诞生之日,还是从博物馆建设的准备前期就开始起算?虽然韩伯禄前期的动植物标本搜集与研究同后来的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建立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不是必然的关系。因为搜集动植物标本工作的本身是博物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需要,搜集与研究自然标本行为的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博物院的建立。只有 1872 年当教会确定了建设博物院的工作计划,并且由韩伯禄领衔负责创建之后,这时他以往的搜集研究自然标本工作才与博物院创办联系起来,成为后来创建博物院的基础。即便如此,仍应当明确: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筹建工作正式开始于 1872 年 8 月的徐家汇会议,而不是在这个时间之前。但是柏永年认为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最初是随着韩伯禄搜集的大量标本而建立起来的,并且是由他一手创办的,于是就把他 1868 年抵沪后开始搜集动植物标本的活动与 1872 年徐家汇会议之后博物院的创办活动等同起来,这就有了韩伯禄 1868 年来沪就创办徐家汇博物院之说。假如按照柏永年的逻辑,甚至可以说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创办时间早于 1868 年(因在韩伯禄来沪

(12)《科学》(科学新闻栏)第 328-330 页,第 23 卷,第 5/6 期,1939 年。

(13)[法]史式徽著《江南传教史》卷二第 346 页。

(14)《江南传教史》卷二第 299 页。

(15)[法]柏永年著、杜若城译《徐家汇博物馆》,《自然界》第 3 卷第 2 期,1928 年第 143-150 页。

之前,已有传教士在华搜集了一些生物标本并收藏于徐家汇天主教堂),但这是有悖常理的。

1939年震旦博物院举办创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其年代计算的依据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一个机构创立的周年纪念,应该从它的正式诞生之日起算,如果把前期的准备阶段也连同一起算入,那是不正确的。在追溯某一历史事物的时候,人们往往有一种心理,即把该事物产生的年代说得越久远越好,这种现象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追溯历史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与夸张,不然就会误导别人。迄今所见论及近代中国博物馆史的文献,几乎都参照柏永年的观点,认为韩伯禄1868年初来华就创办徐家汇博物院,可见其对后人的误导影响之大。

同样是法国传教士,高龙鞞神父对于韩伯禄来华早期的搜集研究自然标本活动的看法就与柏永年不同。高龙鞞1869年来到江南,至1873年之前,一直是南京教区的传教事务负责人。高龙鞞虽晚于韩伯禄一年来华,但对韩伯禄的活动是了解的,他并不认为韩伯禄从1868年年初来到江南就开始了博物院的创办工作,1868年到1869年间韩伯禄所做的搜集自然标本工作,与早于他来到江南的达维(David)等其他传教士的搜集研究自然标本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在《江南传教史》中追溯徐家汇博物院的历史时认为,从1870年起韩伯禄从事的搜集自然标本工作,同后来的博物院创建是有联系的,可以看成是创建博物院之前的前期准备,但1870年时,“我们还不能预见他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因为韩伯禄来华后首先被派往安庆、宁国地区传教,1869年11月发生安庆教案后,才回到上海。因此,高龙鞞在《江南传教史》中把韩伯禄1870年开始进行与后来的博物院创建的有关工作,看作是博物院创建之前的

前期准备,正因为有了这个前期准备,以后才有了1872年教会创建徐家汇博物院的决定与计划,这在时间上是前后相衔接的。

三

笔者现在尚未找到能够直接证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最早开放的确切年代的资料。根据江南科学委员会计划的四项工作中其他三项的完成情况推测,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筹建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因为1872年提出创建博物院计划之时,教会已具备一定的藏品基础,也许因为当时搜集的标本还不够多或尚未经过系统整理,还不足以立刻建立博物院,所以当时做出的计划是在徐家汇总部珍藏并展示韩伯禄陆续收集的动植物标本,“逐步形成一個博物館。”从1872年8月计划确定到1883年5月徐家汇博物院专用院舍落成,前后历时11年,如果就此认定徐家汇博物院是1883年才建成开放的,筹建时间显然过长。有两条资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韩伯禄已经将部分动植物标本先期对外展出了。

一是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记光绪四年十月二十六日(1878年10月3日),“偕白德勒游英国博物院良久,午正归。”“余佐卿请小宴。席散后,法兰亭、傅法立来,一坐,同至徐家汇观法国教堂,一有女育婴堂,一有男育婴堂,一有博物院,游览极久,夜归。”曾说得很明确,1878年10月3日上午他参观了英国博物院(即上海博物院),下午在法国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徐家汇教堂、育婴堂和博物院。这说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此时已经对外展出。⁽¹⁶⁾

二是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四)记载:“西人于徐家汇隔河教堂侧建博物院一所,珍禽奇兽,毒蟒巨蛇,并蓄兼收,不下数千百种……苟有熟识之人,即可入门观玩。近则华众会主人仿而行之,罗致异物,锁闭室中,入观者必

(16)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132-13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先输青蚨五十翼。然一鳞半爪，具体而微，终不及徐汇之无奇不有也。”⁽¹⁷⁾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成书于 1883 年，书中记载之事当发生在成书以前，“华众会”系当时位于上海旧城以北一座著名茶馆，其主人参照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样子办了私人博物馆，这也表明 1883 年之前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已经对外展出。

根据上述两条资料推测，1883 年之前的徐家汇自然博物院虽尚无专门的独立院舍，但韩伯禄搜集的部分动植物标本已经在天主教耶稣会徐家汇总部对外展出，且展出的动植物标本数量已经不少，还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以后随着藏品数量的日益增多，原来贮藏和展出



震旦博物馆（今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

标本的场地已不够使用，1883 年教会遂在徐家汇天文台对面，建造了单独的博物院专用院舍。

即使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 1878 年之前已经对外开放展出，也不能认定它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座博物馆，因为此前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下称“亚文会”）创办的上海博物院已于 1874 年建成并开放。早在 1858 年，亚文会就提出了“设立一个图书馆及博物院”的目标，并把它写入了亚文会的会章中。⁽¹⁸⁾ 1864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就任亚文会会长后，再次确立创建上海博物院作为亚文会的三个主要工作目标之一。⁽¹⁹⁾ 1869 年亚文会任命比塞特（Bisset, J. P）专门负责动植物标本的收集与管理。1874 年 3 月 25 日，亚文会上海博物院正式宣告建成，院址设在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圆明园路的亚文会会所二楼，展出动植物标本，免费向社会开放。由 1872 年创办《申报》的四大股东之一、元芳洋行英商朴赉懿（Pryer, W.B.）出任博物院第一任院监（相当于院长），上海娱乐事业基金董事会（Trustees of the Recreation Fund）提供借款银 1500 两，用其银行利息作为博物馆活动经费⁽²⁰⁾，以后上海博物院的经费主要来自上海工部局。

迄今我们尚未见到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在 1874 年 3 月之前就已建成并开放的直接证据资料，所以笔者认为，无论从提出创办博物院的时间还是从博物院建成开放的时间来说，亚文会上海博物院都早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的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是韩伯禄创办于 1868 年，是近代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17)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第 13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18) 胡道静《上海博物院史略》，载《民国丛书·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四编（卷 81）第 393-394 页，上海书店 1992 年。

(19)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China Herald, 12th, Mar. 1864. 转引自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第 17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

(20)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China Herald, Vol. XII, No.355, 19th, Feb. 1874.P.160.

Excavations

Pewter wares excavated from Ming tombs in Shanghai (By He Jiying)

There are several hundred Ming-Dynasty tombs excavated in Shanghai, and sets of pewter wares were dug out of some.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se excavated wares were in poor condition when found, either in the form of pieces or powder, and their original vessel shapes can barely be figured out in most cases. However, pewter wares from up to ten tombs were found in relatively good condition, which are presented by this article.

Cultural Heritage Forum

Clarifying an issue in modern Chinese-museums history: the founding date of Xujiahui Museum in Shanghai

(By Lu Jianchang)

Since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in the last century, it has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a French Jesuit named Pierre Marie Heude set up 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t Xujiahui (later known as Musée Heude) in 1868,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China.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refutes this view with a number of relevant materials and evidences gathered during recent years. In fact, Musée Heude was neither founded in 1868 nor the first museum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lebrities' archives in a museum's archives work (By Chen Yunke)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On how to collect and make digitized, multimedia data for a museum (By Zhu Zhongyi)

Book Review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ome books (By Ding Ji)

Loc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A chronicle of Xie Zhiliu's life (part VII) (By Zheng Zhong)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Famou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Shanghai in early 1911 (By Ma Jianping)

Updates

Upgrading the registration and storage in Liuli China Museum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nghai Museum

(By Xing'er)

试论档案工作之博物馆名人档案

Celebrities' archives in a museum's archives work

撰文 / 陈云柯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由此也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可以说当前是中国博物馆发展最好的时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博物馆数量持续快速增长，不论从文化遗产保护、陈列展览、社会服务还是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改革发展道路。任何一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该领域从业人员的辛勤努力和奋斗，他们在专业工作和研究工作中产生的反映其学术、艺术和科学技术成就的文书、声像等各种资料凝结了无数智慧与汗水，收集、整理和利用好这些文档资料，建立博物馆名人档案库显然十分必要。

通常，名人是指在国内外知名的，在某一学科、领域、行业有过重大贡献，颇具影响，并得到社会和历史承认的知名人物。在其公务活动中和个人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社会、机关及个人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片、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原始历史记录便构成了此人的名人档案。那么所谓博物馆名人档案，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定义：既有为博物馆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并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也有捐赠重要文物的知名收藏家，他们在从事博物馆藏品搜集、整理、鉴定、保管、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等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历史记录。

博物馆名人档案的特点与意义

博物馆，作为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业发展本身具有鲜明特色，该领域的从业人员大多长于历史、文化、考古、艺术等领域，不同于其他学科领域，博物馆名人档案也一定有其自身特色和重要意义。

一、博物馆名人档案的特点：

1. 收集对象具有针对性

博物馆名人，即是博物馆行业中的名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的检索类别中专门有“博物馆人物”一类，其中罗列了众多近现代文博行业的名人，比如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的著名金石学家、文物鉴定家徐森玉，中国美术考古及古文字学家、博物馆学家沈之瑜。这些专家学者均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他们推动了此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另外，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为博物馆赋予了一项新的职能——科学研究职能，除了展示馆藏精品，博物馆也成为了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工作场所，藏品就是科研的对象和资料，其中还包括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博物馆成为相应科学研究的基础，该领域涌现出大量的专家学者，并产生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学术成果，他们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真正原动力。当然还有那些著名的文物收藏

家和捐赠人，如冒广生、顾丽江、乐笃周、罗伯昭、华笃安等，他们将其毕生珍藏，甚至先祖的遗存文物毫无保留地捐赠给了博物馆，贡献巨大。因此博物馆名人档案的收集对象应当特别针对这些人群。

2. 收集内容具有专业性和艺术性

博物馆行业拥有一支强大的科研人员队伍，他们在博物馆藏品的鉴定、保护、修复和研究领域有着丰硕而卓越的成果。例如已故的上海博物馆两位老馆长马承源和汪庆正。马承源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学、古文字学和博物馆专家，汪庆正则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古代陶瓷、钱币、碑帖研究和鉴定专家，两位老先生各有所长，著作等身，在文物研究、鉴定和修复方面提出了许多科学合理的论断和新颖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并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体系，他们的研究成果专业性强，在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说代表了该领域

的研究水平。而有些专业学者自身还具备很高的艺术造诣，例如上海博物馆顾问谢稚柳，则是著名的画家、书画鉴定家。

3. 内容形式具有多样性

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基建档案，名人档案无论从内容还是载体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博物馆名人因其学科领域的特殊性，档案材料更为丰富多样。包括在工作和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文字资料和重要来往函电记录；论文、论著的手稿和样本；各类笔记、日记；重要会议以及学术会议的发言稿；重大活动的照片、录音、录像和记录影片；先进事迹和获得的荣誉证书、奖杯、奖牌；馆内外担任的各项职务证明；以及唁函唁电和悼词等材料。

二、建立博物馆名人档案的价值和意义：

1. 博物馆名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它是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由点及面地反映了所属时期的历史风貌。编写名人传记



需要以这些档案为基础，研究行业和学科发展史更需要以名人档案作为支撑。对于名人本身，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科研工作者为博物馆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历程；对于博物馆事业而言，我们更能通过这些记录了解行业发展的进程。

2. 博物馆名人档案具有学术价值，它客观地记录了一名博物馆从业人员在漫长的学科探索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取得的点滴成就，也许是一个考古遗址的发现、也许是一幅古画真伪的辨析、也许是一项文物保护技术的新突破等等，每一个成果都让我们离那段逝去的或是未知的文明更进一步，并重新焕发出藏品的生命力。建立博物馆名人档案能够使这方面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世代相传，得到继承和发展。

3. 博物馆名人档案具有纪念价值，它让我们客观真实地了解这些博物馆从业者文博事业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学习他们做学问时钻研的精神，研究文物时细致谨慎的态度，传播经验成果时大方自信的气度。当然，档案中的点滴记录有时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特性，正是有了这群个性迥异，对学术孜孜不倦的前辈们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迎来今日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

4. 收集名人档案有利于博物馆档案工作的开展，能够确保档案资料的实体安全和内容完整。在对博物馆名人档案的收集、整理和提供利用的工作过程中，不仅能让各业务部门感觉到其工作的价值体现和受尊重的程度，也能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档案意识，为博物馆档案工作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博物馆名人档案的征集与管理

一、博物馆名人档案的征集工作

首先，针对博物馆名人的特点制定一个符合该行业规律和特性的征集归档范围标准，优先收集博物馆行业中做出突出贡献、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名人档案，包括他们在博物馆行政、

业务工作中的各种记录，重大活动的声像记录，书报期刊出版物，论文、著作、发言稿及其手稿，获得的荣誉、奖项等等，做到能收尽收。

其次要做好档案宣传工作，加强各部门档案意识，只有在各个部门及个人的积极配合下，博物馆名人档案工作才能真正开展起来。我们的研究人员往往专注于科学研究工作，目前可能并不能完全理解收集名人档案的意义，作为博物馆档案工作人员，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向他们解释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只有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才能征集到更多、更完整、更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提升名人档案的质量和价值。

再次，应利用好博物馆档案工作的自身优势，主动收集相关档案资料。一般如果是由档案馆收集档案资料，会有被动性和滞后性的弱势，但作为博物馆档案部门，对于收集本行业内的名人档案则基本没有以上这些局限。我们能够及时了解各业务部门及相关人员在学科领域以及其它工作方面的新动向，也可以利用部门间的业务往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与理解，尽可能使那些有价值的材料在其形成之初就纳入征集范围，入档入库，避免因年代久远或当事人的疏忽、甚至辞世等多种原因而缺失遗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此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名人档案所收集的内容有很多都是凝聚了当事人的智慧与汗水，是他们毕生的心血结晶，非常珍贵，他们更愿意留在身边做私人收藏，这一点作为档案部门应给予充分理解和尊重。我们可以通过代存的方式或者对原件进行复印、扫描、翻拍等手段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作为档案人员，我们必需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负责的保管好这些档案资源，确保其信息及实体的安全，同时档案的原拥有者也应当享有利用名人档案的优先权和便利权，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档案利用服务，树立档案部门良好的信誉。

二、博物馆名人档案的管理工作

1. 名人档案必须以人为基本单位进行整理,形成档案数量较多的著名人物,可以单独成立一个全宗,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若干著名人物可组成联合全宗。比如可以根据文博研究领域的不同建立书画研究、陶瓷研究、青铜器研究、考古科学研究等全宗,将该学科方向的名人档案收入其中。同时设置名人档案专柜,使其区别于其他类别档案分开摆放,利于区分管理,也便于查找利用。

2. 根据名人档案的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文书类、电子声像类和实物档案类。文书类包括了名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文字记录,比如业务工作中的往来信函、报告、批示、手稿等;声像类包括各种电子信息载体的影像声像记录;实物类档案则包括奖状、奖杯、证书、各种出版物等。不同载体类别的档案可分开保管,文书类的以件为单位,装订编号后放入专门的档案盒内。声像类和实物档案则根据相应的归档要求存放,并且对每一份声像档案加注文字说明,以免因年代久远或找不到当事人对证而造成信息模糊和不完整。不管哪种载体档案,都应该依照时间顺序排列编号。不同质地载体的档案就有不同的保护要求和手段,纸质类、电子类、胶片类、实物类,由于材质不同,其保存的温湿度和照明要求也不同,档案库房的大环境符合档案保存条件的同时,还应该营造针对相应载体保存要求的各种小环境。

3. 为了能使名人档案材料更多更全更有价值,通常我们应在当事人在职在世时就注意收集工作,这种情况可能与平时档案室接受档案的流程有所不同,也加大了整理工作的难度。我们需要边接收边整理,并根据接收进来的不同材料相应地调整整理思路和方法,已接收入档的文件按类别和时间顺序排序,可以先不编号装订,以备将来有新的档案材料补充进来。根据已接收的档案我们也可能推测名人在相应工作或生活的轨迹,依据线索进一步推进接下来的档案收集工作,变被动为主动。

4. 在建立和整理名人档案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存原有档案的系统性、完整性,不能随意抽走档案文件而打乱了原有的秩序。所以当遇到档案中涉及名人档案的部分,文字类的可以复印或复制,照片类的可以翻拍或扫描,声像类的可以刻录,并在所有的复制件上注明原档案的出处,便以今后利用查找原件。

合理、科学地开发利用博物馆名人档案

博物馆名人档案是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博物馆的财富,也是宝贵的智力资源库和文化资源库,收集档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使其发挥价值最大化。首先,我们应为档案的形成者提供利用便利,正因为有他们的理解和配合,名人档案才能建立起来,我们应本着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的态度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良好的利用环境和条件,这样也可以增强档案原拥有人对档案部门工作的理解和信心,使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良性循环。其次,档案部门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名人档案编研出书,如名人传记或专项学科研究领域综述等。博物馆名人档案不仅是博物馆的资源,最终它也是社会的财富,作为博物馆档案部门,我们的工作开展肯定有局限性,如何让这么多丰富的文化、科研智慧更广泛、更高端的为社会利用和服务,使其创造出更多价值,仍然需要 we 继续摸索探究并为之努力付出。■

参考文献

- 丛培丽、王学军《名人档案的收集整理及思考》,《山东档案》2000年第3期。
- 王立新《名人档案征集和利用工作刍议》,《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7期。
- 喻晓曦、王志峰《做好名人档案工作之管见》,《黑龙江档案》2009年第5期。
- 杨靖《名人档案之我见》,《云南档案》2002年第1期。
- 黄明服《谈名人档案的征集》,《档案与建设》2001年第4期。
- 常奎芳等《浅谈名人档案的分类整理》,《山东档案》2005年第5期。

浅述博物馆数字化多媒体信息的采集和制作

On how to collect and make digitized, multimedia data for a museum

撰文 / 朱中一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即博物馆的基础信息数字化建设——主要针对博物馆藏品多媒体信息的采集和制作。包括藏品的拍摄、藏品的扫描、声音的录制、动画的制作以及图像的输出等。以下就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对藏品的拍摄、图片的扫描以及声音的处理谈一些体会和经验与大家共享。

一、树立文物拍摄的正确理念。

文物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不可再生是文物的最大特点，因此文物摄影的首要前提就是要保证文物的安全。

二、文物拍摄的几个要点。

文物的影像拍摄不同于一般的风景拍摄或人物拍摄，文物图片的主要作用有：一是为专家学者研究所用，二是为人们欣赏所用。要具备研究参考价值，文物的拍摄必须最真实、最清晰、最准确地反映器物的原来面貌，严禁将所拍摄的影像进行夸张、变形，或通过技术手段对器物进行修改或渲染。另外文物摄影还需具备欣赏功能，这就要强调文物拍摄的艺术效果，在文物拍摄时不仅对拍摄的器材和拍摄的环境要有很高的要求，而且摄影师也须具备一定的素质，不仅要有娴熟的摄影技巧、深刻的

审美感受力、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以及广博的艺术修养，还要懂得历史，了解文物，做到知晓文物的历史背景及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及生活的特点，在文物拍摄时将文物的特征及其所要表达的历史蕴意融会贯通，这样在拍摄时才能有针对性的运用光线、角度、镜头等摄影语言来为观众讲述文物。只有符合以上条件才能拍出文物的真正蕴涵。当然文物的拍摄没有固定的模式，每个人的审美观，以及对文物的理解不同，拍摄出来的艺术效果也不同。下面就一些技术因素进行讨论。

1. 使用胶卷相机（以下简称传统相机）成像是与数码相机的数码成像原理的对比及相机的选择：

数码图像通过像素来实现成像，图像放大后的清晰度会受到像素大小的影响，会受到拍摄精度高低的限制，显然图像的像素越高，在保持画面清晰的基础上，图像放大的倍率也就越大，但是无论图像的精度有多高，在保证一定清晰度的前提下，数码图像总会受到放大到“最大值”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制的放大，另外精度越高的图片文档也就越大，占用硬盘的空间也越大。数码图像最明显的优点就是拍摄成本低。

胶卷成像是通过光学原理将图像放大，

不会受到放大到“最大值”的限制,即使将图像放大成广告、海报大小,图像也同样能保持很高的清晰度,这是传统相机的最大优势,再好的数码相机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传统相机相对与数码相机最突出的不足就是成本高昂。

在选择使用传统相机或者数码相机时,本人认为在拍摄一些比较重要的藏品时比如一级品、二级品等最好使用传统相机拍摄,因为使用胶卷拍出来的图像色彩细腻、层次丰富,这是数码相机所无法比拟的。另外为了保证文物图片的印刷和放大质量,在器材方面应选择120规格的中画幅照相机,如有4×5规格以上的大画幅相机则更佳。在拍摄一般文物时可根据该文物图片的使用频率、图像放大的目标尺寸来确定使用数码相机还是传统相机,如果该文物的图片经常会在一些重要场合使用或作为展览陈列使用,那最好选择传统相机进行拍摄,在其他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数码相机拍摄。考虑到藏品多媒体信息数据库会占用大量的硬盘资源、拍摄成本等因素,采用这种做法性价比比较高。

2. 文物拍摄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

灯光的使用

在拍摄文物时灯光的合理使用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最好使用电子闪光灯,因为电子闪光灯是冷光源,长时间的照明不会损害文物。灯光运用的好坏直接影响文物的真

实信息,这将在以后对文物的认识和判断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文物拍摄的原则是要真实、全面、充分地展现文物的形态以及文物上的各个细节,根据文物的质地、器形,拍摄时使用的器材不同,灯光的运用也不尽相同,在文物拍摄时既要考虑到器物的质地又要考虑到器物各个角度的灯光使用。

在拍摄平面文物时最好使用光线比较均匀的灯光照明,尤其在拍摄幅面较大的文物,灯光的布置更要均匀,一定要将四周及中部的曝光值调整到基本一致才行(可以通过测光表来实现),不然画面很容易产生曝光不均匀的现象。如图1所示,照片上半部分的曝光值与下半部分的曝光值明显不一样,在拍摄过程中用光不均匀。图2所示,整个画面曝光值基本一致,在拍摄过程中灯光布置较为均匀。除此之外,还必须根据被摄文物的原来风貌,掌握好正确的曝光。比如在拍摄字画作品时,虽然它是呈现在一张平面的纸上的画,但它是通过利用墨色的浓淡或色彩的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的,也就是说在平面的画里蕴含着立体的画意,因此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它原有的风貌,拍出它的“味道”。虽然拍摄的是平面文物,但也要尽可能地将平面文物所具有的丰富的层次和线条结构表现出来,从而创造出形神逼真的艺术效果。

在拍摄立体文物时,阴影的处理非常关键,

很多形状比较复杂的器物,在使用灯光时要考虑到器物的各个阴暗的角落、凹凸不平的纹理等,要充分表现文物的各个部位,这时一般应避免阴影的出现。在处理阴影时,反光板的运用也很关键,它既能起到辅助光的作用,而且还能消除不必要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的阴影。例如，在拍摄瓷器、玉器等有反光的器物时，反光板

的作用很大，它既能使器物不出现光斑（白点），又能够使器物的底座部位得到合适的光亮度，使用辅助灯光有时也未必达到这种效果。如图3、图4都是没有使用反光板，器物的底座部位会给人一种杂乱的感觉，如果使用反光板或增加辅助灯，效果就会大不相同（图5、6），不但器物底座部位的阴影没有杂乱的感觉，整个画面没有多余的阴影，器物上没有明显的光斑，画面整洁不乱，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和空间感，整个器物的细节部位表现非常清晰。

在拍摄立体文物时，阴影可以强化主体的艺术效果，起到美化和均衡整个画面的作用，阴影会使被摄主体产生立体感和空间感。在构图时要注意利用阴影这一特殊元素加以变化和处理，使阴影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提示所要表达的图形主题。

在拍摄时灯光从光线的投射方向来说一般分为平光（也称顺光）、侧光、逆光、顶光和底光等，顺光对器物在影像上的表现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一般情况下很少用，在拍摄中多用

作辅助光；侧光是指从被拍摄器物的左右侧面投来的光，侧光能突出被摄器物侧面的明暗反差，还可隔离器物与背景，使画面具有较强的纵深感，增强了被摄物的立体感，在拍摄中常用为主光源；逆光主要作用是勾勒器物的轮廓线以及主体与背景的分界，有突出立体感的特殊作用，使器物更为醒目，在运用逆光拍摄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光线直接射入镜头，这样会在画面上产生多余光带；底光能使人物和动物类器型产生威严、凶狠和恐怖的感觉。灯光的强弱要根据不同需要而异，光的主次也是根据物体的器型以及各部位的主次关系进行安排。图7为没有使用辅助光的效果，给人以剪纸粘贴的感觉——没有立体感，而图8为增加了辅助光后的效果，给人有立体的感觉，两者效果完全不一样。

镜头的分类及景深的作用

镜头一般可以分为标准镜、中长焦距镜、广角镜等，它们的主要特点分别是：标准镜头焦距和底片画幅的对角线的长度基本一致。因此其视场角虽仍有大小差别（一般在45至55度之间），但大都与人眼视角接近，所以用标准镜头拍出来的照片，其画面的透视比例与人眼的透视比例非常接近。标准镜头与其他镜头相比，其焦距、视场角、景深范围，以及在相同拍摄距离上所获得的影像尺寸等都比较适中，因而被广泛使用。

中焦距镜头属于长焦距镜头一类，中焦距



图7



图8

镜头的焦距约为标准镜头焦距的 2 倍, 长焦距镜头的焦距则更长一些。它们的特点是焦距长、视场角小、在底片上成像大。所以在同样的距离上拍得的影像比标准镜头更大。由于中、长焦距镜头的景深范围比标准镜头小, 这种镜头最大的特点就是被摄主体与照相机一般相距比较远, 透视方面出现的变形较小, 缩短了文物主体前后的空间 (即景深短), 因此可以突出表现被摄主体, 所以大多用在器物的拍摄中。

广角镜头焦距短、视场角大、拍摄景物范围广, 一般适用于拍摄环境比较狭小、无法扩大拍摄距离的情况下使用, 成像特点是: 可以夸大被摄物体的前景 (鱼眼效果), 但是它的成像 (透视方面) 肯定会有变形。

若要保证器物的前后部位都清晰, 需在拍摄时用尽可能小的光圈, 利用景深距离来保证清晰的范围。另外, 还可以通过景深的控制, 利用虚实的对比来突出表现被摄主体, 焦点停放在前景的主体上, 则观看者的视线自然就会落到拍摄的主体上, 要表达的主体也就显得醒目、突出了。此外, 画面的虚实对比还可用来表现动感, 让被摄主体清晰而环境虚糊, 或被摄主体虚糊而环境清晰, 都能强烈地表现出被摄主体的动感, 要产生类似于这种效果的都可以通过运用中、长焦距的镜头来实现。总之, 景深距离的大小与镜头焦距长短的关系归纳为: 镜头的焦距越长景深越小, 焦距越短景深越长, 摄影师根据文物所要表达的需要以及要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效果, 选择合适的镜头。

背景的作用及选择

文物的拍摄还需利用背景纸的颜色来衬托被摄物体, 多数情况下背景颜色不宜太鲜艳、太纷乱, 杂乱的颜色会映衬在文物上, 使文物的轮廓线与背景颜色混合在一起, 轮廓线模糊不清; 大片鲜丽的背景纸, 会将艳丽的颜色反射到被摄器物上, 容易使文物的颜色失真 (图 9)。而使用中性的背景纸后文物的颜色更真实 (图 10)。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背景纸是中性色的中灰

色, 可以和任何色彩的文物搭配, 有利于衬托被摄物体。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在摆放被摄物体时要与背景纸有一定的距离, 这样会使画面有一种空间感和立体感, 如果没有距离或距离很小就会给人贴纸画的感觉, 缺少立体空间感。如图 11 所示, 选用中性色渐变纸作背景纸, 并且在文物与背景纸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这样会使画面给人以立体感和空间感。



图9



图10



图11

三、图片扫描的几个要点。

在文物信息采集中, 图片的扫描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图片扫描是平面的, 相对于文物摄影要考虑的因素少, 但图片的扫描跟文物的拍摄在某些地方很相似, 比如说在色彩还原方面, 在扫描过程中同样强调必须真实、客观地反映被扫物体的原貌, 特别是色彩还原的准确性, 这需要在进行扫描之前首先要对扫描仪进行各项指标参数的初始化调整, 一般情况下将某一台扫描仪的各项参数指标全部取消, 这样扫描出来的图像是最原始的, 然后通过专门的颜色校正设备——测色仪 (eye one) 根据国际标准色, 对某台电脑的显示器进行颜色的校正, 然后将扫描出来的图片 (必须是刚才指定的扫描仪扫出来的图片) 拷贝到这台电脑上, 然后将扫描好的图片, 根据国际标准颜色对该电脑的专业图像编辑工具——Photoshop 的色彩管理参数进行调整, 将扫描好的图片通过 Photoshop

的色彩校正后，这样输出的图片颜色相对就比较准确了。切记要将某一台扫描仪扫描后的图片，必须通过已校正好的图片编辑工具——Photoshop 来进行色彩调整，换一台别的扫描仪或换一台别的没经过颜色校正的 Photoshop 输出来的颜色是不正确的，总之扫描仪与电脑以及 Photoshop 三者是一一对应的，千万不可乱套。

另外，在图片输出尺寸的大小问题上很多人未注意精度与图片输出尺寸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讲精度越高图片放大的比例也就越高，但有时图像要放大到指定的尺寸，精度需要设置多高吃不准。其实在扫描软件里有个“目标尺寸”和“比例”的选项（图 12），这个选项就是让用户设定扫描图片输出尺寸的，扫描图片可以放大到某个设定的尺寸，这样在扫描时用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再加上适当的扫描精度，扫描输出的图片就能保证达到预期大小了。

四、声音的音质处理。

声音的录制和播放就是将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保存在电脑里，再将录制好的数字信号再还原成模拟信号。声音的采集是通过电脑声卡的位数和采样的频率来实现的，声卡的位数越多处理的声音单位也就越多，音质也就越精细，采样的频率越高声音的质量也就越好。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有 8 位或 16 位声卡两种，分别表示处理的信息单位为 2 的 8 次方和 2 的 16 次方，显然 16 位的音质处理要比 8 位的好的多，一般情况下 16 位的采样精度对于电脑多媒体音频来说已经足

够有余了。

声音采样的频率是指在一秒钟内对声音采样的次数，频率越高声音的还原就越真实，声音采集的频率一般分为 22.05KHz、44.1KHz、48KHz 三个等级，22.05KHz 只能达到 FM 广播的声音品质，44.1KHz

则是达到 CD 音质，48KHz 则更加精细。但是高于 48KHz 的采样频率人耳已经无法辨别出来了，所以在电脑上使用就显得多余。

声音的格式有 MIDI 文件格式 (.mid .midi .rmi) Windows 音频文件格式 (.wav) Mp3 音频压缩格式 (.mp3 .m3u) RealAudio 格式 (.rm) Windows Media 格式 (.wma .wax) wav 格式容量太大, 占用硬盘空间很多, 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一般情况下将转换成 mp3 或 wma。但都要经过压缩处理, 压缩方法分为有损压缩、无损压缩和混合压缩, 有损压缩是指如果把压缩的数据还原回去, 与原来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有损失的。然而目前还有一种 Ape 格式, 它是一种无损压缩方式, 即使还原回去还能与原来的音质保持一摸一样, 另外 Ape 文件的大小大约是 CD 文件的一半, 这对于多媒体数据库的存储可以节省很可观的磁盘空间。Wav 音频文件可以通过 Monkey's Audio 这个工具压缩为 Ape 格式, 操作界面也很简单 (图 13) 从图中可以看到 Wav 文件经过压缩后的 Ape 文件的大小只有原来的一半还不到。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多媒体信息的全面普及，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对多媒体信息的编辑、存储、查询及利用越来越便利，文物多媒体信息也是如此，但是作为文物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文物多媒体信息化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和发展，为文物的鉴赏、研究及保护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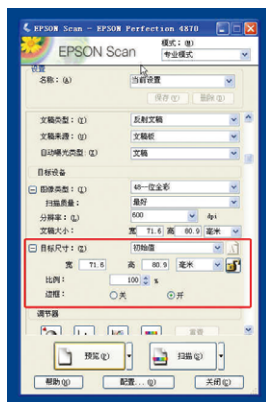


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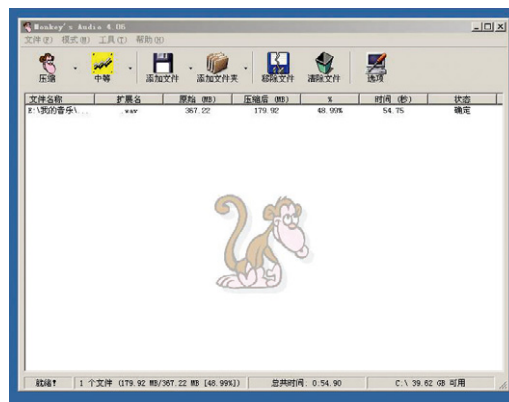


图13

书苑猎真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ome books

撰文 / 丁辑

《石家河文化玉器》

荆州博物馆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8 年 1 月
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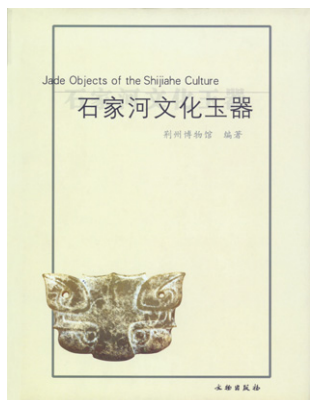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湖北省文管会为配合京山、天门两县联合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工程，在天门县石家河镇（今天门市石河镇），首次发现并发掘了这种文化遗存，以罗家柏岭遗址的发掘面积为最大，初步掀开了石家河文化的面纱。1970 年代后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随着石家河遗址群的田野考古工作重新开始，石家河文化的遗存或类似石家河文化的遗存也陆续有所发现。考古界相继有过“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的命名，经过认证后，学者们一致认为，石家河文化是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年代相当，但与其特征不同的一种文化遗存，最终还是以第一个发现、第一次发掘的地点命名为“石家河文化”。80 年代至今，随着石家河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发掘和深入研究，对石家河文化的范围、概况和文化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研究成果。

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继城背溪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地域性考古学文化，是直接承袭屈家岭文化而来的土著文化，其中心区在江汉平原的中北部，特别是石家河及其邻近地区。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例，其相对年代距今约 4600-4000 年。石

家河文化早期，未见有玉器出土；石家河文化晚期，开始有玉器出土。石家河文化各遗址所出土的玉器，是区分石家河文化早期和晚期的重要标志，也是石家河文化先人们的精神观念、社会秩序、生活习俗等的反映。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玉器，既是研究石家河文化传播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石家河文化与其他各文化间相互影响的重要资料。

石家河文化玉器，湖北以 1987 年秋冬至 1991 年秋季先后 8 次发掘的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玉器为代表；湖南则以 1991 年 11 月至 12 月清理的澧县孙家岗 32 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出土的玉器为代表。石家河文化玉器，大多为小型饰物，绝大多数出于瓮棺中，质地较软而易于加工。两地出土玉器的造型、雕琢技艺等略有不同，是因为各自所受的不同文化面貌的影响，有受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也有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既是中国玉器由原始走向成熟的反映，同时透露出中国文明社会的缕缕曙光。

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玉器相对比较集中的主要有 5 处。本图录从石家河文化历次出土的玉器中，一共精选和载录了 159 件，凡是比较重要和有代表性的玉器，基本都收录在其中。卷首张绪球先生所撰的《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概述》一文，介绍了“石家河文化玉器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址中玉器的发现情况”、“其他地区和其他时代遗存中疑属石家河文化的玉器”、“玉器的分类及形式特点”、“有关玉料的初步研究”、“玉器的加工技术和方法”、“关于雕像的研究”、“石



家河文化玉器和其他原始文化玉器的关系”。在关于雕像的研究”中，重点介绍了几位学者对人面雕像、动物雕像及人面雕像与动物雕像之间的关系，雕像的用途、用法和年代问题。既是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研究作的小结，也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研究提出了新的空间。正如张绪球先生所言：“在传世、流散或出土的玉器中，被疑属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为数甚多，由于其中不少玉器和龙山文化的同类玉器很难区分，所以有些学者就笼统地将这类玉器称为‘龙山 - 石家河文化玉器’。对这类玉器的文化性质及制作年代，尚需进一步研究。”⁽¹⁾

《李桦藏书票》

李桦编绘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第一版

藏书票首见于德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是 15 世纪的作品，故以德国为发源地。拉丁语作“EXLIBRIS”，英语作“BOOKPLATE”，日语作“书票”，中文作“藏书票”。藏书票是西洋人的概念，是西方有着现代文化特点的一种艺术形式，功用与中国藏书印类似，是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传播至中国的。藏书票采用了创作版画的制作方式，是粘贴在书的扉页上的一张小纸片。有精美的画面，有明确的文字，有丰富的色彩，令人赏心悦目。图像与文字并重，欣赏性与实用性结合，既是藏书者的标记，也是书籍的美化装饰品，更是藏书者爱书之情的体现。“藏书票的式样很多，方、圆、三角、椭圆的都有。最普通的是长方形，阔约二吋，高约三吋，有单色，有多色，图案变化，各具巧思，而以书、人体、动物和文学故事为最多。有时也画上藏者的门阀、身份和好癖”。⁽²⁾藏书票不但具有历史的意义，还有丰富的文学和艺术内涵。

中国藏书票最早的实物是粘贴在 1905 年版

的书上的“关祖章藏书”藏书票，采用了西方创作木刻的技法，中国古典传统风格的构图。是“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翻箱倒篋之余，正秉烛展卷，潜心攻读，四周散落大量的线装古籍和卷轴，图案上方书‘关祖章藏书’五个大字。大小两只书箱上分别标有书林、‘书易’字样”⁽³⁾的画面。

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先生全力倡导了新兴版画运动，作为版画艺术一支的藏书票艺术也进入了起步阶段。“藏书票艺术真正传入中国是以日本的藏书票艺术作为桥梁的，而斋藤昌三及其所著《藏书票之话》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⁴⁾。“叶灵风在 1933 年 12 月上海《现代》文学杂志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长文《藏书票之话》，这是中国第一篇也是在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唯一的一篇探讨藏书票历史和艺术特色的文章，不但文章题目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据核对，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陈子善语）。当年有不少人正是读了这篇文章后才真正了解什么是藏书票，并走上喜爱、制作、收藏和宣传藏书票道路的。

1934 年 6 月 19 日，李桦先生创立了“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主办了《现代版画》会刊。1935 年 5 月出版的第九辑《藏书票特辑》，刊登了李桦、赖少麒、唐英伟等七人的 11 件木刻藏书票作品，这是第一部中国藏书票原作拓印集，中国藏书票由此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文艺春天的来临，激励起了藏书票艺术家的极大热情和潜在能量，藏书票的创作再度成为热点，版画家们纷纷捉刀开始藏书票的创作。随着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



(1) 见张绪球撰《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概述》。

(2) 唐弢：《晦庵书话·藏书票》。

(3) 陈子善：《中国作家与藏书票之话》。

(4) 李允经：《中国藏书票史话》。

的成立(1984年3月16日),会刊《版画藏书票信息》的创刊(1984年11月),首届全国藏书票展览的举办(1986年8月24日),首届全国藏书票艺术研讨会的召开(1988年5月)等等,中国藏书票研究会也于1988年加入了世界性书票组织国际书票联盟(FISEA)。藏书票艺术已同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发展成了一种大众艺术,中国的藏书票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

《李桦藏书票》收录了李桦先生20世纪50—80年代间创作的藏书票100枚,是中国藏书票作品的第一本个人专辑。“《李桦藏书票》的出版,既介绍了李桦同志别具风格的藏书票艺术的成就,同时也纪录了中国藏书票历史的发展轨道,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可溯序)”。为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藏书票艺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字与上古文化》

李景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也是汉文化的组成部分。汉字,诞生于汉民族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成长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汉字,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演绎了汉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作为一种记录手段,也是汉民族文化相传承袭的主要载体。汉字犹如一个浩瀚的海洋,是现存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汉字的起源,有八卦说、结绳说、仓颉造字说等多种。汉字的创造是功高盖天、德厚覆地的宏伟大业,“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⁵⁾。从原始文字出现算起,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从产生在殷商的甲骨文算起,距今也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以后历经了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演变。

汉字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身边所熟悉的客

观事物的观察,形之于图画而固之于文字的结果。因其构字基础是具体而实在的象形,有单体象形与合体象形之类,所以汉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从汉文字的形态而论,汉字是以‘象形’的、甚至是绘画’的基础。不论一

个什么字,表实物的、有形可象的,当然莫不‘象’之;即使无形可象之字,亦设法以具体实在事物指示之、象征之、推测之、疏说之。所以一切‘会意’‘形声’乃至‘转注’‘假借’,莫不有其以物质为基础的含义,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表达法⁽⁶⁾。正因为汉字的本身也即汉字的结构形体直接包含着意义,所以人们能够从这字的字形上直观形象地辨知它的意义。

汉字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确立了汉字研究的学术规范。历经各代至清则大家辈出,形成了汉字研究的学术高峰。而对于汉字的文化功能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汉字已是中国文化的肌理骨干,可以说是整个汉文化构成的因子,我人必需对汉文字有充分的理解然后方可探骊得珠地掌握到对汉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⁷⁾。透过汉字的静态构形,不仅可以了解汉字的起源、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的特点、汉字的结构特性等;而且能深入到上古文化中去,挖掘出汉字所蕴涵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探寻汉民族文化之源。

本书从甲骨文、金文入手,以历史文献为佐证,全面系统地探讨这些佐证所处的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或者更前些时期,体现的是作者的研究视角和领域。作者首先从“文化的涵义”



(5)(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虚感第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114页。

(6)姜亮夫著,姜昆武校《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67页。

(7)饶宗颐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之《引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3月版。

入手，讲述了“汉字的表意性质”，归纳了“汉字形体的文化特征”。其次，重点探索和分析了汉字与以“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上古社会的物质文化”；汉字与以“原始宗教”、“上古祭祀”、“上古婚姻”、“上古的‘法’”为主要内容的“上古社会的精神文化”。最后以“汉字与上古征战”和“汉字与上古玉器”为内容，探究了汉字与战争、汉字与祭祀这两件国家大事的关系。（《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鬯，戎有受赉，神之大事也。”）

《越地民俗文化论》

寿永明 宋浩成 俞婉君著 人民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一版

“民俗”包括“风尚”和“习俗”。东汉应劭撰《风俗通义·序》曰：“风者，天气有寒燠，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由此可见，“风尚”是由自然环境因素造成的，而“习俗”则是由社会环境因素形成的。因两者密切关联，故合称“风俗”。

民间是指民众百姓中间，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官方而言，有着某种共同社会关系的群体，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层面；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组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演化和发展的原动力。风俗，源自于人们的社会日常生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人是因为生存的需要创造了风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会被民俗贯穿；因此说，“人”本身就是风俗之源，是风俗的创造者。风俗，是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变的；一个人只要生活在社会的群体中，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民俗的熏陶；所以说，“人”本身就是风俗之流，是风俗的传承者。对于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且相对独立的人类群体而言，民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人们不约而同且自觉遵循的规则，既是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心理的基本力量，也是人们创造、积累、传承文化成果的方式。

社会的变迁，会影响民俗的演化；民俗的产生和传承，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行为的本能，是社会文化的积淀。民俗的演化，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人类每天都在创造着、又受着约束的民俗，是最根本也是最具生命力的社会历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其形成的社会因素；作为一种生活文化现象，有其存在的自然因素。民俗既是展示当代社会面貌的窗口，也是了解前代社会发展的切入点；既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悠久和深远，也展现了人类生命力的饱满和活力。民俗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演绎变化，积久而成，世代因袭，而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民俗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助推器。

本书以越地的自然环境、越人的由来和越地的社会变迁为铺垫。所谓的越地，是指越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即以今绍兴为中心的绍宁平原，历经了三次海侵和海退而形成的自然地理状况；所谓的越人，是指经过秦汉以后多次大规模人口迁移而生活居住在越地的人口，也就是指越地的主体人口；所谓的社会变迁，是指越人所经历的原始社会、越国时期、秦汉至明清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以越地民俗的起源与形成、越地民俗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为切入。概述了越地的物质生产民俗、社会生活民俗、信仰俗神民俗、口传文学曲艺民俗、方言俗语文化民俗等。试图勾勒出越地民俗的发展过程、形成机制和存在形态，并由此挖掘越地文化的内在个性、及其顽强的生命动力。其中“越地民俗信仰与稻作农业”的概述，是民俗源自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典型；而绍兴地区“堕民”的概述，是最具越地特色的民俗现象之一，也是地域民俗文化研究的课题之一。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祥和细腻的人文环境，孕育了别具风格的越地民俗文化。



谢稚柳系年录（七）

A chronicle of Xie Zhiliu's life (part 7)

撰文 / 郑重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三十九岁
鉴定陈佩秋藏郭忠恕《避暑宫殿图》为真迹。

作《春日过白门与一涵先生同游玄武湖奉和原韵》诗：“披波东风惜鬓华，眼前烟水练湖赊。巴山苦恋云兼雾，陇上亲吟雪里花（一涵先有陇梅诗）。却忆南朝莲叶好，共经曲岸柳丝斜。清波容与清髯美，不得追陪听鼓笳。”（摘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壮暮堂诗钞》第7页）

《谢稚柳画集》二集出版。沈尹默为题签，潘伯鹰题诗：“画苑千年各一军，诗家小谢画尤

勤。毫端放过王都尉，更向秋堂梦道君。”此集收图十二幅《梅梢试粉》、《秋石》、《江干图》、《水仙》、《霜枝翠羽》、《秋实静禽》、《万木齐峰》、《山斋清话》、《烟江晓泛》、《峨嵋金顶》、《溪山平远》、《雪泛图》。

《万木齐峰》题识：“董北苑《万木齐峰》载《宣和画谱》，今不可复见，王石谷曾临一本，了无当意处，余以意别为此图，以当前制。”

《山斋清话》题识：“戊子五月，苦篁斋中效黄鹤山樵，元人中以论学北苑者，当推山樵为大家。”

《烟江晓泛》题识：“戊子五月调啸阁效黄鹤山樵意。”

《水仙》题识：“吾友潘伯鹰诗句：拍肩抱烟水仙王，他日当以此句求峻斋为予治印。”

《溪山平远》题识：“学梅道人。”

《雪泛图》题识：“戊子五月效宋人。”

《秋实静禽》并诗：“竹里霜催野果红，秋禽无语对西风。嫣香不道春间路，还与疏林烂漫通。”

《霜枝翠羽》诗云：“门外青螺压雾收，千林芳色老与秋。野禽应识倡条叶，已有霜飙在上头。戊子初春鱼饮溪堂并书，稚柳居士谢稚。”

七月作《峨嵋金顶》，款：“调啸阁用郭河阳法写峨嵋金顶，稚柳居士。”

作《仿燕文贵溪风图》，题：“燕文贵《溪风图》，今在蜀郡张氏，予曾获观，兹以意别为此图，兼用北苑法。戊子六月，鱼饮溪堂，稚柳居士。”



谢稚柳与徐森玉

作《仿王蒙山水》，题：“董思翁题北苑《潇湘图》云：‘僧巨然于此还丹，梅道人尝其一鼎裔。’其实元四家中，以山樵最能得其神髓，元人周尚题其《谷口春耕》，有老董风流尚可攀，正谓北苑也。予尝见《太乙观泉》、《春山读书》二图，俱阔笔奔放，而《太乙观泉》尤肆野绝伦，有拍塞天地之概，沈雄渊穆，在青弁谷口之上。戊子十二月，调啸阁并记，稚柳居士谢稚。”铃印有“龙钟三十九”、“穠蕞”。

为徐悲鸿题《八十七神仙卷》：“悲鸿道兄所藏《八十七神仙卷》，十二年前见之于白门，旋悲鸿携往海外。乍归国门，骤失于昆明，大索不获，悲鸿每为之道及，以为性命可轻，此图不可复得。越一载，不期复得之于成都。故物重归，出自意表，谢傅折屐，良喻其情。此卷初不为人所知，先是广东有号吴道子《朝元仙杖图》，松雪题谓北宋时武宗元所为，其人物布置与此卷了无差异，以彼视此，实为滥觞。曩岁予过敦煌观于石室，揣摩六朝唐宋之迹，于晚唐之作，行笔纤茂，神理清华，则此卷颇与之吻合。又予尝见宋人摹周文矩《宫中图》，风神流派，质之此卷波澜莫二，因知为晚唐之鸿裁，实宋人之宗师也。并世所传先迹，论人物如顾恺之《女史箴》阎立本《列帝图》并是摹本，盖中唐以前画，舍石室外无复存者，以予所见宋以前惟顾闳中《夜宴图》与此卷并为稀世宝，悲鸿守之，比诸天球河图，至宝是宝，良足永其遐年矣。”（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徐悲鸿一生》第275页）

悲鸿爱金冬心，大千爱宋人画，大千曾以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调换悲鸿的董北苑《溪岸图》，此事悲鸿在《风雨归舟图》上有题识曰：“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正《溪山行旅图》，周东村《北溟图》，与此幅可谓世界所藏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荆董画世界尚有之，巨然卑卑，俱难当吾选也。1938年秋，大千由桂林挟吾画董源巨帧去。1944年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

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为重，不计名字也。”（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徐悲鸿一生》391页）悲鸿的《八十七神仙卷》完璧归赵后，大千托稚柳与悲鸿相商，随悲鸿所喜，与悲鸿调《八十七神仙卷》，稚柳曰：“悲鸿视此卷为生命，还是别调了吧。”大千遂罢。

是岁，大千由北京到上海，在吴湖帆丑簃作画。吴湖帆提笔画了幽兰，梅兰芳画了一枝梅花，大千作《浣溪沙》词，经稚柳修改数字，题写在画的左上角。词曰：“试粉梅梢月有知，兰风清露洒幽姿，江南正是好春时。珍重清歌陈簇落，定场声里动芳菲，丹青彩笔妙新词。”

致简琴斋信：“琴斋道兄：上月二十九日手教奉，惠法镌四印（印文当思得再奉求）丹林兄并转到，苍古绝伦，拜嘉何极，寄上拙作照片数片，聊博一笑。屡荷过奖，真惭愧杀人耳。弟在此间未印润例，经常以二十万元一尺为例，（折的一页十万元），点品加倍，港币以如何折算，请高明为定之，无不可也。大千近已到沪，九月即将开画展，届时定有一番盛况耳。兹付不尽。敬颂道安。弟稚柳再拜。”

作《溪风图》并题：“燕文贵《溪风图》今在蜀郡张氏，予曾获观，兹以其意别为此图，兼用北苑法。戊子六月，鱼饮溪堂稚柳居士。”

作《秋山云水》并题：“戊子鱼饮溪堂写秋山云水。稚柳”。1986年又题：“秋山云水，壮暮翁自题旧作。丙寅夏日。”

画《竹》并题：“调啸风前翠几行，兔园老去旧梁王。春兰秋菊都荒尽，惟合人间著苦篁。”

画《山茶》并题诗：“严霜浓雪若为亲，冻雨凉飙久结邻。还被东风求识面，何曾凝笑向三春。”

画《梅竹》并题诗：“绿萼苔枝已经尘，老梢还若碧云春。看来都是旧时色，唯有年华共鬓新。”

画《野果竹禽图》并题诗：“四山雾虚明，千里阖濛绿。鸟啼野果红，霜风如酒酷。此

三十三年旧，辛酉重题。稚柳。”

为沈尹默夫人褚保权作《萱蝶图》并题：“效元人萱蝶图，保权沈夫人雅正。戊子五月，谢稚柳。”

作《渭川琪影》扇面，并题：“东坡论画羞形似，老可还为竹写真。信有渭川千亩地，何人肯说是迷津。戊子夏日。稚柳居士。”

是岁名其居为溟鱼池馆、池上楼。前者取意于“墨池飞出北溟鱼”诗句，后者取意“池上生春草”诗句。

在南京作和释老诗两首，《夜饮水上酒家和释老原韵》：“耽恋清宵抱日移，近时无复不堪（用稽康语）悲。觥船且倚江天楫，人海虚怜白发诗。窗隔灯昏波外回，云深雁绝月来迟。伤离念远寻常事，暂得相逢已足奇。”《九日夜集和释老》：“佳节聊为九日酬，尊边共与送春秋。菊英未绽香犹远，酒力难胜气已遒。垂处本来多绝涧，人间何必有高秋。尘埃歌吹齐王宅（酒罢释老道其当年北京事），头白登临楼子楼。”

是岁，张大千兴办画展，稚柳为其画展作序《论大千画》，此文发表在《京沪周刊》上，文曰：“二十年前，初闻蜀人张大千，美浓髯，强饮食，纵谈笑，其画为清湘、雪个、渐江、髡残，豪迈奔逸，才藻新奇，后于白门得相会合，当时戏为小诗：‘大千谈笑如芳酒，雨雪相逢白下门。底事桃根成小别，孤衾无梦也销魂。’往事回首，又十余年矣。大千好遨游，多蓄法书宝绘，奇气磅礴，下笔如风雨，使人意夺神迷，间尝与人论东坡才情，每叹大千与之相合，倪雲林赠王蒙诗云‘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盖自东坡迄今，且八百年矣，时人每以予为知言，盖知大千者，知予之非阿好溢美。比者，大千东来，即将以其法绘，假成都路中国画苑展览，画凡九十余幅，流派毕具，如入山阴，要其所宗阎立本、顾闳中、董源、巨然、刘道士、高克明、王希孟、郭恕先、李龙眠、道君、易元吉、崔白、李迪，下至元四家，靡不得其神髓，多出新意，大千乱真清湘久为人知，今

日乃不复入清湘一笔，游仞造化之中，驰骤千载之上，得山林之神趣，穷笔墨之玄奥，古人论山水必称三远，又所谓尺幅有千里之势，今日读大千之画者，试绳以此数端，必能备见其众长。大千既居敦煌久，凡其人物，全出唐人法，故神采特胜；鞍马亦复追踪曹韩，世传李龙眠画马能摄其神，大千之笔雄健沈酣真如庖丁解牛，其神骏之致要得以平视龙眠；宫室亭榭，祖述三唐，下绍两宋，信足与郭忠恕辈揽辔并驰；至若道君崔白，擅写生，守神理，实花鸟之宗师，追风沿波，新奇并发；盖绘事多门，千百年来其萃于一人者。予尝谓大千：公画得之于刚而蓄于柔；妙于奔放而拙于谨细，今日则阳刚既胜而柔缚特贍，奔放斯练而谨细转工。大千乍当始满而须发半白自谓垂老，傥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者非耶？三十七年五月五日谢稚柳。”

《为俞啸琴题顾纯伯画兰卷，启乾隆时亦虞山人，时啸琴正卧病上海》：“几年不见俞夫子，高卧江滨此隐贤。还似幽兰深谷里，光风清露得长年。”

一九四九年 己丑 四十岁

二月，《敦煌石室记》书成，此为1954年所著《敦煌艺术叙录》之前身。

作《新篁春鸠图》并题：“己丑仲春写新篁春鸠，并调啸阁中生意。初并蓄二鸠，新丧其一，连朝风雨，春寒尤勒，时稔鸠唤，良不虚也。稚柳居士。”

作《四季花鸟》屏，并逐幅题识：一、“卸箨抽枝堕粉残，凌云见此碧琅玕。掩关已得烟随雾，莫标风梢作钓竿。己丑仲春，稚柳居士”。二、“竹里霜催野果红，秋禽无语对秋风。嫣香不道春间路，还与疏林烂漫通。己丑仲春，稚柳”。三、“帘外青螺压雾收，清秋芳色绕林秋。野禽应识倡条叶，已带霜华在上头。己丑二月，稚柳居士调啸阁仍赋”。四、“裁衣铸雪了无因，空里天华不著身。一自逋仙沈梦后，分钗半钿尽出尘，己丑二月，稚柳居士调啸阁。”

作《茂林叠嶂图》，并题：“己丑春暮写茂

林叠嶂，用宋人法。鱼饮谿堂，稚柳居士。”

是岁作《绿竹伯劳图卷》潘伯鹰题诗并跋：“四月十九夜，旅馆灯下观行笈中稚柳所画绿竹伯劳卷子为题其后三首：‘周王黄竹有哀歌，绿箒双禽更奈何。岂是东归迟作计，北风胡马感人多。’‘东南孔雀尚徘徊，旧燕西飞那再来。好与他时添画稿，防将竹屑误秦灰。’‘何事行藏喻伯劳，吁天声共竹萧骚。荆吴遍地惊弓鸟，纸上笄篴莫定巢。’”（引自新加坡潘受、周颖南出版的《玄隐庐诗》卷七、八上）

七月十一日，经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聘李亚农、徐森玉、吴仲超、柳诒徵、沈尹默、尹石公、胡惠春、沈迈士、吴景洲、张闾声（宗祥）10人为委员；接着又聘马一浮、汪东、顾颉刚和曾昭燏为委员或兼职委员。主任委员李亚农，副主任委员徐森玉。特别顾问为谢稚柳、张珩、潘伯鹰、顾廷龙、赵万里、徐邦达、瞿济苍、谭敬、冒广生等38人。行政人员有秘书长刘汝礼、人事科长姜明、保卫科长江庸。（摘自《上海文物博物馆志》）

是年十月，稚柳作《四美图》并题诗：“罗髻蓬松一段云，回眸秋水照人清。饶他咳唾成珠玉，况是黄鹂百转声。”此图系用两张五尺宣纸横接而成，沈尹默题《稚柳林下丽人图》诗：“谢生动能理世纷，一静十日坚杜门。情知秋暑不可遣，安排笔砚同朝昏。解衣磅礴真画史，林下清风化四美。图成携示疾开看，古思今情在一纸。一人引吭若有声，谁欤会得当时情。二人同心同回顾，远隔独寻声处行。伯劳飞飞何所愿，切勿惊使歌声断。逝川无尽意无穷，含意未伸良可叹。多时不逢范豫章，安得唤起陈履常。有益无益老始辨，白日去我何堂堂。君子竹，丈人石，题罢还君意不得。此卷长留天地间，从教举世重颜色。”（引自谢稚柳藏

沈尹默手稿）潘伯鹰题：“稚柳画林下丽人图卷子绝大，沈尹默作诗以二寸许大字题后，稚柳要余同作。‘吾闻昆仑之阴藏嶰谷，帝命伶伦断高竹。黄钟之宫实始此，乃有余音落淇澳。何年善剑越美女，光激青湘濯寒玉。猿公幻化杖篠簵，飞上梢头如电速。杜陵志节老兵戈，风雨秋深破茅屋。晚将翠袖喻苦心，采柏卖珠歌当哭。千秋逸事写谁工，一丈横图看不足。莫将陈意轻比方，别运清新动心目。四妹踏臂檀栾围，歌声惊起双禽飞。谢郎健笔战往古，三唐两宋相环回。君昔游居莫高窟，攀缘画壁麈沙埃。拯民济世一不道，直以槃薄遗安危。心高那作第二想，冥与绝诣争风徽。自来志士有取舍，蜩翼天下知言哉。驱豪午夜越寒暑，百世可质知成亏。吴兴妙句作大字，山谷其貌山阴规。故知此老偶狡狴，新意与子方轨驰。卷图敛手谢饶舌，相视而笑真吾师。’”（引自潘受、周颖南出版的《玄隐庐诗》卷七、十三上）叶元龙题：“此竹谁所画，其人恐是仙。颇思访君子，不料见婵娟。看鸟远来过，歌声还可传。悲凉未易解，且问李延年。”

割董玄宰《天马赋》巨卷尾纸作水墨山水赠大铁，大铁以词《临江仙》报之，词云：“天马行空余玉尘、轻蹄踏雪无痕。华亭割席应无



嗔。心期千载上，高见逸风尘。六法家珍天下重，别开生面超伦。亭亭馆里两传人。瓮雪公享我，旦暮相丰神。”

作《旗亭赌唱图》并题：“己丑九月谢稚柳调啸阁中写旗亭赌唱。”己未（1979）再题：“此三十年前所作，久已散失于尘埃中，不复记省，前年偶得重归壮暮堂中，则风尘变染，颜色都非，既悔其少作，亦无足可观，搁置又已经年。今重观此图，觉当有未尽处，而衰老暮年，手指僵颤，难复为此，因乞刘旦宅为补屏风，以掩其短，聊复存之，以记画腊一程而已。己未岁尽，壮暮翁记。”钤印：“穠麋”、“迟燕草堂”、“调啸阁”、“鱼饮溪堂”、“鱼饮 堂”、“定定馆”、“苦篁斋”、“杜斋”、“苦篁斋”、“饔边盒”、“迟燕草堂”。

陆俨少题：“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貰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从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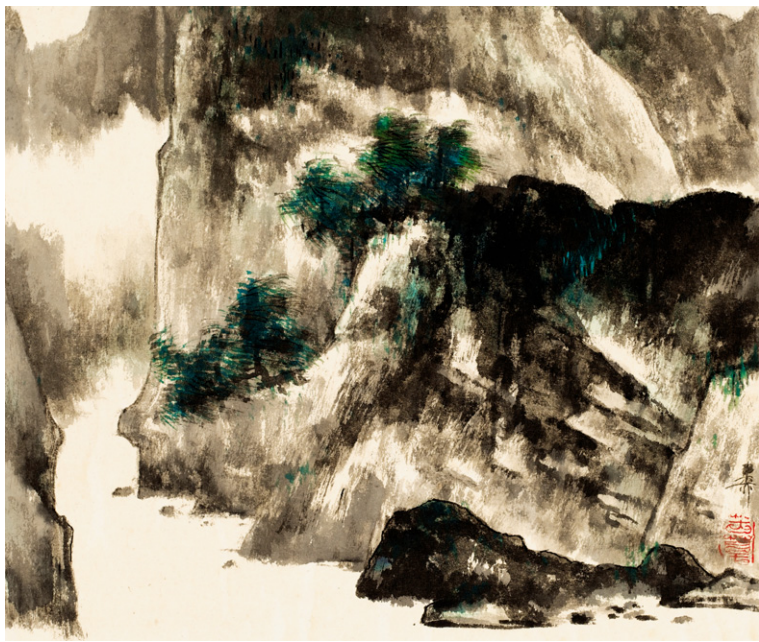
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筵泪满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之争衡矣，若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右唐薛用弱集异记载旗亭画壁故事，往岁稚柳友兄展为图画，中更世故，历劫仅存，不忍捐弃，重加装治，属予书诸卷尾。庚申春日。陆俨少并记。”钤印：嘉定陆俨少、又字宛若。

作《碧嶂乔柯图》并题：“少年语意吟衰白，持镜分明鬓未斑。原是人生几两屐，春秋何处不投闲。己丑新秋，调啸阁用郭忠法，谢稚柳仍赋。”

十二月，作《山水》题款为：“寒林图效宋人法，己丑十二月稚柳居士定定馆下。”又作《竹涧山泉图》。

题《赵松雪竹》：“断楮零缣几足珍，鸥波亭子久灰尘。晴雪晓惹云生绿，退笔苍茫得任真。”

写《贺知章访李太白图》并诗：“痛饮狂歌绝代雄，长安客舍接清风。金龟事与千年冷，酹酒何曾异代空。”



辛亥前期的上海重要报刊

Famou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Shanghai in early 1911

撰文 / 马建萍

一个世纪前的10月，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之后，各省云集响应，辛亥革命势如潮水，最终以民主共和的形式取代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神州大地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有学者认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是被两支军队合力推倒的，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即革命的宣传。辛亥革命其实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当时有两个宣传革命的基地，一是日本东京，另一个是上海。得益于畅通的信息渠道和先进的印刷技术，晚清的上海报刊在十几年的时间内竟放光彩。报刊可谓品种繁多，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学、历史、教育、科学等诸多方面，视野涉及全国乃至世界。庚子事变、《辛丑条约》之后，清廷威信全失，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上海思想界的状况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以救亡为宗旨的宣传品竞相问世，激进宣传逐步展开。因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上海报刊在辛亥前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依托。《苏报》、《俄事警闻》、《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女学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报刊。翻开昔日那些振奋人心的报刊，这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一幅幅穿透世纪硝烟的画面跃然呈现在眼前。



《苏报》

1903年5月始，《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宣扬革命的文章连续登载于《苏报》，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振聋发聩。5月底，邹容著作《革命军》印成单行本，《苏报》马上刊登章太炎为此书作的序文和章士钊的《读革命军》，称赞其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革命军》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行销110多万册，成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¹⁾此后，《苏报》又摘录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显著位置刊登，对革命发出热情的礼赞。这些言论犹如巨石激起千层浪，震动了一班士大夫，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惊恐。上海道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经过反复交涉，于6月底，中西警探巡捕直抵报馆，以鼓吹革命的罪名捉拿陈范、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

(1)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3卷第3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次月7日《苏报》被查封。史称“苏报案”。

《苏报》原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报，创刊于1896年，内容多载市井琐事。后由陈范出资收购，报馆移至汉口路27号，那是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极不起眼的统间，但其日后爆发的威力却是震古烁今，惊天动地。该报一度致力于改良维新的宣传。1903年5月，聘请爱国学社社员章士钊任主笔。自此，报社言论日趋激烈。一个多月内发表了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文章。《苏报》的革命宣传和“苏报案”，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团体的竞相成立和革命刊物的相继问世，对民主革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孙中山在日后评价此案时也曾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²⁾

《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则是20世纪初年两份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1903年12月15日，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撰稿人多为中国教育会的成员。该报的主要内容是围绕沙俄侵占东三省问题展开的。它大幅刊登了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号召国民奋起拒俄。次年2月25日，鉴于

日俄战争已经爆发，《俄事警闻》停刊，改出《警钟日报》。

1904年2月26日，《警钟日报》创刊，蔡元培等主编，8月蔡辞主编职，由汪允宗、金少甫相继担任。日报设社说、时评、国内要闻、世界纪闻等栏目。初期揭露帝俄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作为“警钟”，以唤起国民的救亡意识。此后，对英、法、德等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主权也时加抨击，将拒俄扩展为反对一切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并指责清政府投降卖国，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成为继《苏报》之后重要的革命报刊之一。1905年3月27日，因该报刊载揭露德国在山东的密谋等新闻，被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道共同查封。发行人和校对被处监禁。

1907年起，同盟会成员于右任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传播革命思想。

1907年，于右任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他邀集杨笃生、汪允宗、邵力子等人于4月2日创办了《神州日报》。该报不用光绪年号，而用干支和公元，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它疾呼爱国，抨击立宪，并详细报道革命党人在各地的武装起义。日报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故而备受欢迎，发行量超过万份，成为

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

1946年停刊。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又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自任社长，主笔陈飞卿。该报以“为民请命”，“大声疾呼”为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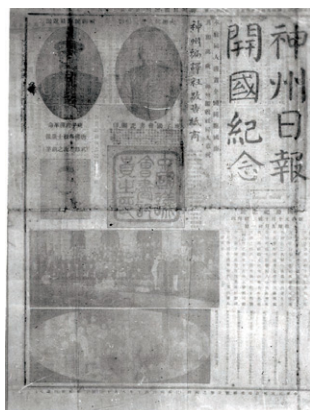
《俄事警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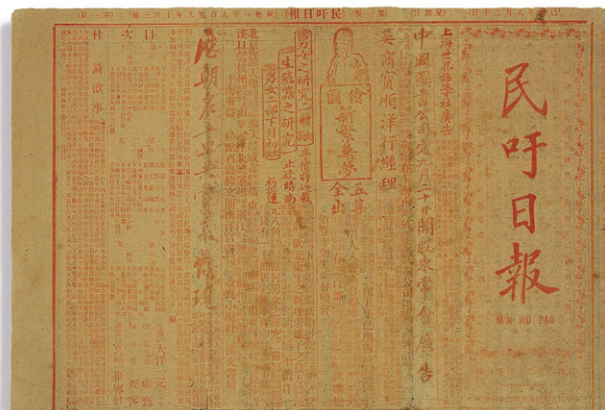
《警钟日报》

(2)《孙中山选集》第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内容分纪事、言论、丛录三部分，并配合各地时事新闻，刊登有关政治、时事、社会生活的讽刺图画，痛揭吏治腐败、政治黑暗，以舆论动摇清朝统治。其言论远较《神州时报》为激烈，从而引起瞩目，出版不久销量就居各报之首。然而，该报只办了92天即被迫停刊，于右任被驱逐出租界。



《神州日报》



《民吁日报》



《民立报》



《民吁日报》

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在《民吁日报》旧址创办。范鸿仙任社长，暗中仍由于右任主持，笔者多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报名中“吁”字在沉痛中尤含幽默意味。宗旨为：振发国民精神，宣达民生疾苦。该报传承了《民吁日报》的版式和风格，只是言论转为隐蔽和稳健，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直言不讳。在连续报道并揭穿日本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进而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后，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他们串通清政府和租界当局，于11月19日查封《民吁日报》。

由于《民吁日报》原有的机器设备被判决不准使用，经于右任、范鸿仙等近一年的努力，江浙资本家沈缙云等赞助。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在上海租界创办。宋教仁、马君武、章士钊先后任主笔。该报以提倡国民独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和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设《社论》、《大陆春秋》、《上海春秋》、《东西南北》等栏目，针砭时弊，揭

露君主立宪骗局，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号召推翻满清政府。辛亥革命时，积极报导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反对南北议和，全力推行政党责任内阁制，并发起社会主义的讨论，刊登了宋教仁的《社会主义商榷》等文。1913年，“宋案”发生后，率先公布袁世凯刺宋真相，鼓吹兴师讨袁。9月4日被袁世凯封禁。

辛亥前期上海报刊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妇女报刊的兴盛。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从城市推向农村的，上海则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因此，妇女报刊的集中出现也是必然的结果。女性群体逐步走向启蒙，奋力争取女权，舆论媒体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估计，晚清中国的女报，至少一半以上出在上海。⁽³⁾这一时

(3)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第74页。

期上海的妇女报刊，一类纯以“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主旨，另一类则把提倡女学与女权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结合起来，鼓励妇女既作女权运动的先锋，又作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这些报刊大多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办了几期就被迫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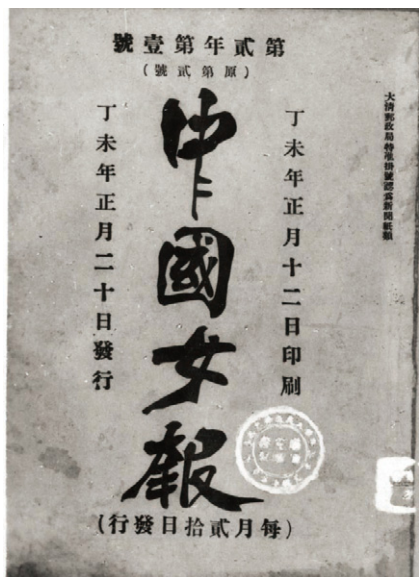
1902年，陈撷芬在父亲陈范的支持下创办《女学报》，初随《苏报》发行，主要作者有杜清池、王荷卿等。该报以“提倡女学、尊重女权”为宗旨，分插话、论说、演说、女界近史等栏，号召女子和男子一道，共同改变国家“受制于外人”的状况，把妇女解放和民族独立紧密地联系起来，被誉为女界《苏报》。“苏报案”发生，《女学报》也被查封。陈撷芬避居日本，继续编印《女学报》最后一期即第4期后停刊。

1907年1月14日，秋瑾秉着“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⁴⁾的宗旨，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该月刊设社说、文苑、译编、新闻等栏，着眼于唤醒广大妇女，提倡男女平等，并把妇女解放的前途与中国的前途紧紧地关联

在一起。同年3月4日出至第2期后因资金关系，也因秋瑾回到浙江从事革命实际活动无暇顾及而停刊。

《神州女报》通常被认为是《女子世界》和《中国女报》的延续。1907年12月，当时上海妇女界为了纪念英勇牺牲的秋瑾，决定将《女子世界》和秋瑾办的《中国女报》合而为一，创新刊——《神州女报》，该报对秋瑾事迹作了重点报道，并刊发了秋瑾的多部遗作，鼓吹反清革命，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因而受到清政府压制，于1908年3月被迫停刊。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救国图存的严峻现实，不得不担负起启发民众和变革社会的双重任务。他们接受新式思想，全方位检讨中国的社会现状，对中国伦理与西方思想的距离与冲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救亡中求进步、求进步中救危亡。这些报刊是他们大力宣传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为革命的到来作舆论准备，并在之后宣扬民主共和，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的见证。



《中国女报》



《女学报》



《神州女报》

(4)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第1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上海博物馆帮扶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藏品保管提升试点项目顺利进行

2011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试点工作。此次帮扶工作试点项目分为“藏品管理、保护能力提升”、“博物馆展示服务功能提升”、“博物馆管理、业务人才培养”三个专题开展。上海市文物局根据上海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和科学管理优势，确定围绕博物馆藏品管理专题开展帮扶工作，积极申报了“上海博物馆帮扶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藏品保管提升”试点项目，并通过国家文物局评审，被确定为此次帮扶工作试点省份之一。这一试点项目工作为提高上海的民办博物馆质量提供了良好契机，有利于形成民办博物馆健康、规范、有序的发展态势。对此，上海市文物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会同上海博物馆、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实地查看和方案研究，积极推进对口帮扶工作。

整个帮扶工作，从6月启动，一直持续到12月初。该项目

依托上海博物馆的专业优势，上博专家们针对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存在的藏品保管主要问题，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展开帮扶工作。通过帮扶，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保管得到以下方面的提升：一、对藏品进行专业整理、评测与鉴定，为藏品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博物馆档案（藏品卡）；编辑了藏品图录，加强了藏品的展示宣传力度。二、创建规范的藏品总账，建立博物馆藏品信息网上数据库，提高了藏品信息的利用率；改造藏品库房，制作藏品囊匣，确保了藏品安全。三、监测博物馆藏品保存展示环境，并配备必要的调控检测设备。博



物馆藏品保管这项核心业务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12月12日，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评估组，在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组织召开了“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试点项目中期评估会。通过实地查看和听取汇报，评估组对上海市的帮扶试点项目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通过中期评估。同时认为，在上海市文物局认真组织下，在上海博物馆具体实施和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的积极配合下，试点项目进展顺利，非常成功；通过帮扶，有效提升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藏品保管的基础业务能力，进一步凸显上海博物馆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有效推动了博物馆馆际交流和优势资源互补，同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帮扶工作机制，对口帮扶工作成效显著。



（撰文/幸尔）

相关链接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泰康路25号，由创办人张毅和杨惠姗投资2500万人民币而建成。租用的是居民密集区域中的一幢独立楼房，面积2400平方米。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努力办成“社区邻里间的博物馆”，精美的展品结合温馨适宜的接待。

博物馆的一楼是餐厅、礼品店、书店；二、三楼为主体展区，并设有放映厅、观众休息和举行小型活动的场地；四楼为休闲区。经过绿化的三楼和四楼室外平台构成一个整体空间，是又一个可用于展示活动的场地。

走进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便走进“中国琉璃的故事”长河之中。动画《女娲补天》，以“女娲补天”为蓝本创作的动画电影拉开参观的序幕。二楼展厅陈列着中国古代琉璃若干，包括迄今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玻璃器皿——“曲水流觞”耳杯（仿品），自汉代至唐宋年间，叙述着中国古代琉璃发展的故事，弥足珍贵。此外，还汇集了一批中外琉璃艺术大师的艺术杰作，包括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捷克、瑞典、中国等艺术家的大型代表作，风格迥异，气象万千。三楼展厅是杨惠姗24年佛造像的历程记录，其中特别是再现敦煌3号洞窟元代残破壁画的大型雕塑《千眼千手观音》，为博物馆“镇馆之宝”，被敦煌研究院樊院长誉为“第493号窟作品”（莫高窟的南北两区现有492个洞窟）。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新馆自2010年10月开幕以来，稳步成长，办展宗旨、展品、陈设方式，得到各界观众的认可和称赞，社会反响良好。

《上海文博论丛》2011年（总第35-38期）目录索引

主题与专栏

文博笔会

世博的文化回望.....陈燮君 35/06

特别报道

海之馈赠——新西兰鲍贝装饰艺术.....本刊报道 36/06

独立风格：瑞士画家亚历山大·佩里耶的风景画
.....龚晓王佳 37/06

国宝森玉.....本刊报道 38/06

专题论坛

功绩与精神永存——徐森玉和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文堪 38/08

外公徐森玉先生印象.....王圣思 38/11

全凭溪水想音容.....陈燮君 38/21

徐森玉先生和我的父亲郑振铎.....郑尔康 38/26

怀念森老.....吴格 38/29

书生报国：一段隐秘的地下斗争史.....陈福康 38/31

叶景葵与徐森玉的友谊与交往.....柳和城 38/39

纪念徐森玉先生.....陈先行 38/42

文物新视野

吉光片羽在人间.....李军 35/11

吴昌硕篆刻创作的代刀现象.....孙慰祖 35/18

元大都的凯旋门.....林梅村 36/14

四明银行纸币.....吴旦敏 36/10

试论管道升书画艺术的审美特征.....黄玉亭 36/37

多种艺术视角中的王时敏与王原祁.....陈燮君 37/14

新见王莽地皇二年侯骑钭.....呼啸 37/20

如意云纹与卷草纹的关系——从剔犀纹样谈起.....张毅 37/24

“天圆地方”综论.....张潮 37/35

学者徐森玉古籍整理事略.....王菡 38/44

陈梦家先生致徐森玉先生函一通简释.....柳向春 38/48

《神鸟图》书体特征分析.....陈松长 张孝蕾 38/51

精品鉴赏

赏“冬心”款砚 谈金农其人.....杨润先 35/45

玉兔拜福.....王蔚波 35/48

情缘富春.....鲁珊珊 36/40

盛世华章 乐舞升平.....赵耀玲 37/42

探索与分析

文博论坛

“设计”博物馆.....陈凌 35/58

浅谈博物馆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吴凡 35/63

吟咏史诗 讴歌壮丽.....陈燮君 36/57

与观众的对话——博物馆服务观众探析.....冯惠 36/60

深度挖掘文化内涵 推广拓展文化资源.....龚丹 36/64

松江区博物馆志愿者工作回顾.....朱臻 36/67

新闻与发现

现场传真

苏庄古墓清理报告.....黄永久 张童心 胡小朋 35/28

长安中丰店所见清代武官家族文物.....邵晶 35/34

上海明墓出土戒指.....何继英 35/40

上海嘉定区李新斋家族墓发掘简报.....黄翔 36/44

上海明代墓葬出土锡器.....何继英 38/57

浅谈博物馆网站的设计与制作..... 陈 晴 37/49

发挥宣传教育功能 打造历史文化名片..... 彭文娟 37/58

课本剧——博物馆教育活动新形式..... 吴美华 37/61

发掘孔庙资源 完善社教功能..... 马剑颖 37/66

纪念馆志愿者服务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潘伟玲 37/68

近代中国博物馆史上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吕建昌 38/66

试论档案工作之博物馆名人档案..... 陈云柯 38/73

书籍评论

书苑猎真..... 丁 辑 35/68

书苑猎真..... 丁 辑 36/70

公众考古学背景中的上海远古文明..... 张童心 董文兵 37/71

书苑猎真..... 丁 辑 38/82

科技园地

浅谈博物馆数字化多媒体信息的采集和制作..... 朱中一 38/77

域外萍踪

武士的荣耀——毛利传统武器及其变迁..... 龚 辛 37/76

神奇巴士——面向学校群体的博物馆活动..... Kim Fortney 37/83

金工世家传佳作..... 张荣亮 金礁 37/88

海上人文

申城史地

谢稚柳系年录（六）..... 郑 重 35/72

吴仲超矢志不渝的文物保护情结..... 陶喻之 36/74

谢稚柳系年录（七）..... 郑 重 38/86

上海博览

从义品村到思南公馆..... 刘雪芹 陆 烨 35/79

从上海世博会看博物馆与旅游..... 蒲晓霞 35/84

中国百年博览业的又一见证——《陈名发禀事札》..... 呼 啸 35/88

《富林十景》释文与史料——附广富林风物诗..... 于慎忠 36/86

辛亥前期的上海重要报刊..... 马建萍 38/91

滴水片石

解读陈云委托秘书写的三封信..... 严 玮 36/80

徐寿与声学定律的实验和研究..... 徐 泓 徐 宇 徐世珍 36/83

资讯链接

国际博协专家参观青浦博物馆..... 王 辉 35/93

徐汇区公布第六批文保单位及第五批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徐 文 35/93

外国语学社创办90周年座谈会在渔阳里举行..... 王爱民 35/94

柯灵旧居揭牌..... 咏 堃 35/94

徐汇区出台“三年文保行动计划”..... 丁永坤 35/95

“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韩 晶 36/94

“中国文化遗产日”徐汇区迎客万余人次..... 徐 闻 36/94

“丁敬、蒋仁篆刻作品鉴赏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举办..... 孔品屏 36/95

青浦召开“三普”表彰会并举办成果展..... 王 辉 36/96

福泉山遗址考古新发现..... 周金金 36/96

纪念陈云“出人、出书、走正路”谈话发表30周年..... 李 冰 36/97

市人大调研本市文物市场..... 闻 广 37/92

第五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赣州召开..... 房 中 37/92

上海召开全市文物安全工作会议..... 上海市文物局 37/93

18处中共中央早期在沪革命遗址纪念标志落成..... 闻 广 37/93

上海文博界祝贺薛贵笙先生百岁寿辰..... 褚 菲 37/94

纪念建党暨学习陈云座谈会在沪召开..... 李 冰 37/94

中共一大会址外墙修缮工程通过初步验收..... 易 达 37/95

盛大网络捐赠暨复旦大学博物馆藏青铜器特别展开幕..... 麻赛萍 37/95

2011年度中国近现代书画鉴定培训班在沪举办..... 闻 广 37/96

上海市文广局、文物局举办干部培训班..... 褚 菲 37/96

上海博物馆帮扶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藏品保管提升试点项目顺利进行..... 辛尔 38/95

南宗正脉

——上海博物馆藏娄东画派艺术



王时敏

（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又号西庐老人、西田主人，江苏太仓人。祖父王锡爵明万历时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父王衡任翰林院编修。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崇祯初以荫官任太常寺玺卿，升太常寺少卿，后辞官归里，入清不仕。家富收藏，自少年起绘事即受董其昌指授，又研习家藏及董其昌所藏诸多名画，“日以古法浸灌心胸，而又专精熟悉，乃臻工妙”。故凡布置设施，勾勒斫拂，悉有根底。尤仰黄公望，深得黄氏笔墨浑厚苍茫的真髓，引领清初摹古艺术潮流，为“四王”之首，“画坛领袖”。

云山图轴

清顺治十八年辛丑，纸本，设色

王时敏七十岁时作品。王时敏追摩黄公望深得精髓，布景平稳中寓变化，用笔圆润、虚和、雄浑、蕴藉，晚年尤臻妙境。此幅浅绛山水，笔墨设色仿黄公望，山川浑厚，水木清华，隐士高人结庐山中，平和安闲，一片岁月静好。虽学元人，而易元人超迈萧疏为亲切从容，这是不同的环境、境遇赋予作者的不同的笔墨性情。

王原祁

(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王时敏孙，江苏太仓人。康熙九年进士，因专心画学，被召供奉内廷，奉旨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任书画谱总裁和《万寿盛典》总裁，官至户部侍郎。山水继祖法，于黄公望浅绛尤为独绝。早年画风接近王时敏，临摹古迹，多循古人规范，中年后逐渐形成自己风格。其山水画构图讲究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具有较强的形式感；笔墨技法取法“元四家”，以黄公望为依归，笔力雄健、沉厚，自称笔端为“金刚杵”。与王时敏、王鉴、王翬并称“四王”，领袖群伦，影响后世，形成娄东画派，左右清代三百年画坛。

仿王蒙山水轴

清康熙四十一年辛巳，纸本，水墨

王原祁六十岁时作品。相比于祖父王时敏，王原祁的笔性厚实浑茫，喜用干笔积墨，先笔后墨，连皴带染，由淡而浓，由疏而密，反复皴擦，焦墨破醒，使画面醇厚博浑、元气淋漓，很适合模仿王蒙。此件作品更将这种特征展现得一览无遗，而其近于封闭式的构图令整个画面有一种混沌微茫、精气既含蓄内敛又欲磅礴而出的张力。

